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18年第2期（总第136期）

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 任
万小朋

副 主 任
尹晓煌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王海燕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张 军 张近乐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 丹 陆 风 刘 怡
田 锦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6月

目 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

/ 靳 铭 1

习近平文艺思想视阈下优秀音乐作品的时代解读

/ 胡艺华 潘 婷 9

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

——习近平关于党内规矩的重要思想论析

/ 郝保权 16

高等教育研究

对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潘懋元先生访谈

/ 潘懋元 26

研究生教育学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王战军 杨旭婷 31

生命教育与人文涵养

/ 董云川 白文昌 39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跨文化研究与“汉学主义”

/ 周 宪 45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困难及其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 李鸿阶 53

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新思潮

/ 尹晓煌 60

情感史与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

/ 金 雯 71

军民融合研究

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策略研究

/ 李向阳 81

我国军工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及分类改革

/ 严剑峰 唐 波 88

CONTENTS

Deep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Economy	
<i>/ Jin Ming</i>	1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mes of Excellent Musical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Literary Thoughts	
<i>/ Hu Yihua Pan Ting</i>	9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Rules: a New Concept of Par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 Hao Baoquan</i>	16
Thoughts on Several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i>/ Pan Maoyuan</i>	26
The Conceptio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s of 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i>/ Wang Zhanjun Yang Xuting</i>	31
Life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Spirit	
<i>/ Dong Yunchuan Bai Wenchang</i>	39
Cross-cultural Studies and "Sinologism"	
<i>/ Zhou Xian</i>	45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Several Issues to be Emphasized	
<i>/ Li Hongjie</i>	53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i>/ Yin Xiaohuang</i>	60
The History of Emotion and the Unbinding of Literary Studies In a Multinational Context	
<i>/ Jin Wen</i>	71
Research on the Deep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ilitary and Civil Integration in China's Aerospace Field	
<i>/ Li Xiangyang</i>	81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Reform Models of Defense Industry S&R Institutions in China	
<i>/ Yan Jianfeng Tang Bo</i>	88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

靳 铭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途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举措主要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及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体系;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01-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1]。本文就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一些粗浅的思考。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意义

(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得到根本的改变,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满足了人民对基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

时,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利用,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尖锐化;乡村发展滞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发展落后,城乡、区域发展失衡;行业、群体、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民生领域供给不充分,在城乡、区域间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供给不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一方面限制了市场的充分竞争,市场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艰巨,民营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民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市场的不恰当引入,譬如教育、医疗等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上学难、看病贵等问题,住房问题依然存在,市场监管不完善,商品造假等现象时有发生等等。这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制约了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解决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地为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之

作者简介:靳铭,男,陕西延安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战略管理、区域经济、干部教育的教学与研究。

间的关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平衡充分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途径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即从2035年到2050年,在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我国新时代历史发展特征和条件,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和地位,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形成先进生产力,实现科学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需要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下,要健全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脱贫、产业兴农、产业致富,推动现代化农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化服务业按比例协调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四化”同步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培养高科技人才,壮大人才队伍,加强管理创新,实施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以及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爬坡过坎、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以近10%的增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也积累了诸如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为应对1997年东

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扩大内需政策,大规模投资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结构性过剩,刺激消费需求催生了消费主义盛行,导致消费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重了经济结构性矛盾。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结构予以重新调整,实行“再工业化”政策,挤占和瓜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倒逼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使我国结构性矛盾更为严重。随着用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廉价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失去比较优势,制度、政策红利也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要寻求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为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就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2]。

第一,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因素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利用,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商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本来用于满足人

们需要的目的,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过度投资、低质量重复生产,导致生产结构性过剩。同时,资本的逐利性催生了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以至于造成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资本的逐利性也大量的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从实体经济领域撤出并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领域,造成实体经济发展滞后、虚拟经济出现泡沫,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譬如,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演化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在过分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完全市场化情况下,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促使虚拟经济迅猛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超过可控的“度”而形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意味着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资本向着社会主义本质方向发展。

第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由“温饱型”转向了“小康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供需结构性失衡,生产与消费关系颠倒,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社会保障和民生保障制度不充分,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机制不完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等,经济发展“三期叠加”,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加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再工业化”,国际经济结构有了新的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力点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在上述诸多丰硕的理论创新基础上总结提出的,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全面贯彻“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集中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3]。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已由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为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的产品以及高效率的服务才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还意味着已由过去追求经济增长“一花独放”转变为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百花齐放”、和谐发展,“五位一体”全面协调推进,满足人民对物质需要之外的政治、文化、公平公正、优美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已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济增速也已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平稳增长。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能够集中体现和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构成包括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的“六个体系、一个体制”七个方面,从其构成上看,现代经济体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

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尊重和重视市场规律,市场竞争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优势互补,相互协调与配合,既能够积极发挥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又能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服务与保障。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经济结构能够合理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国有资本引导民营资本向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方向发展,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谐的劳动关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它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合理的分配结构既要有合理的初次分配结构、又要有完善的再分配机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劳动者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有合理客观的生产经营性收入或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劳动关系和谐。具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健全的民生保障机制,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显著增强。

第三,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结构。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由现代化农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内,各产业、部门以及企业之间协调发展,结构合理。在这一产业体系和结构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促进,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之间的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共同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全面对外开放,完备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在国内是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更是全面对外开放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形成了良性

的互动,共同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能力。在这一体系下,应着力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形成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良好格局。我国的经济结构在国际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国际经济结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产业链中处在中高端位置,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增强,在国际话语权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

第五,城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体现在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的优化和完善。区域性的战略规划能够有序衔接有效配合,有着成熟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东、中、西部各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有效配置、自由合理流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具有融合的城乡发展体制,城乡之间的产业优势互补,相互融合、渗透,形成城乡互动的田园综合体的产业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四化”同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民生保障均衡发展。

第六,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的运行特征,体现在新技术革命发展中,就是具有完善的科技体制机制以及技术创新体系,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团队、高科技人才以及科技领军人才,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以及理论创新能力,能够创造出世界前沿引领技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高科技企业、龙头企业和优秀企业家、杰出企业家,能够生产和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中高的经济增速是新时代经济发展合理的速度,是由新时代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我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只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7%,到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人均GNP或国民收入达到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就绝对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4]。

(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遵循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5],“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6]。

第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是“灵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灵魂”。首先是创新驱动发展,将创新作为推动和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技术革命时期跻身于世界经济前沿,抢占制高点;提高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水平,扩大科技人才队伍,推动和实现经济发展从“低质量重数量”向“高质量”变革,从“低水平低效益”向“高水平高效益”变革,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变革,通过“三变革”来“提质增效”。其次是平衡协调发展。调整关系,促使经济结构合理平衡发展、投资与消费协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平衡协调发展。再次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7],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的发展,共建美好家园,实现人民对优美环境、安全食品、清新空气等绿色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然后是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主动积极融入到全球化发展中,全面实现对外开放,内外联动,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最后是共享共富发展。共享共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逐渐做大,应积极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健全民生保障制度,将“蛋糕”进行合理分配与再分配,使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将发力点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使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回归本位,发挥好生产的手段作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根据社会需要和人们的消费需求,为社会和个人生产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全社会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要,促使最终消费顺利实现,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协调发

展,实现供需平衡。

第三,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稳“根基”。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实体经济是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科技创新尤为重要;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与核心,现代金融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服务;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应促使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有效结合,投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使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产业升级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与结构高质高效地发展。

第四,构建“三有”体制强“保障”。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党对一切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完善的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市场化配置,使资源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和自由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使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使微观主体在社会主义“大政府”“强政府”有针对性的、精准的引导和控制下,开展有序公平的竞争,促进经济高效率运行。

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了全面部署,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

(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要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8]。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进行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

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具体地讲,一是要提高技术水平,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改善供给质量,提高供给能力,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二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导致我国中高端消费者境外消费现象频频出现,消费大量外溢却国内消费不足。因此,我们要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质量赶超,使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三是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四是要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业,尤其是现代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

(二)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发挥好创新引领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由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转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一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投资和支持力度,争取在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技术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并将这些技术创新成果用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加强规划和重点支持,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落实和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主体投入到创新中去,尤其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并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及产业化,形成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9]。四是注重和加强科技

人才的培养和激励。继续增加对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投入,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扩大高校、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培养一批高科技人才,并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 振兴乡村,繁荣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不充分、农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问题。发展产业是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繁荣以及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科技,培养科技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主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水平和综合效益。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二是通过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等为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致富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村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使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四是健全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方面发展的一体化,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四) 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

区域发展不协调是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继续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边疆地区、偏远山区发展。二是继续实施区域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化,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中部崛起,创新引领东部优先发展,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中心城

市,壮大城市群,增强要素集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能,提升现代化水平;创新引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三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财税机制,加强规划协调,消除要素流动壁垒,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五) 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反复证明。新技术革命促使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联系愈加紧密。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有效对接,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协调战略的有效结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使我国发展成为贸易大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服务贸易规模也已位居全球第二。我们要在继续保持外贸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为核心的外贸新优势,积极探索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推进外贸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10]。坚持创新引领,深入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形成外贸增长新动力。三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放宽外资准入政策,特别要加大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坚持走出去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方向,鼓励更多的企业,创新投资方式,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端要素,构建能够优先整合全球资源的价值链、供应链、物流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产业

升级,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国力,促进我国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六)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一是健全和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保障市场秩序、市场主体活力和市场预期的基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各类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国有资产产权制度、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等,加强产权保护。二是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现代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三是转变政府职能,通过科学、适度、有效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进行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等。

参考文献

- [1][2][8] 习近平.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EB/OL]. (2018-01-31) [2018-02-0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1/31/content_5262618.htm.
- [3][5][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0.
- [4] 刘志彪.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素是什么[N].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17-11-06 (3).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交出版社, 2017: 11. [politics/2016-02/29/c_128761312.htm](http://www.cfen.com.cn/sjpd/politics/2016-02/29/c_128761312.htm).
- [9] 新华网. 受权发布: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五)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 [EB/OL]. (2016-02-29) [2018-02-05] <http://news.xinhuanet.com/>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7年秋季) [EB/OL]. (2017-11-07) [2018-02-05] http://www.cfen.com.cn/sjpd/hg/201711/t20171107_2745486.html.

Deep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Economy

Jin Ming

Abstrac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uts forward clearly that it is vital to develop a modernized economy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economy is an urgent need for crossing the border and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it is an objective need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solving the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a well-off society and the basic way to realize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o build a modernized economy, we need to ra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an industrial system that promot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rn finance, human resources, and develop an economy with more effective market mechanisms, dynamic micro-mains, and sound macro-regulation. The measures to achieve this strategic goal are mainly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tively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cus on developing an open economy, and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Modernized Econom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dustrial System;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习近平文艺思想视阈下优秀音乐作品的时代解读

胡艺华 潘 婷

摘 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音乐作品具有丰富的时代内蕴,集中体现为三个统一,即感染力、影响力、传播力、亲和力相统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相统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新时代优秀音乐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应有之义,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全社会强烈呼唤高扬民族风、弘扬主旋律、具有通俗性、体现专业度的音乐作品。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着力从四个方面下功夫,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扎根人民生活,促进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整体推进音乐队伍建设。

关键词:习近平文艺思想;新时代;优秀音乐作品;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09-07

优秀文艺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更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均强调: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此基础上,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1]音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最喜爱、最关注、最容易接受、最乐于参与的文艺形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音乐的广阔舞台和特殊作用更加凸显,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秀音乐作品的需求也显得尤为迫切。对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引领,从新时代的背景出发,把握优秀

音乐作品的时代内蕴,分析优秀音乐作品创作的现实意义,认清优秀音乐作品的鲜明特色,探讨优秀音乐作品创作的基本路径。

一、优秀音乐作品的时代内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这种复兴不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的强大,而是全方位、全领域、全民族的复兴。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用优秀的音乐作品来唱响时代的主旋律、传播中国的好声音、提振人民的精气神。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优秀音乐作品都应该是新时代的音乐表达,应该具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AKS016;湖北省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四批),项目编号:17ZD066;武汉音乐学院院级教学改革项目“音乐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的研究与编写”。

作者简介:胡艺华,男,湖南永州人,武汉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文化研究;潘婷,女,湖北监利人,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文化研究。

与之相适应的丰富内蕴。

(一) 优秀音乐作品应体现感染力、影响力、传播力、亲和力相统一

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3]由此可见,真正优秀的作品应当同时具备感染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亲和力,四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内在统一于优秀音乐作品之中。其一,感染力是优秀音乐作品的内在品质,优秀的音乐作品首先在于它自身蕴含了正确的价值观念、崇高的思想境界、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人民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正能量。其二,影响力是优秀音乐作品的价值体现,真正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触动人民的本色初心,引起人民的思想共鸣,总是能够温润人民的心灵,启迪人民的心智,点亮人民的心灯。其三,传播力是优秀音乐作品的应有之义,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特有的文化张力给音乐作品插上了金色的翅膀,在历史的天空和人民的心中自由地飞翔。实践证明,优秀音乐作品往往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传得开、留得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四,亲和力是优秀音乐作品的个性展现,历史向我们昭示:只有那些大众化、通俗化、有温度、接地气、可观赏、易传唱的音乐作品,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欢迎、真心喜欢、由衷热爱。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各安其位,相互融通,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优秀音乐作品的整体风格和独特魅力。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为例,它以独特的历史背景、正确的价值导向、宏大的历史叙事、磅礴的革命气势、强大的文化自信、丰富的音乐意象、创新的表演形式,赢得了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礼敬,从而成为永恒的时代经典和红色名曲。

(二) 优秀音乐作品应追求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相统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理所当然也是文艺的主体和文艺的中心。新时

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大众的文艺、人民的文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鲜明特征和最大亮点,更是最大优势。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只有扎根于人民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生活,文艺才能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实践证明,只有贯穿人本理念、适应人民需要、彰显人民情怀、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才能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成为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优秀作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4]为人民抒写就是要遵从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抒情就是指满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把人民的冷暖、幸福和喜怒哀乐作为文艺的主要内容。为人民抒怀就是要反映人民的心声,把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关切、人民的呼唤转化为艺术的动力源泉。音乐作为文艺的重要形式更应该自觉地坚持人民的立场,实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内在统一。音乐“一旦离开了人民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最终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翻开音乐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黄河大合唱》到《春天的故事》等一大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和福祉的关切,唱出了人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共同心声。因此,音乐只有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才能引起人民的共鸣、赢得人民的喜爱。

(三) 优秀音乐作品应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一部音乐作品要成为时代的经典,首先必须要成为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三个方面的统一。首先是思想精深,一部好的作品必然是一个有灵魂、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的作品,而一个有灵魂的作品必然是反映社会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它可以展现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其次是艺术精湛,一部好的作品必然会充分运用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必然凝聚千锤百炼、厚

积薄发的艺术功力，必然彰显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最后是制作精良，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最容易让人们接受，最容易潜移默化影响人的就是音乐，它在传递优秀思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音乐作品粗制滥造、不堪入耳，就会使人们产生厌烦和排斥的情绪，那么音乐作品对人们的影响和教化会大打折扣，所以优秀的音乐作品必然是一个制作精良的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三者辩证统一于优秀音乐作品之中：思想精深是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的基础和灵魂，艺术精湛是思想精深和制作精良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制作精良是思想精深和艺术精湛的技术支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仅仅是优秀音乐作品的内在品质，也是广大受众的客观需求。以《中国脊梁》为例，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唱红了大江南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首歌弘扬了时代主旋律，展现了大美中国梦，同时将京剧、民间小调、美声唱法与民族乐器集于一体将国粹文化的精华和民族音乐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再辅之以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的平台和设备加以呈现，以多彩的画面和清晰的音质给人以新的音乐审美感，被誉为最鼓舞人心的、最提振精气神的新时代序曲。总之，音乐作品得基于这三个统一才是新时代我们所期待、所盼望、所向往的作品。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整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创作优秀音乐作品的现实意义

音乐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童年我们有童谣，学校有校歌，民族有民谣，国家有国歌等等，我们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音乐，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都需要有音乐来传唱和表达。进入新时代，人们对优秀音乐作品的呼唤显得更为迫切，这需要我们z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创作优秀音乐作品的现实意义。

（一）创作优秀音乐作品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内在要求

音乐作为通向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语言和载

体，在诠释价值观念、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播新思想、新理念必须有好的音乐作品，凝聚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有好的音乐作品，推动中华文化立起来、走出去更需要好的音乐作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其中特别强调：“我们要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就音乐领域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用优秀音乐作品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风格。与此同时，音乐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在理论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通过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音乐作品，更便于把新思想、新理论带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当前，对我们党来说，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要有文本，也要有音乐，不仅要讲好精彩故事，也要传播中国好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强烈呼唤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优秀音乐作品。

（二）创作优秀音乐作品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总体小康的基础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需求的范围极大的拓展，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需求；需求的层次日益提升，需求的范围从生存性需要转向发展性需要和享受性需要，从物质性需要转向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于包括音乐作品在内的文艺作品的质量、品味、风格也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民需要音乐，越是物质生活改善，越是重要阶段来临，人民就越需要音乐。因为音乐对人民来说，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味品，同时也是思想进步的营养剂，更是社会和谐

的助粘剂，还是精神品格的催化劑。人民在追求美

好生活的新征程上,既需要从红色音乐作品中汲取思想正能量,也需要用时代主旋律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还需要用民族音乐来弘扬文化自觉自信,更需要用大众音乐来表达创新创业的激情。基于音乐与人民的特殊关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逻辑地包含着对优秀音乐作品的呼唤。这在客观上要求音乐领域要跟上时代发展、顺应人民需求,通过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来唱响人民美好生活的时代主旋律。

(三)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是推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音乐是文化的构成,文化的繁荣自信需要音乐,繁荣兴盛的文化需要音乐作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更是一个执政党保持自信的力量之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靠经济、军事、科技强起来,也要靠文化的繁荣兴盛。文化兴才会有国运兴,文化强才会有民族强。而音乐在文化的繁荣昌盛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音乐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音乐,在历史的沉淀、人们的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它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祖先、了解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形成了我们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音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好的传播载体。音乐传播广、影响大、易传唱等特点,决定了它在整个历史变革、时代变迁的过程中都能成为时代的先声、变革的先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音乐息息相关。音乐作为其载体可以最大限度、最快时间深入人们生活,潜移默化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人、教化人,同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新时代优秀音乐作品的鲜明特色

从本质上讲,音乐作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更是时代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期、生长旺盛期、战略拓展期。其高远的目

标追求,宏大的发展格局,生动的创新实践,丰富的内容构成渗透到音乐作品当中,定将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 优秀音乐作品应该弘扬主旋律

音乐作品不是词、曲、调、器、声等各种元素的简单结合体,也不是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直观反映,更不是人们复杂情绪的肆意宣泄,而应该是人们在一定价值观的引领下,基于切身的生活体悟,感知美、鉴赏美、追求美的一种艺术化表达。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强调:“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载体。”^[5]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在任何时代,音乐作品总是要承载一定的价值观,只有那些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才能成为时代的先声、社会变革的先导,从而被人们称为优秀音乐作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和道德支撑作用。因此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音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应该自觉履行自身的价值担当,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时代主旋律作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和首要的特色追求。

(二) 优秀音乐作品应该高扬民族风

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汇,世界音乐共通、共享、共进的大背景下,音乐作品的创作固然需要互学互鉴,多元多彩,但是最根本、最重要、最现实的就是要始终高扬民族风。正如人们所说的:在文艺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求索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也蕴含着音乐作品创作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华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跨越

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在中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整体格局中，音乐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应当自觉地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用丰富多彩而又独具魅力的中国声音、中国节奏、中国韵味、中国技法、中国旋律、中国器乐来传播中华文化，以更真实、更立体、更接地气的方式把底蕴深厚、欣欣向荣的中国唱给世界听，让世界人民对于符合时代特征。彰显民族特色的优秀音乐作品产生共鸣，进而在音乐的共鸣当中听懂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

（三）优秀音乐作品应该具有通俗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归根到底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文艺工作者“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人民文艺的本质决定了文艺作品的大众化和通俗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订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从文化的多样性来看，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途径，但是从主体需要的现实性来看，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更期待、更认同下里巴人式的文艺作品。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有一个典故，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之所以更受欢迎就在于它为人民而唱、为人民而歌，同时又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普通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记得住、唱得了，同时又让他们觉得好听、动听、耐听的音乐作品，才能真正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才能成为永不过时的时代金曲。新时代，优秀音乐作品的通俗性就意味着音乐工作者在思想感情上要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在音乐主题和音乐素材上要聚焦人民，在艺术语言表

现方式要更加贴近生活，能够让人们最大限度地体悟音乐中的情感、理解音乐中的内涵、把握音乐中的思想。

（四）优秀音乐作品应该体现专业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比较抽象的艺术，它之所以能让人赏心悦目，给人带来听觉享受，同时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主要源于音乐具有独特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较，音乐具有更为突出的专业度。首先，音乐的构成要素更为复杂多样，包含了节奏、曲调、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式、曲式、肢体等。这些不同的音乐要素能够在音乐家别具匠心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多样化的结合，从而形成音乐作品的不同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音乐基本要素的不同结合，才使得音乐具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力，也给我们留下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的文化传统。其次，音乐的表现手法更为独特，音乐说到底是声音的艺术，作为音乐表现形式的声音，既取之于大自然又高于大自然，是音乐家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它蕴含着一股强大的渗透力和穿透力，能够表达最为真切的思想与情感，并能迅速地通达人的心灵，因此人们把音乐看成一门“把人们内心的自由推向最高峰”的艺术。最后，音乐形成机理更为专业，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内在规律，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经过系统化、理论化，便形成了音乐理论中通行通用的乐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不仅要赢得人民群众在感性层面的悦纳和认同，同时也要符合乐理的内在逻辑、体现乐理的基本要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部优秀音乐作品只有在专业精神、专业规范、专业技巧上达到一定高度、不断精益求精，才能真正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四、新时代创作优秀音乐作品的实践要求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

在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地向前迈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创作与之相适应的优秀音乐作品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在结合新时代国情和基本矛盾的基础上, 总结以往经典作品所得出的重要经验。首先, 音乐工作者应该正确把握人民的时代内涵, 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深入思考是为谁创作、怎样创作和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在新时代我们说的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应该以他们为中心, 传递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让他们的态度、情感在音乐中激荡, 为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助力。其次, 音乐工作者要将人民情感与音乐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 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 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背景都不一样, 应用心去感悟每一个人, 从人们各式各样的情感中汲取创作的养分。这就昭示我们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要观照人民的喜怒哀乐、人生的跌宕起伏, 表达人民的心声, 创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品力作。音乐工作者把人民放在心中, 把人民的情感放在作品中, 音乐作品就会有吸引力、影响力、生命力。

(二)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必须坚持深入扎根人民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首先, 音乐作品要深入扎根人民生活。音乐工作者来自于人民当中, 他们在身边人和身边事中寻找创作灵感, 用音乐旋律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从这个方面说我们要进入生活的最深处, 把握生活的本质, 将生活的底蕴与音乐的温度相结合, 如此方能创作出生动的旋律和动人的曲调, 作品也才能振奋人心。现阶段, 人民生活正向着全面小康迈进, 物质生活不断

丰富, 对音乐作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音乐创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要找到人民生活中最深厚的根基, 与音乐深层融合, 让音乐反映生活。其次, 要创作音乐作品来引领人民生活。音乐创作既要反映生活又要引领生活, 它不是简单的对生活的枯燥表达, 而是将生活通过音符旋律做生动灵活的艺术再现, 使人们能在音乐作品中体验生活中的真情大爱, 再将这些情感通过音乐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生活。音乐工作者对人民生活的感悟越深, 音乐作品就会越精彩。总之音乐创作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反映人民、扎根人民。

(三)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必须坚持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 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创作音乐作品时, 要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首先要在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传统音乐能走过那么多岁月, 不只是在于它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传承, 也在于传统音乐本身具有的集合各个时代的精神。音乐创作者应该加强对传统音乐的挖掘和阐发, 继承传统音乐中的精华, 摒弃其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 使传统音乐与新时代相协调、相融合, 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其次, 音乐创作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应该是贯穿音乐创作的全过程, 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手段的创新。它不是追求怪诞, 而是另辟蹊径、不拘一格, 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新时代音乐创作应该充分利用时代的特点, 利用“互联网+”将创作方法和手段不断地更新, 用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内容推动音乐事业向前发展, 创作出高质量、正能量的音乐作品。

(四)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必须坚持整体推进音乐队伍建设

优秀音乐作品归根到底是音乐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和艺术智慧的结晶, 创作优秀音乐作品从根本上讲有赖于音乐队伍建设的整体推进。第一, 要推动音乐工作者自觉塑造自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文艺要塑造人心, 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 因此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专业水平, 将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

求。要坚定自身的艺术理想,正确认识创作不是为了一个人或一件事,而是为全社会甚至全人类。要加强日常的专业储备、德行修养,做到有专业、有品位、有德行,这样才能创作出感染人、影响人、塑造人的优秀音乐作品。第二,要为音乐队伍提供平台。音乐创作者创作作品时,要有平台、有途径,才能激发其创作热情。这种平台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方式,避免把音乐作品关在象牙塔里。第三,加强对音乐队伍的正确引导,音乐作品能够感染人、塑造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就要在根源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从宏观微观各个角度对音乐工作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使其将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音乐作品中。

参考文献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3][4]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2).
- [5]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 (2016-11-30) [2018-01-0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mes of Excellent Musical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Literary Thoughts

Hu Yihua Pan Ti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have to create outstanding works harmonious with the times. Excellent music works are rich in the essence of the times, and are embodied in three unities, that is, the unity of appealing,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and affinity; writing for the people, sympathizing for the people, expressing for the people; deep in thought, and exquisite art, fine-made production. The creation of excellent musical works in the new era processe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s the proper mean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s better life, and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owing demand for good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whole society strongly call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style, the promotion of the main theme, the popular and the professional musical works. The creation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n the new era must focus on four aspects: insisting on the people-centered creative orientation, deeply rooting in people's live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teams as a whole.

Key words: Xi Jinping's Literary Thought; New Era; Excellent Music Works; Creation

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

——习近平关于党内规矩的重要思想论析

郝保权

摘 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它有着深刻的逻辑基础，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所证成以及中国共产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过去不代表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精髓要义仍突出表现在崇尚学习，善于总结工作经验；谦虚谨慎，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注重组织观念，倡导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同时，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面临着现代转换问题，要妥善处理好其与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等意识形态的支撑关系；要坚持以上率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规矩；要注重结合运用党内其他制度和机制保障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纪律建设；党内规矩；非正式制度；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2-0016-10

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一切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有力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具鲜明特点的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领”、全面深化改革之“舵”、全面依法治国之“率”，不断开创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新境界^[1]。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14次言及“规矩”一词，并首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党内规矩的范畴。他指出，“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具体内容包括“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

是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规矩范畴的擘划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党内规矩范畴具有两大来源：一个是成文的、刚性的规矩，即党章、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这些党纪国法纲举目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纪律体系；另一个是不成文的、相对柔性的规矩，即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它们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行为规范的重要遵循。而且，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它对于规范政治主体行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淳化政治习性、优化政治环境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坚持和发展、完善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使之成为柔性纪律融入到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教工委规划教材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论”，项目编号：2017JC01；中央高校人文社科基本科研业务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集中制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G2017KY020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契合与实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郝保权，男，陕西靖边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党的思想文化和日常行为当中，在纪律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和功能，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一个意义重大、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逻辑基础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党内规矩范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基础。它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所证成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坚实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从而为党的纪律和规矩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

“规矩”一词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规”“矩”本是画圆和方的工具，“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后来词义演变，“规矩”逐渐成为了“准则”“法度”的代名词，与“准绳”“绳墨”之义相通^[3]。几千年来，规矩意识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族群心理、意识和价值取向的组成部分。韩非子有云：“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孔子曰：“己不正焉能正人，己心不安焉能安人？”；孟子道：“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吕氏春秋》写道：“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宋代宰相吕公曰：“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之外。”……由此可见，规矩作为传统社会中的公序良俗，具有秩序、规范与整合的作用。它成为中华民族上至贤人志士、下至普通百姓的集体认同和共同操守，随处可见于各种典章制度和乡规民约当中。而且，规矩比法律的作用更加广泛，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生活中秉承的原则，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遵循的礼仪准则^[4]。规矩犹如阳光和空气一般，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规矩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深厚历史积

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一步发扬光大。此外，它还具有两项重要意义：一是从外延上看，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扩大了党的纪律建设覆盖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从内涵上看，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为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划定了明确的“方”和“圆”。一方面，它用各种具体的要求画框，建立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它也用各种限制为党员干部画圈，使之不能逾越这个范围，从而为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界限。

（二）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

没有规矩就不能称其为政党，更不能淬炼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的精神品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看重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并认为在大工业生产中所锻造出来的无产阶级的这种品质特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看重党内纪律和规矩对党员的要求，并时刻把守纪律、讲规矩作为客观的标准严格遵照执行，以此锤炼自己的品行。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影响，成为党的建设史上一个伟大创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欢迎；刘少奇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扬党内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光辉典范，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体现了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党性修养和行为自觉；革命胜利前夕的西柏坡，更是一个立规矩的地方，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完善的动力源泉，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其内涵在不断

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着重点在于从制度上建党；江泽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胡锦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习近平主抓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开展党内纪律和规矩集中教育活动，真正让纪律严起来，把规矩立起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守。”^[5]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坚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使所有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培养良好的行为品质，确保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三）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理论证成

制度是约束和激励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系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的存在形式，制度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它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在政治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党章、党纪、国法等作为硬性约束，属于正式制度；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作为软性内容，属于非正式制度。作为政治生态组成部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它们之间存在着形成机制、保障机制、演进路径的不同。在形成机制方面，党章、党纪、国法等具有严格的程序，须经过制度制定者认可，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经过党长期的宣传和提倡所形成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互动过程；在保障机制方面，党章、党纪、国法等具有强制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维持机制在于自我约束；在演进路径中，党章、党纪、国法等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做出调整，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则具有超稳定性，只能缓慢改变^[6]。

以上诸种不同说明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各自有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但同时也反衬出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统一、相得益彰。这主要表现

在：其一，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依赖。党章、党纪、国法等正式制度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否则就无法完善实施，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非正式制度要以正式制度为保障，否则就会产生消极作用。其二，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补充。这是因为党的纪律不可能面面俱到、穷尽所有情形，这就需要党内规矩作为补充，实际上党的纪律往往是原则层面的，而党的规矩多是操作层面的，两者之间完整一致才能达到实践中的和谐统一。其三，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转化。党的规矩作为非正式制度，它促使政治主体形成政治习性、达成行为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加自觉地遵守纪律规范。

因此，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来看，我们一定要运用系统的、生态的、联系的、非线性的观点去看待政治体系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可偏颇^[7]。对于党内成文的规章制度，党历来很重视，能够做到及时把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转化为成文的制度规定。而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种软约束和自律要求，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现在要强化这方面意识。其实正式制度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与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验，而非正式制度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与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尽管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8]。

（四）基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人不以规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党内纪律和规矩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带头守纪律、讲规矩，起到表率 and 领导作用，那么就可以很快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不断激发共产党员的政治正能量。这种

政治正能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内生权威，它是我们党要获得长期存在和长远发展所必须具有的吸引力、凝聚力与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培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与向心力，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从现实诉求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破坏纪律和规矩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为：缺乏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原则面前不坚定；妄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言辞论调与党中央不一致；自身党性修养不够，党员纪律观念不强；热衷于立山头、编“关系网”，搞“圈子文化”；做政治上的“双面人”，在行动上与党离心离德；经济腐败，将党内纪律和规矩视作可以随便拿捏的“橡皮图章”；自由主义倾向严重，集体主义精神不足；或者将党的纪律和规矩视为形同虚设的“稻草人”，导致党内纪律和规矩失之于宽、失之于严，等等。以上诸种现象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政党建设任务，它是中国政治深入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中国政治走向清明的历史自觉。而要解决好所有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切实解决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抵制一切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因此，我们一定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融进血脉、注入灵魂，匡正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行，高悬纪律和规矩戒尺，使之真正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和政治本色不褪。

二、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精髓要义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凝结而成的，由于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精神内涵。具体而言，外在表现形式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党的优良传统在不同时期因应时代需要而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党内出现的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流失的状况，大力弘扬以下几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对重塑党内规矩的纪律性和约束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

（一）崇尚学习，善于总结工作经验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建党兴党的重要方略。中国共产党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诸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行者，在当地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会后，毛泽东要求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全党“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所以，党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学习运动，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革命即将胜利时，“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即有“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要求“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在地学。”^[9]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高度重视学习，并有组织地进行学习，进入21世纪，2002年12月，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这标志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建立。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重申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本领恐慌”问题。理论上的成熟是党员和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忽视学习，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党员和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甚至破坏规矩和违法违纪的重要原因。因此，新形势下全党要大兴学习之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党的这条优良传统弘扬好。

（二）谦虚谨慎，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始终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时倡导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还把忧患与勤政相联系，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宝贵经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看过《甲申三百年祭》后，把它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致信给郭沫若：“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0]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召开这次大会的时候，党的历史问题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光明多得很”。但是，毛泽东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却强调要“准备吃亏”，并一口气列举了可能会遇到17条困难。1949年3月，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了，然而“因为胜利，党内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毛泽东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如此，“不当李自成”的话题常说常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又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我国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淡薄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和风险的出现，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难以

避免的。因此，全党必须坚持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谦虚谨慎和保持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延安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克服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极大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延安整风中，党总结了历史上曾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原则。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呢？那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2]在整风中，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阅读整风文件，联系自己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检查、反省自己，弄清了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最后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尤其强调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一种精神，融入党的血脉，成为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锐利武器，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因此，毛泽东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把“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列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和党风。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的少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13]。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

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习近平多次强调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用好，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活动中的民主生活会与党员大会做到“红红脸，出出汗”以达到“排排毒、治治病”的目的，这正是对整风精神，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发扬。

（四）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比如在延安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4]。面对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党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难关，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艰苦奋斗的“艰苦”与其说是指条件或环境，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主要通过刻苦的思想、艰苦的作风和顽强拼搏的工作来展现。因此，艰苦奋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永远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

党正是在艰苦奋斗中密切联系着群众，在艰苦创业中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当经常“洗脸”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弘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孺子牛”，为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优良传统，他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1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当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要自觉坚守岗位”，指出节假日能自觉坚守岗位，也是一种规矩。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17]

（五）注重组织观念，倡导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围绕党章第一条发生了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组织分散、成分复杂的政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18]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员参加党的一定组织，积极为党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始终是我们党明确的政治规矩。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打得比较顺利时，党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的情况屡有发生。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活动要向组织和上级组织报告，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非常明确的党内规矩。

有组织观念，办事讲程序，彰显着党的组织纪律，凝结着党的工作规律，维护着党的权威和工作秩序，按程序办事就是按规矩办事。党员干部只有懂得组织运行的程序，明确自己的权限，才知道纪

律的红线在哪儿、不至于破坏规矩。正如习近平所讲的“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19]。针对党内请示汇报、组织程序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少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汇报，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20]。同时，习近平强调：“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有无组织观念、是否遵守组织纪律提高到党性的高度，“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21]。

三、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现代转换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党长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党健康发展的有机成分。长期以来党注重倡导、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去弘扬，充满了理想色彩光芒，没有作为政治纪律和规矩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潮兴起，各种理念传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受到侵蚀，包括党内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开始不够重视，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任凭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成功经验和伟大精神削弱，必然会消解党的肌体，削弱党的权威和影响力，必将导致党的纪律性和严肃性大大降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降。只有创新党的建设，严肃党的纪律，根据形势需要，从微小处着眼，充分利用各种要素，整合资源，管党治党，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处在不断生成和发展当中，因此，是一个历史性范畴，每一具体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均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形成，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党的活动精神的概括，势必打上了一定的时代烙印，这是其历史价值。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要与属于正式制度的成文的党内法规相匹配与适应，必然存在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这样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现代价值才能彰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

历史起点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管党治党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既是继承与弘扬的过程，更是发展与转化的过程。因此，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时代精神，发掘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现代价值，使其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更好发挥作用，须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弘扬和发展需要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等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本就是党的性质、宗旨和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弘扬优良传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价值，以党的核心价值为支撑，就抓住了弘扬与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内核。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敌人多么强大、环境多么险恶，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靠的就是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在中国以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22]何况做自我批评。正是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才敢于真正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同志也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就会破坏规矩，“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23]。所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建设，党员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才能真正传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第二，弘扬和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以上率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规矩。在党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既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本身也是一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守纪律、讲规矩必须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党的规矩，通过榜样的言行，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崇高精神和良好行为规范具体化、人格化，从而增强优良传统传承和工作惯例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一批榜样就是一种风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倡导者，培育者和实践者。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倡导者，也是这一宗旨的践行者。比如延安时期的“只见公仆不见官”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前辈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毛泽东在听到“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骂声后，并没有“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是深入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最后“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当今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以上率下。“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率先垂范，然后层层制定、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逐条落实、不折不扣落实“八项规定”等规矩，以上率下、示范全党，所以才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三，在弘扬和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同时，注重党内成文纪律的建设，用党内其他制度和机制保障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正如上文所述，不成文的规矩与成文的规矩作为党内规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互补性，二者相互转化。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只有不断与时代发展、任务使命、党员实际紧密结合，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才能不断增强传承针对性、实效性。因此，要及时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转化为党内成文的规矩，通过“立明规则，破潜规则”，从而“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等都有相关规定，这些党内法规的明文规定，正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转换和发展，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党的纪律建设，从而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有效途径。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既要依靠重拳反腐斗争、“三严三实”活动、全面从严治党等祛除党内不良现象，

也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遵循良好的工作惯例，这是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自觉培植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使广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与党的性质、宗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人与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体现，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需要传承和发扬的优秀品质和行为习惯，是共产党人的营养品和精神灵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底纠治“四风”“两学一做”等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广大党员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洗礼和灵魂陶冶，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象，将党的规矩意识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不断开创着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既是共产党人的重要遵循，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只是开端，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使之成为广大党员的人格力量、示范准则和自觉行动。在当前形势下，广大党员应该加强党性修养，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使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成为共产党人的“标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并不是表面说辞，而是源于落实落细的尺寸之力。只有从细节出发，始终不失小节，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彰显共产党人的楷模风范。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才能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坚定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使广大党员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因此，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优化党内作风、规范党内纪律和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必须长期重

视并加以落实的重要行为指南。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才能在新时代有新担当和新作为。党性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牢记共产党员的本心，才能百炼成钢，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要牢记，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要真正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需要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坚决的斗争，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打破党内生活的不良惯性，涤荡党内不良政治文化风气，应对各种挑战和考验。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为党的纪律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广大党员干部要彰显独特的资源优势，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李斌雄,张银霞.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利益基础和生态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27-37.
-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9.
- [3]丁喜霞.“规矩”及相关词语的衍生和演变[J].南京社会科学,2004(6):85-88.
- [4]刘红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员干部要懂得讲规矩[N].辽宁日报,2015-04-07(1).
- [5]人民网.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14(1).
- [6]武星.依规治党:论中国共产党“正式规矩”和“非正式规矩”[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11-15.
- [7]陈朋.纪律规矩建设的政治生态学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16(9):144-151.
- [8]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1481.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7.
-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53.
-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 [16]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6(1).
- [17]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2).
- [18]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2.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01.
- [2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1.
- [2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9.
-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6-107.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Rules: a New Concept of Par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the Rules of the Party

Hao Baoquan

Abstract: It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incorporate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nto the rules. It has a profound logical foundation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s sense of rules, the historical follow-up of the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past does not mean absence or utterance right. The essence of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s still prominent in advocating learning, being good at summing up work experience; being modest and cautious, having strong sense of urgency; going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nd being strict inner-party political life; doing hard work, being busy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sacrifice; being buried in organizational concepts, and advocating the collectivist values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are also facing the problem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its ideological suppor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y's ideals, beliefs, and purposes. The leaders in our CPC, especially the leading cadres of the Party have to set a positive example to the cadres of grass-roots unit.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use of other systems and mechanisms within the Party to ensu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arty Rules; Informal Institutions; Modern Transformation

对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潘懋元先生访谈

潘懋元

摘 要: 访谈中, 潘教授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微观教学研究、教师发展中心与教师发展、双一流建设等热点问题谈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 教师发展中心; 双一流建设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18) 02-0026-05

李 辉 (以下简称“李”): 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专访, 并给予我们珍贵的这次学习机会。您早在1956年就提出必须建立“高等专业教育学”, 但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这一主张搁浅。二十年后您再次倡议, 最终高等教育学于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请问是什么缘由让您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科? 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创立高等教育学科?

潘懋元 (以下简称“潘”): 我觉得一个人做某种事情, 成功往往就到此为止, 失败则会使人继续奋斗。但要敢于失败, 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母。20岁以前, 我的主要兴趣是文学。我写过小说, 写过文艺理论, 我的笔名现在还在《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①里。20岁之后, 我感到从事文学非我所长, 因为从事文学需要多些感性, 少些理性; 文学不是说道理的, 不是逻辑思维的。所以20岁之后, 我有自知之明, 不搞文学了, 专门从事运用逻辑思维的学习与研究, 因为我学的是教育, 就搞教育理论。我35岁之前学的是普通教育理论, 研究的是普通中小学的教育。由于我以前有一定的古文阅读能力, 所以着重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

35岁以后, 由于既在大学教书, 又在大学兼任行政工作, 结合我的教育理论基础, 就转为研究高等教育问题, 以后就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这个过程中, 都有失败的驱动力。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师, 但在课堂上我管不了小孩子。那个时候小学生的年纪都有大有小, 不像现在小学生的年纪都一样, 所以我教小学失败了。失败促使我不继续读普通高中而读师范学校, 学习如何当小学教师。抗战初期, 我当了两年小学教师。1941年, 我考进厦门大学教育系, 一方面念教育课程, 一方面在中学兼课。学的、教的都是相当于师范学院的普通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但是, 解放之后, 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综合大学的本科生, 有一部分要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助教; 南下干部, 转入高等学校当领导干部的, 也要按毛主席当年提出的要求, “变外行为内行”, 要我讲讲大学如何管理。我按照普通教育学的理论和教学方法, 讲的是如何办中小学, 如何教中小學生。大学生不满意, 大学干部也不满意; 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促使我研究高等教育, 并与教育学教研室的几位教师合作开设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 既讲普通

作者简介: 潘懋元, 男, 广东揭阳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中共党员,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 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英国Hull大学名誉博士。

的教育原理，也着重讲高等教育理论知识。同时编写了一本讲义，请有实践经验的教务处干部提意见。由于当时我已经是厦大教务处长，教育部正要各个大学把有特色的新编讲义拿到全国交流，我就把这本讲义报上去。经教育部同意，这本讲义作为全国交流讲义，主要发到全国的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就这样搞起来的。现在许多当时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图书馆还有这本藏书，据我所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就有这本讲义。总之，我认为要敢于面对失败，找到失败的原因，找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母。

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科学的春天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春天，因为高等教育是研究和发展科学的。“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家痛定思痛，反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原因是违反经济规律。经济要发展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逐步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教育是重灾区，同样是违反了教育规律办事，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教育部门都在思考如何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那么教育规律是什么？

这就促使我不得不考虑教育的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当时的一机部在湖南大学办了一个培训班，是一机部所属的高校校长和教务处长的培训班，邀请我去做报告。在这个培训班，我讲的是教育的规律以及教育规律在高等教育上的应用。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教育历史总结，通过理论思考，我提了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必须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适应。因为教育的发展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同时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就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二，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内部诸多因素的关系。当时首先提出的是德、智、体、美诸育应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不能只强调其一；其后，再继续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是：教育的要求必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适应。大学生跟中小学生不同，中小学生是要有监护人的，大学生没有监护人，能独立发展。世界上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大都规定为18岁以上的青年，大学生大体上也都是18岁以上的青年，所以教育要必须适应这个年龄段，同时要促进这个年龄段的

学生的成长。比如，你对小学生说：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是好的、那样不是好的，小学生听了就接受了，他们觉得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但如果对18岁以上大学生讲述同样的内容，老师说了之后，他会思考一下，他不一定同意老师说的。因为他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大学老师需要讲明道理，让学生认可。所以我讲了这两条规律。过去没有知识产权，他们把录音整理之后就传播出去了，实际效果很好，因为许多大学校长都觉得这些知识很有用。在当时许多大学校长的推动之下，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很快建立起来，而且发展得很快。1981年，我开始招硕士生，1984年我们申请到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6年，我们申请到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

李：创新创业是高校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您认为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应如何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潘：创新创业作为一种战略，既包括学校，也面向所有的企业。企业也需要创新，如果做得不好，创新创业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创新和创业是有区别的，学校可以进行创新教育，也可以进行创业教育，但是学校没有办法承担完整的创业教育。创业必须是学生在自己的摸爬滚打之中才能完成。创新可以获得知识、理念等等，创业也可以获得，但创业教育只能够在实践之中完成。很多时候创新创业变成口号，大家都说创新创业，但真正的创新创业教育离不开实践。例如，泉州理工大学这样一所民办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学校的整个环境都充满着创新的氛围。水龙头下一伸手，自来水就会出来；教室不用空调，就可以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树种在楼上；汽车开到屋顶上；学生粪便变成了沼气；还有一个大的创新是把污水变成了饮用水。可见，学校到处都是创新，很自然的这里的学生一天到晚都在思考着创新。有些学校把创新创业的口号叫得很响，但是没有创新，没有实践，只是作为口号在讲。如果学校都没有创新，怎么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学生？所以创新创业是行动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完成的。

李：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您觉得我

们在观点上应有哪些更新?

潘: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既要有水平,又要有我们的特色。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向西方借鉴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同时,又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应有国际的共同认识,才能具有共通的发言权。2017年11月,我们厦大教育研究院召开了一次“2030理念和行动”的会议。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干事,共有八个国家的专家参加。因为“2030”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仁川宣言”中定下来的。“仁川宣言”为“2030”定下四个理念,也就是达到2030年的愿景。第一个是“全纳”、第二个是“公平”、第三个是“有质量”、第四个是“终身学习”。这四个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下来的,我们的行动要能够与之匹配。开始的时候,“全纳”的理念针对的是有残疾的儿童,要包容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上学。现在“全纳”理念的含义已扩大丰富,包括无论你是谁什么民族、什么宗教,都应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就应当自省我们的行动是否做到了?第二个理念是“公平”,这是我们近些年来十分重视的,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我们现在还有不公平之处,西部的发展不如东部,许多高校还常常去西部挖人才,这就不公平了。第三个理念是“有质量”,高等教育发展一定要注重质量的建设,我们提出了内涵式发展,就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还有一个理念是“终身学习”,我去年与李国强副教授合编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讲终身学习。目前我们在终身学习这方面的观念还不够强,虽然把终身学习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但只是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而不是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对象应包括所有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很好的运用。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从落实这四个理念做起。

李:教师能力的持续提升是高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您觉得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应如何理解教师发展,您认为应如何建设好教师发展中心?

潘:教师发展必须要有动力。教师发展以前

被称为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和教师发展是有联系但不同。在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教师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现在强调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因此20世纪末提出了教师发展的新理念。教师发展是教师主动要求自我发展。促进教师自我发展的动力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奖与罚、行政上所制定的业绩考核与评估、职称的晋升、工资及其他待遇的提高,以及优秀教师的评奖、社会声誉的提高,等等。外部动力对教师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倘若使用不当也会引起消极影响,例如重科研轻教学的业绩考核、引发内部矛盾的排名、过于繁琐的量化考评、以及只对少数高水平教师起作用而对一般教师来说是无关的评优,等等。内部动力有三个要点:第一,自我价值的追求,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第二,发展性的自我评价,即,不是同他人比较,而是对自身成长进步的自我反省;最后,进入“敬业、乐业”的境界,也就是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2012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32所高等学校设立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此外,很多地方性大学也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现在全国很多学校都有教师发展中心,有做得很好的,也有很多只是走过场,没有做好。没有做好的教师发展中心有种种原因,例如:学校不重视,老师不理解,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只在校一级层面展开活动。我们知道,教师的活动一般不是在校级开展的,而是在二级学院、学系、专业等层面活动。但目前大部分教师发展中心主要在全校这个层面开展活动,例如:开展全校性的教学研讨,组织一些优秀教师进行公开课展示等等,这些活动都很好,但没有深入下去。后来我们发现,教师发展中心的活动如果悬在半空中,没有深入下去,就很难真正办好。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如果只在全校层面的平台上开展活动,而教师的活动又是在院系以下的基层,教师发展中心缺乏基层组织的支持,难以深入,无法扎根。因此,如何建设基层组织,是大学教师发展取得成效的保障。

大学以前有教研室,现在基本没有了。解放初期,学习苏联,将教授、讲师、助教等等,分别

组织在不同的教研室或教研组中，对教师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中国没有培养博士，只有少量学校招收一点研究生。虽然教师的水平有差别，但一般来说大学老师都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当大学老师，当助教。助教由教研室培养，教授亲自带助教。助教不能上课，但可以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助教在走上讲台前，需要在教研室试讲，试讲通过后，才可以为学生授课。现在大学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大多不再设立教研室。或者把教研室改为课题组、研究中心、研究所，或者成为基层行政机构。但在中小学校，还有学科教研组和年段教研组之设，起互帮互学的作用。

李：您之前在文章中提到，教师发展中心要重视微观教学研究。您能否针对如何利用教师发展中心的平台开展微观教学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潘：宏观是政策制度方面的研究，微观是教学方面的研究。宏观研究指明方向，微观研究如果缺乏宏观的指导，方向不明；但宏观通过微观落实，不然只是空话。教育管理部门所关心的主要是宏观的政策制度，这可以通过文件下达而实现，但是真正提高教育质量要落实到微观方面，必须由教师具体落实。微观教学研究主要指课程、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发展方面的研究。现在国家提出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正是要求我们的研究要深入下去，用“小题大做”的方式研究微观问题。现在各个高校可利用成立教师发展中心的时机，对编写教材、开展网络教学、改进产学研三结合教学等方面开展微观研究。

我以前研究高等教育是从微观入手的，研究的是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等，但后来我不由自主地从事宏观研究，丢掉了微观的东西。我觉得，现在需要更加注意微观方面的研究，需要各方面有关的专家共同研究微观问题。但我现在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寄希望于年轻人回到微观去进行研究。

李：您如何看待我国正在统筹推进实施的“双一流”建设？

潘：现在很多人对“双一流”的理解就是“排名榜”，大学排名榜和一级学科排名榜。一流大学和一级学科的排名都是按照精英大学来排的。如果

我们都只能按照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来办大学和设置学科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因为现在经济社会正在转型发展，转型发展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更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高水平的有创新性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还需要“大国工匠”。我们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为什么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因为经济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的。因此，进入大众化阶段和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双一流”建设，就不能仅限于排名榜上的几所精英型大学和这些大学中的一级学科。我前段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讲的主要是用“双一流”这个精神和模式来对待所有类别的学校，也要给它们各自建设一流的机会，而不是仅仅让研究型大学参与“双一流”建设。“双一流”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的几十所和几百个学科，而应该是全国两千多所高等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科，大家都应是各自不同的一流，应当有培养科学家的大学，也有培养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高水平有创新性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以及职业技能型人才，像“大国工匠”那样人才的高等学校。

在“双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面，我还认为不能只搞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一级学科往往是很广泛的，而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新学科的出现往往在二级学科及以下。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既要有深厚的基础、广阔的知识面，更要有专深的知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才要在博的基础上有所专，要专的很深。这个“专”不可能都在一级学科里面，很多是在二级学科，甚至交叉学科中进行培养的。一级学科有利于培养综合性的管理人才，二级学科更有利于培养科学创新人才。并且，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尤其要重视每所学校特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总之，“双一流”要统筹推进而不要畸重畸轻，一方面，“双一流”的学科建设既要有所专，又要有特色；另一方面，要把“双一流”的精神和做法铺展到各级各类学校，各个层次的学校都应有它们的一流，这样才能使大家共同努力，合力建设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强国。

李: 您对上述高等教育问题的阐述, 相信一定会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 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

注释

①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湖南文学出版社, 1988年, 第691页, 录入本人青年时期所用的6个笔名及其代表作。

Thoughts on Several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view with Mr. Pan Maoyuan

Pan Maoyuan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 Pan mainly talked about the higher education issu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cro-teaching research, the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研究生教育学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王战军 杨旭婷

摘要: 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研究研究生教育问题、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及其运行特征的学科,是在研究总结提炼研究生教育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并经过长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积累逐步发展成的知识体系,是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学是顺应社会发展、教育学学科发展需求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积累而出现的教育研究新领域。研究生教育学的构建要树立新理念、采用新范式,探索一条新兴学科发展新道路。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学;教育学;新学科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31-08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研究生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关键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已经构建起了包括两个培养层次、两类培养形式、两种学位类别、十三大学科门类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当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研究生教育理论的支撑和引导,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创立研究生教育学,是社会需求,是教育学内涵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一、研究生教育学产生的动因分析

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需求会产生较大变化。教育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成果积累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 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迫切需要研究生教育学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7年正式发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教育形式,是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支持技术变革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和先进科技的需求推动了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和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入新征程的今天,我国明确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发展战略,将人才作为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战略资源,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将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研究生教育有效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作用,以科学的研究生教育支撑国家发展。

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对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提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评价体系与推进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ZD044。

作者简介: 王战军,男,河北邯郸人,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研究;杨旭婷,女,河北唐山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从事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面临着一系列新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情况关系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质量,也影响着有效发挥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功能。尽管不少学者已经通过研究解释了部分研究生教育现象,为解决某些研究生教育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总得来看现有研究仍然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1]的零散阶段,处于解决表层问题而缺乏深入系统理论研究的状态,尚未构建起有效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对于研究生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怎样构建研究生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调节机制?怎样科学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如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这些基本问题仍然没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急需构建研究生教育学,从学科角度出发,推动研究进展,搭建学科框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地回答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为研究生教育实际问题解决提供科学的理论性支持。

(二) 教育学的发展需要拓宽研究领域

教育学是人们对教育活动理性认识的集合,从17、18世纪教育学产生至今,教育学的学科内涵逐渐丰富,学科体系日益健全,并伴随着时代发展在研究深度、广度上需要发展。从研究的深度来看,教育学的学科内涵随研究视角的扩充而逐渐丰富,实验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批判教育学等,教育学家从不同视角透视教育现象,他们的理论争鸣使得教育的内涵、本质、规律更为清晰。从研究的广度来看,教育学的研究范畴随着教育问题域的扩大而不断拓展。教育学是一门具有显著实践取向的社会学科^[2],新的教育实践的积累和教育问题的出现是推动教育学丰富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体系的重要来源,教育学就是在研究教育新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学科发展、体现学科价值的。

研究生教育是近年来教育学研究领域拓展的重要表现,教育学要回应研究生教育的实践发展,需要从学科层面对其进行理论探索。从2010年开始,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以每年30%的增长比例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招生数达到66.7万余人,在学规模已达到198万余人^[3]。与此同时,一大批世界一流高校开始将研究生教育作为人才培

养的主体,将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发展的重要使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的产生突破了教育学研究的原有领域,新领域的产生要求教育学组织新力量、采用新思路,着力开展研究生教育专门研究,集中回答研究生教育问题,形成研究生教育科学理论,指导研究生教育实践。

(三)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成果积累为创建研究生教育学提供了条件

学科是知识的积累与聚集,已有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为研究生教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首先,各类研究成果初步搭建起了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2010—2016年,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被历年CSSCI数据库收录文章5000余篇,学位论文2300余篇,出版著作240部^①。已有研究成果既有理论上的逻辑阐释,也有实践上的经验总结,既有基于教育学研究视角对研究生教育的审视,也有基于多元学科视角对研究生教育学的新思考。研究内容从宏观的研究生教育战略规划、政策法律、管理体制、改革,到微观的导师指导、课堂教学、实习实践,再到质量保障、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外国研究生教育等各类专题研究,研究范围基本涵盖了研究生教育的各个层面。多种类型、多元视角、多个层面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形成了核心研究群,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教育研究专门团队。学术共同体的产生与成熟是学科成长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并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凸显出了几个核心研究团队。同时,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学位点的正式设立,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学专门人才培养开启了新征程。2017年,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分别开设了研究生教育学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2017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核心群的形成和学位点的设立,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学研究队伍的专业化、体系化发展。

在学科知识积累的同时,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社会建制逐步完善。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是内在观念建制的社会形式和自然延伸,也是学科内在观念建制发展成熟的重要条件^[4]。经过近四十年发展

实践,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的社会建制正在逐步构建起来。在研究专门机构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研究院为研究主力的核心研究机构群,如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等。在学术团体方面,1994年我国成立了研究生教育学最早的学术团体——中国研究生教育学会,之后,又陆续成立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以及各地区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学术期刊方面,目前聚焦于研究生教育领域且被CSSCI(2017—2018年版)收录的期刊有两本,一是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二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学会联合创办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两本期刊已经成为我国宣传党和国家研究生教育方针,研究、推进研究生教育理论创新,交流、宣传研究生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

二、内涵与特征:对研究生教育学的解读

外部需求和内部积累共同培育了研究生教育学产生的良好环境。而要科学构建研究生教育学,首先需要我们从本体论层面,正确把握研究生教育学的内涵与特征。

(一) 研究生教育学的内涵解析

研究生教育学是研究生教育学本质的、特有的属性的总和。简单的说,研究生教育学是人们对研究生教育的一系列理性认识的集合,是一门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科学。主要从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四个方面来描述研究生教育学的内涵。

1. 研究对象:研究生教育问题

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成为学科的基本前提,对研究对象清晰、深刻的认识则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5]。明确研究对象是研究生教育学要完成的关键任务,如何把握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我们认为,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生教育问题。研究生教育

问题指的是研究者基于研究生教育视角,在认识研究生教育现象、开展研究生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发现的矛盾。研究生教育学是关于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生教育学就是在发现并解决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内在规律、建构学科体系的。

对于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做出几点说明。第一,研究生教育学是以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视角来审视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对于一项事物的看法会因思考视角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解释,同样的研究生教育问题,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从而可能产生哲学研究生教育学、政治研究生教育、经济研究生教育理论等等,这种多样的研究视角容易造成研究生教育学边界与框架的模糊,不利于探索研究生教育本身的规律,也无法形成研究生教育知识体系。因此,研究生教育学在探索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从教育、研究生教育出发,聚焦研究视角。第二,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生教育问题,是对研究生教育全过程中各类问题的一定概括与抽象。研究生教育学不是对研究生教育问题包罗万象的研究,而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问题、基本关系和基本领域^[6],围绕研究生教育本体,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问题。第三,研究生教育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研究生教育问题产生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实践当中,研究生教育学是在解决研究生教育现实问题的过程当中形成并发展起来,所产生的理论最终也要回归于研究生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研究生教育学是在研究对象的变化中探索规律,以研究生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教育学能够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研究生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社会现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的活动、工作领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一定边界的、有独特结构的社会存在领域。因此,研究生教育问题也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复杂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很难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概括出研究生教育问题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系统思维方式,将研究生教育问题归纳为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研究生教育问题侧重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

发展情况,如研究生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关系,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等;在微观层面,研究生教育问题侧重于研究生教育育人状况,包括科学招生、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学位授予、导师指导等。

2. 研究目的: 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

研究生教育规律是蕴藏于研究生教育现象与问题之中,并对其起决定与支配作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是研究研究生教育问题的最终目的,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探索就是透过教育现象、解释教育问题,看到教育本质的过程。

在探讨研究生教育规律“是什么”之前,我们可以逆向思考,通过反思研究生教育规律“不应该是什”来明晰研究生教育学规律的内涵与内容。

首先,研究生教育规律不仅仅是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积累。尽管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研究生教育事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这并不等同于能够将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列为研究生教育规律。实践经验对于解决某个时期的某一问题具有适切性,但并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必然性,将实践经验作为规律不利于科学的发现研究生教育本质问题、指导现实发展,甚至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其次,研究生教育规律不能想当然的整合、推演、套用,而需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独特的自身特征和明确的现实价值。目前教育领域的很多经典规律都能够揭示研究生教育的一些内在属性,例如教育教学的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寓教于研、教学相长等,这些教育智慧对于今天的教育依然适用,这些零散的教育哲理经过整合可以是研究生教育规律的一部分,但不能将这种整合的部分规律等同于研究生教育规律;同时,研究生教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生教育学也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教育的规律、高等教育的规律进行主语切换而推演出研究生教育的规律;除此之外,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认识是研究生教育学的重要任务,对于建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指导实践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因而,我们研究研究生教育规律不能简单地套用哲学的概念,将研究生教育规律形容为一种研究生教育各要素之间内在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必须阐明规律的内容及其关系,使探索出的规律具有科学性、共识性、指导性。

回到最初问题,究竟什么是研究生教育的规律呢?潘懋元先生的“两个规律论”^[7]、赵沁平院士的办学规律、发展规律和育人规律^[8],对于我们探索研究生教育规律具有启发意义、指导意义。从哲学层面看,研究生教育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被人们认识到的研究生教育问题是研究生教育规律的外在表征,而研究教育规律是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内在本质解释。因此,我们可以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来探索研究生教育的规律。如上文所说,研究生教育问题包括了宏观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与微观的研究生教育育人两个方面,那么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出研究生教育的两类基本规律。

研究生教育的第一个规律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指的是研究生教育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相互关系和必然联系。研究生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研究生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需要在大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身合适的定位,协调好与周边其它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有两重内涵,一方面,研究生教育既要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需要,在适应需求的过程中理清方向;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也要通过发挥自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功能来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第二个规律是研究生教育的育人规律,指的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研究生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培养高水平、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教育,这是研究生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根本特征,决定了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规律与培养活动的特殊性。研究生教育的育人规律也有两重内涵,一是研究生教育要符合研究生的身心发展特征,符合人的认知特点,适应高层次人才成长与发展需求;二是研究生教育要积极协调运用各类育人要素,激发研究生的创造性,实现预期的育人目标。

依据这种逻辑构建的研究生教育二元规律体系,分别回应了研究生教育的宏、微观教育问题,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解决的是研究生教育如何处理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来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題,研究生教育的育人规律解决的是研究生教育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如何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问题。既反映了教育活动的共性特征,也体现了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为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以及之后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向。

3. 研究内容: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一方面是遵循从基本问题、基本规律等方面进行探索,另一方面更要注重从学科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方面进行研究,才能推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9]。学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体系,是对其研究问题、方法、内容的结构化,基本反映了该学科的整体面貌和理论水准。学科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一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问题,关系到学科的未来发展,是衡量学科成熟度的标准之一。当前,构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切实可行的^[10]。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探索了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体系。薛天祥认为研究生教育学由对象分支学科、宏观分支学科、微观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四大类分支学科组成,每类又可以分化出下一层次的分支学科^[11];叶绍梁从基础理论与总体把握研究、研究生教育规律研究、研究生教育实践与操作研究、研究生教育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研究四个层面分别论述了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成^[12];王续琨等从对象分支学科、宏观分支学科、微观分支学科和边缘分支学科四个层面划分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体系^[13];也有学者直接罗列了典型的、重要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内容^[14]。可见,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本身并不像组织体系、环境体系那样,能够清晰地建构起一个面面俱到、层层分离、边界明确、结构稳定的体系框架。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研究对象和自身规律这些内在本属性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形式,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育人规律体现

在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当中。因此,要明晰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可以回溯到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规律层面,从根源探究学科体系的形成逻辑。以研究生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是在探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育人规律基础上开展研究的,即在纷繁复杂的研究生教育问题研究过程中,回答研究生教育怎样适应外部需要实现自身科学发展,回答研究生教育怎样在科学培养人、促进人的成长的过程中,积累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生成研究理论、搭建学科框架的。图1表示了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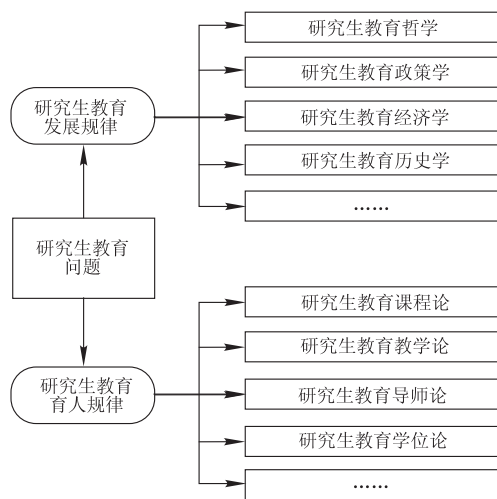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生成逻辑

由图1可见,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是从不同层面去探讨研究生教育学的规律的,在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层面可以延伸出研究生教育哲学、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等,从研究生教育育人规律可以延伸出研究生教育课程论、教学论、导师论等。

尽管我们可以将学科体系按照研究生教育规律而划分为两大类别,但由于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动态性、实践性,其学科体系也呈现出开放性、时代性特征,开放性意味着研究视角的多元,研究生教育学并不局限于教育学学科视域,而是积极采纳多学科研究视角去审视研究生教育问题;时代性指的是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个教育新时代的新产物,积极吸纳时代发展新方法、新成果为我所用。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趋于无限的过程,学科体系只有相对的存在价值,而无凝固不变的规定模式^[15]。

因此,对于研究生教育学而言,要不断结合研究问题,逐渐建构起一个层级明晰的学科体系。

(二) 研究生教育学的特征

1. 问题导向

以研究生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教育学,问题导向是其首要的也是最鲜明的特征。研究生教育学的问题导向显著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确定,研究领域随研究生教育问题的转移而转移,随研究生教育问题域的扩大而扩展;其次,研究生教育学研究方法选择,研究方法的选取以服务于研究问题为准则;最后,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并不是出于形而上的抽象,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归纳总结。总之,研究生教育学是在发现研究生教育实际问题过程中开展研究活动,是在解决研究生教育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研究成果的。问题导向使学科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有效的保障了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支撑价值。

2. 边界开放

研究生教育学的开放性表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就研究视角来说,研究生教育学并不局限于研究生教育学或教育学,而是广泛吸收、借鉴、综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解决研究生教育现实问题,以学科间的联系、渗透、转化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创造问题解决的新思路。就研究方法来说,研究生教育学作为一门以现代学科理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学科,它不局限于某一类型的研究方法,也不纠结于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上具有开放性。目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定性、定量等多种类型的研究方法被广泛的运用到研究生教育研究当中。实践证明,这种开放的研究模式对于充实研究生教育理论、解决研究生教育实际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教育学学科归属

从学科定位上看,研究生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下属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的开放性并不影响其教育学子学科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判断母子学科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研究范畴的关联性,二

是学科本质的一致性,子学科是母学科研究范畴的进一步聚焦,母子学科具有共同的学科本质。就教育学与研究生教育学而言,首先,在研究范畴上,研究生教育是对教育学的进一步聚焦。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从广义上说,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所有人类社会存在的教育现象;从微观上说,教育学研究范畴主要是学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各种类型。不论是广义上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教育学还是狭义上的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的现象和问题都是其研究范畴的一部分。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将教育学研究范畴聚焦于研究生教育的教育科学,是人们对研究生教育领域这一教育分支进行专门研究所得到的更加深入、细化的专门学科。其次,研究生教育学具有与教育学相同的学科本质。教育学和研究生教育学均是一门关于培养人的社会科学,二者皆是对“人”及其“教育”的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展开^[16]。教育、研究生教育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为人类所特有,为社会所需要和制约,尽管教育活动的客体并不相同,但是,引导、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二者共同的追求。

三、研究生教育学创建路径

破解研究生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既需要长期的实践探索,更需要我们以新思维、新范式、新视角,科学创建研究生教育学,走出一条新的学科建设发展道路。

(一) 树立新理念

研究生教育学是面向研究生教育发展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它是遵循现代学科逻辑而产生的,因而学科的构建也要依据现代学科的理念和发展逻辑,将社会发展需要作为学科演进和发展的动力。这就要求广大研究生教育研究者抛弃传统的经典学科建设思路,将研究重心从追求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转移到在探索社会需求、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建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价值,树立学习创新、跨界融合、问题导向、国际视野的新的学科发展理念。

学习创新,指的是研究生教育研究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生教育研究需要对其进行适切改造与创新,应用到研究生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当中;跨界融合,指的是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要拓宽视野,融合多领域的先进知识、理念为我所用,避免将思维局限于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学领域;问题导向,指的是研究生教育研究要以解决社会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实践问题为研究指向,与实践问题联系紧密;国际视野,强调研究生教育研究者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既要关注中国问题,又要具备国际视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创建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学,走出国际范围内研究生教育学发展的新路子。

(二) 创建教育研究新范式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步入新时代,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研究生教育学应当体现新时代发展思想,运用新时代的发展成果。当前,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大数据中去探索研究生教育规律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这种探索方式正在塑造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新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称为动态范式(dynamic paradigm),即运用大数据的思想、思维、理念和方法,对研究生教育现象进行全过程、全样本、全景式研究,动态呈现教育现状、揭示研究生教育规律、持续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

与选择小部分样本为对象开展研究的量化研究,和借助于作者的经验总结和逻辑的质性研究相比,大数据背景下形成的动态研究范式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强调数据来源的广泛性,以分析、诊断、描述、研判等方式,通过数据之间的交互,发现数据的价值,直观呈现教育教学状态,预测、预警教育教学发展趋势。动态研究范式具有数据来源的全样本、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信息之间的灵活交互、信息呈现视角的全景可视、现实动态的全过程实时反馈、数据运行过程全透明的典型特征,从而有效克服了传统量化研究的局部性、线性化和静态性的不足,也有效的解决了质性研究有失客观性、适用性的局限,通过克服教育决策中的有限理性,实现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因此,未来的研究生教育研究

者也要结合时代发展变化,创新教育研究新范式,积极探索、运用动态范式开展各类研究,产出更具科学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支撑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

(三) 团结协作,合作共赢

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不是一两个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扩充和壮大研究队伍,并建立起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新变化的,问题导向的、组织扁平化的、形式多样化的协同创新的学术合作机制。

学术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以有多种方式。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组建全国研究生教育研究学术平台,如建立各类研究生教育学会,创建研究生教育各个专门学术平台等方式为不同人员交流研究生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平台;也可以通过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学术沙龙等活动,营造研究氛围,激发研究者潜力;或者通过跨国界合作项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提升学科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学术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合作思路,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共同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切实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问题。借助于问题导向的、组织扁平的、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的学术合作机制,实现研究生教育研究者、其他学科领域专家、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等人员之间,以及各类研究中心、研究所、高校教育学院等组织机构之间灵活有效的人员互动与知识流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1—2017)》。

参考文献

- [1][7][9]赵沁平.开拓、创新、求真,科学构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6):1-3.
- [2]杨小微.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情结”[J].教育研究,2011(2):34-46.
- [3]王战军.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14.

- [4] 闫广芬, 王红雨.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 背景、意义与行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 (5): 7-12.
- [5] 叶绍梁.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上)——试论研究生教育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学科体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2 (7): 30-33.
- [6] 潘懋元. 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217.
- [8] 王战军. 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与构建理念[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 (5): 1-6.
- [10] 薛天祥. 科学方法论与《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探讨[J]. 教育研究, 2001 (6): 27.
- [11] 叶绍梁.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2 (9): 9-13.
- [12] 王续琨, 徐雨森. 关于创建研究生教育学的思考[J]. 教育科学, 2001 (2): 36-38.
- [13] 秦惠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1-10.
- [14] 马君, 周志刚. 论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 444-448.
- [15] 耿有权. 论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的逻辑演进[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 (5): 17-21.

The Conceptio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s of 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Wang Zhanjun Yang Xuting

Abstract: Graduate education is a discipline which focuses on graduate education issues, reveals graduate education rules and its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graduate education is a basic component of education developed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summing and long-time graduate education research accumulating. Graduate education is a new field of education research tha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should set up new idea, employ new paradigm and explore a new road.

Key words: 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Education; New Discipline

生命教育与人文涵养

董云川 白文昌

摘要: 理解生命,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总体而言,自然科学把握的是生命的指征及其周围的物质世界,人文学科把握的是生命的本质及其意识生活的内部世界,两者好比“器”与“道”的关系。生命教育不仅要接受科学的引领,更应当导入人文的精神。能否真正将生命教育切入生命的内涵并融于鲜活的个体生命,根本上取决于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过程是否能够贯通科学理性与人文涵养,兼容科学与人文之魂。

关键词: 生命;教育;人文;科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39-06

对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追问,始终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纠结辩题。而谈到生命教育,本质上就必须论及人的教育。然而,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之谜”即为经典一例:有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常用隐谜害人,凡是解不出谜底的人,就难逃被啖食的命运。这则谜面称:“什么东西上午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傍晚用三条腿走路?”俄狄浦斯的答案——是人。在生命的清晨,他是年幼的孩子,用两条腿和两只手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正值壮年,只用两条腿行走;而到了生命的黄昏,他年老体衰,必须依靠拐杖辅助前行,因此有三条腿。斯芬克斯听完后羞愧难当,就跳崖自杀了。这个著名的神话故事从侧面证实,人类能够对生命的谜团进行自我解答的行为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经肇始,并且已经触及很高的智慧形态、关乎到对生命个体的存在认知。即便如此,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本身却依然是一个让人类倍感困顿的问题,千百年来悬而未决。而在科技神奇发展、人工智能加速融入人类世界的今天,这个谜面还是需要人、尤其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人积极应对,不能回避,亦无法退缩。

总体而言,人不仅是实体的存在,更是意义的存在,人生必须追问意义,生命必须活在意义之中。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的生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动植物及其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们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们本身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但人不一样,“人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1]。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就是在有意无意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才获得了精神生命的超越和心灵的安顿。

一、教育及其相关生命的现状:人性旁落

虽然,生命的存在需要获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安顿。但是,在传统经验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被现代科学技术溶解的过程中,人类日益丧失掉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诉求与意义归宿,迟早会产生身心分离的碎片感、疲惫感、宿命感和无助感。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有一段很经典的论述:“现代人文世界支离破碎、日益萎缩。其结果

作者简介: 董云川,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白文昌,男,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是, 我们所经历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富裕但是无论如何却不能算是幸福的社会, 我们所过的是一种整天忙碌但却不知道为何忙碌的生活, 我们所获得的是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权利, 但却开始从内心里就懒于应用它们, 我们所体验的是一种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寂寞却因此越来越冒险甚至疯狂的感觉。当意义失落的时候, 人们如何为自己的价值与价值生活提供依据? 没有合理依据的价值及价值生活是社会世界种种病态和荒谬的总根源。^[2]”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心理学家弗洛姆振聋发聩的声音: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 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3]。

20世纪以来, 在以理性主义及科学主义为现代性旗帜的引领下, 人们的思想逐步从蒙昧走向开化与自由。一方面, 主体性的高扬、成功欲的膨胀、生命尊严的彰显给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体验。另一方面, 知识至上的感召、工具理性的肆虐与享乐主义的横行又逐渐遮蔽了“人之为人”的意义感与幸福感。人逐渐被视为追求物质利益、耽于感官享受的功利主义者, 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机器”, 逐步弱化了对生命意义与价值及其终极关怀的追求。与此同时, 教育也相应沦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工具, 并因其能明显满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国际竞争的首要阵地。在实证主义与科学理性的凯歌声中, 教育中的个体演变成为纯理性的存在, 生命在颓废而漠然的狂欢之中绝望地解构着周围的一切, 人成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笔下的“单向度的人”——没有信仰、缺乏人性的技术工具; 教育活动的中心似乎只剩下实证化和功利化的知识, 而非充满灵性的人; 教育的过程仿佛是过度技术化和模式化的生产流程, 已不再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滋养的环节。于是, 一方面, 我们惊喜地见证着教育的巨大发展与进步: 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 知识量和信息量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的高学历毕业生不断涌向社会; 另一方面, 我们却极其无奈地看到, 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空心化并越来越不像原初的文化组织, 与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活生生的生命渐行渐远。这不仅不利于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更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和文化的使命。

二、教育及其相关生命的内在指向: 意义性

从生命存在的意义而言, “纯工具化”理性的教育生存状态已经脱离了生命的本源。以绝对主义的客观知识为媒介, 试图构建一个终极的、永恒的、完美的、至善的、世界的极端道德理想主义既脱离了现实生活世界, 又脱离了个体的具体生命, 其结果只会导致生命的泛道德化及死亡的理想化。这一点早有前车之鉴, 回顾欧洲历史上的“科学危机”便可不证自明, 胡塞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实证主义盛行——“所有的科学学科都受实证主义的支配^[4]”, 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成为当时盛行的科学观念。于实证主义者而言, 科学之为科学的前提乃是它是能被证实的, 也即它是实证的。何为可实证? 在他们看来, “实证”是一种“事实”, 即“唯当它们能被计算、被衡量、被测量和在实验上被规定”^[5]的事实。而且, “科学倾向于将自己用于研究科学的测量、预见和控制参量的方法, 延用于人的生活领域的企图。对人的敬畏、意象、审美、伦理、真理的说明都归结为物质, 并且试图以此方法得出关于心灵痛苦、人生苦难与道德问题的答案”^①。依照这样的标准, 那些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支撑人们生活的伦理宗教及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或观念就不可能是实证的, 因而也就是非科学的。超出了科学的适当范围的“科学”便走到了科学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成了一种准宗教。于是, 自柏拉图以来的为人类存在奠定基础的哲学观念也就被当作一种非科学的观念遭到了遗弃。如此一来, 实证主义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信念崩塌, 世界落入虚无, 科学与价值分离, 人类搞不清生存的意义。然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展开大肆批判之前, 黑格尔就曾批评过世人“太忙碌于现实, 太驰骛于外界”, 呼吁人们要“回到内心, 转回自身, 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6]。这个“原有的家园”即是指人的有意识的生命。在他看来, 回归生命的充盈和意义的澄明才是个体生命的永恒价值所在。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与周围事物相处的原初方式其实是远比狭义的科学更基本的生存方式。在自然状态下,而非在主观科学认识的视野下,我们周遭的事物并非总是“脱己的”,反而总是“随己的”存在着。换言之,只要人生存着,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就是存在于意义之中。倘若人不从自身生存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周围的事物,那么人的生存就是空白的,没有意义的。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和解释是贫乏的,那么我们生存的意义也难逃贫乏的命运。人类永恒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人们有限的肉体生命不可避免地会消亡。于是,死亡降临的必然性让我们感到忧伤,死亡不知何时降临的未知性又让我们感到焦虑。那么,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呢?人们总得要在时间与空间之外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本体作为精神依托的根据。更为确切地说,只有当有限的个体与这个无限的本体发生联系的时候,生命才能获得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7]。就这一点而言,古今中外思想家们之所以要对人的存在问题开展探问,与其说是出于科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出于人文信仰的需要。换言之,科学及形而上学的研究都应当以对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为出发点,如康德所言,“人,……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你的行为,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当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8]。

三、教育生命因人文涵养之迥异而大不同

依据不同的角度介入,人的生命类型可划分为不同层次,如自然生命、生理生命、社会生命、价值生命、智慧生命、人文生命等。但归根结底,教育生命涉及两大层面,亦即自然生命和人文生命。

前者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后者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愿景和鹄的。换言之,前者决定能不能活下去,后者决定能不能活得好。正是生命所内涵的人文性才可以彰显出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科学主义“用概念指导人生”的方式仅仅解释了浮在生命表面的“像”,而隐藏在生命内核里的“象”则是其难以洞察到的。就像现代西医至今还是不能确认中医所把握之“脉络”一样,现代科技检测仪器依然无法描绘清楚人类大脑或心理活动的物质轨迹。按照尼采的批判逻辑,科学主义“用概念指导人生”的做法回避了生命的根本问题,使得现代人的生存表现出了一种“抽象性质”,浮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灵魂空虚的另一面却是膨胀的欲望,人们急切地追求着尘世的幸福,整个社会因沸腾的欲望而惶惶不可终日^[9]。出路何在?尼采将他的希望寄托在了悲剧世界观的复兴之上,但正如历史所给出的证明一样,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直到今天,他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生命状态依然是顽固不化的事实,生命的意义在科学主义的解构之下越发显得苍白无力。可是,人生的丰盈与复杂、生命的活力与奔放、个体对苦难的同情与超越……又都实实在在是“人生而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或需要持续追问的辩题。

那么,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又如何彰显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生命的人文性其实已经明示并确证了答案。任何对存在及其意义与价值的追寻最终都应当以人为出发点!而人文学科所内涵或牵涉到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直至宗教因其与人类的生命发展史密不可分,因此便更加有助于教育生命的人文性构建。毋庸置疑,正是因为人文的介入,人的生命才不断地发生着裂变:

因为文学,自然生命被赋予了意义。在文学的字句中,人类的喜怒哀乐、生死忧患尽显无遗,作家们通过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永恒的人文沿着文字符号的边框来解剖人性和看待世界,给世人以深刻的警醒和向上的力量。人们因此相信,曹雪芹能在贵胄公子潦倒至食粥度日的状态下,仍然用生命为人世间无可挽回的凋零抒写出“红楼”挽歌;沿着雨果的笔锋,我们相信了悲惨世界里从来不乏博大的

胸怀,看到了美丽与丑陋同体,渺小与伟岸共存。

因为艺术,自然生命被添加了色彩。艺术让我们明白,本色的生活多姿多彩。世界并不缺少美,当然是缺少发现。如朱光潜先生所言,“离开艺术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从这个层面而言,人生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音乐、绘画、舞蹈无非生命的展现形式。在艺术的视界里,生命的波澜起伏、喜怒哀乐层层铺开,“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皆可尽情挥洒!

因为历史,自然生命成为时代变迁的纽带。无论怎样标榜客观公正,人类社会的历史,依然免不了成为人主观书写的符号本:一些人在记录、一些人在加工、一些人在改造、一些人在传播,更多的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人云亦云,当然也有人仗义秉公,似司马迁一般以残缺的身躯去努力记载他认为是正确的史实。岁月无痕,宇宙洪荒,自由不死。生命的伟大与渺小,个体的成功或失败,都将被时间的长河稀释殆尽——依然是秦时明月,不再是汉时边关,英雄人物此起彼伏,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夕去朝来的岁月轮回中承接着人类古今的记忆。

因为哲学,自然生命被引入反思与智慧的游戏。如果没有哲学思辨,人类就难以甄别并确证自己作为高级动物的地位。感性的人类历经沧桑,之所以能够成为动物世界的霸主,根本的缘由还必须归功于反思与理性。从古希腊哲学的布衣智慧,到近代启蒙运动的呐喊,到现代哲学缜密的逻辑推导,世界何去何从看起来与哲学家无关,但世界的走向却每每验证了哲学家早年的预言。因此,离开了知识以及对知识的反省,离开了德性以及对德性的追求,离开了智慧以及智慧的引领,人类社会岂不是索然无味。

因为宗教,自然生命方能够实现觉悟与超越。宗教存在的价值很难直接由科学技术佐证而得,生命后台以及在更深层次上的存在方式很难被简单的“伪科学”指责所否定。面对人生的善与恶、苦与乐、悲与喜、生与死……千百年来人们借由信仰的方式寻找着超脱的路径。帝、主、梵、佛、天、道、神各显神通,使芸芸众生辗转其间,获得相应

的群体秩序及超越现实苦难的真实体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生死轮回,虽然现代科学能量巨大,人工智能日新月异,但从绝对意义上说,面对无影无踪又无所不在的灵魂,科学并非万能,而宗教显然有助于达成觉悟与超越。

简而言之,寻找真相与事实是科学前进的目标,探究活着的意义和死亡的超越则是人文存在的鹄的。古往今来,层层叠叠的现象背后分别对应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无不潜藏着对人生本体价值的挖掘动因。当然,生命的自然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前提,但如若欠缺了人文的滋养,生命必将黯然失色。

四、生命教育的关键——回归生命本身

基于以上理解,生命教育要真正切入生命的意义层面,就应当摒弃以“纯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证主义”教育,走进关注人的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以人文涵养浸润生命的本真存在,赋予生命更多的人文情趣,包括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怀、对人生终极信仰的关怀、对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关怀和对人类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现实的物质纷扰,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与意义。毫无疑问,人文学科及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从生命教育的内容来看,如何理解生命一直都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自然科学把握的是生命的外观及其周围的物质世界,人文科学更多把握的是生命的本质及其意识生活的内部世界,两者好比“器”与“道”的关系。尽管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似乎总在前进,而人文科学却似乎总在丧失阵地,但归根结蒂,还是只有丰富的人文涵养才能促使人们真正从本质上去思考并解析个体生命中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秩序与自由、生与死等混沌纠葛的问题。换言之,生命教育能否真正切入生命的内涵并融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根本上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是否真正切入科学与人文之魂,融汇贯通科学理性与人文涵养。因为,正如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的那样,自然科学学科由于其客观性及

非人格性, 与人的主观存在没有直接联系, 纯粹的科学理性训练只能使人成为某一类别的人, 而难以使个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但是, 对人文学科的知识传授及领悟以及探索自然科学背后的人文精神则能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表现出人的本性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更有助于洞察和发掘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维克多·弗兰克说, “对于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光而言, 生命是平淡的, 这种平淡往往掩盖了生命意义的真实显现。因此对于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而言, 只有当他面临死亡时, 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领悟到生命对自己的意义”^[10]。生命总逃不脱终结的那一天, 人有死, 故人有限, 人始终都被整体地锁在了“向死存在”的生存道路上。人之为人, 就在于人身上承担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天命”, 只有当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自我觉悟到死亡的命定性之后, 人才能从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终极伦理中演绎出生命的本真状态。假若人不是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 那么, 人作为人而生存的整个意义世界就必然会遭受覆巢之灾。可是, 面对必然降临而又无法超越的死亡, 人类如之奈何? 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视角里, 生与死的意义已经被实证的逻辑淹没得渺无痕迹了。但人文学科依然不停地揭示, 恰恰是“向死而生”这种生存的最本己的可能性才唤起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言, 死亡使得此在摆脱一切世俗关系, 唯独剩下它自己。此在则通过对死亡的领悟, 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性, 进而促使它对自己人生的无限可能性进行本己的选择, 但这绝非是“期望死亡”或者“沉沦于死亡”, 反而恰恰是在突显生命最内在的需要——对死亡的理解才是对生命意义的真正理解。犹如俗语所说的那样: 咱们不怕死, 但绝不找死。从这个角度辨析, 生命的成败起落、痛苦忧愁等一系列的反诘追问都是纯科学理性的逻辑所不能观照得到的, 而人文学科及其精神涵养却能给予个体在面对苦难与死亡时, 从生命的深层意义上领

会、把握生或死价值的可能。

回到生命教育的本质上来, 带着科学巨子爱因斯坦“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 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 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11]的告诫, 提升个体存在对于生命意义的人文价值体验, 帮助他们“不断地把生命中所拥有、所碰到的一切, 都转化为光亮和火焰”^②, 正是当下学校生命教育中不容回避、必然要勇敢面对的命题!

注释

①引自dictionary of beliefs and religions, 1992, Chambers.

②尼采.《快乐的哲学》自序.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6.
- [2]石中英. 人文世界、人文知识与人文教育[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6): 12-14.
- [3]埃里希·弗洛姆著. 健全社会[M]. 欧阳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25.
- [4][5]M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27: 15.
- [6]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1.
- [7]何光沪. 宗教与世界丛书[M]//詹姆斯·利奇蒙. 神学与形而上学. 朱代强,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2.
- [8]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1.
- [9]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62, 156.
- [10]维克多·弗兰克. 活出意义来[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84.
- [11]赵中立, 许良英.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70.

Life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Spirit

Dong Yunchuan Bai Wenchang

Abstract: Understanding life is a basic problem faced by both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general, the natural scienc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dication of life and the material world around it. The humanities disciplin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the inner world of its consciousness life. The two are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rument" and "the Tao". Life education accepts not only the guidance of science, but introduces the spirit of humanity. Whether life education can be tru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life and merged into the individual life or no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cess can penetrat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ultivation, and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oul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Key words: Life; Education; Humanities; Science

跨文化研究与“汉学主义”

周 宪

摘 要: 本文讨论了晚近争议颇多的“汉学主义”问题。作者主张要避免贴标签的简单化做法,进入汉学研究的内部,具体辨析汉学主义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一种区分性的方法论,对汉学主义和汉学研究、不同的汉学主义加以区分,从而揭示汉学主义的特征。同时,将汉学主义的讨论置于更多理论资源的语境中,从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汲取有用的资源,探寻避免汉学主义误区的知识生产策略。

关键词: 汉学主义; 误释型知识; 跨文化研究; 自我—他者关系;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45-08

一、作为一个问题的汉学主义

“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近几年在中国和西方学界引人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率先在中国人文学界被提出后,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讨论,甚至是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部分赞同并部分反对的人也不少。汉学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理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文化自觉所引发的文化政治问题。这个概念所以作为一个问题而被提出,既有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发展的学术背景,尤其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又有中国崛起及其本位文化自觉的国内背景。在我看来,汉学主义所以充满争议,它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崛起后在国际学术界追求文化领导权上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一种重新调整晚清以降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不平衡关系的内在冲动所致。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总是伴随着一种本位文化自觉的现代性意识。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不但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层面上。于是在学术场域

中,需要对以前认为天经地义甚至自然而然的各种观念和方法的加以厘清,以重新确立知识生产与传播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似乎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和学术进入世界的必经之途。从社会学角度说,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的再合法化;从政治学角度看,这是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性的政治自觉。西方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这个过程,19世纪后半期以降,随着大国的兴衰沉浮,美国的崛起就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举例来说,19世纪哲学和文学艺术上“美国性”的自觉,使得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美国不少知识精英要努力摆脱欧洲文化的底荫,探寻美国文化的美国性^[1]。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艺术史研究往往会淡化欧洲艺术传统的影响,美国艺术史的叙事并不是从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开始,也不是从文艺复兴的现代传统开始,而是从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开始,这就从源头上区别于欧洲艺术的欧洲性。比如,越来越多的“哈德逊画派”及其后美国风景画的研究,都有意回避风景画这一欧洲传统的影响,转而强调美国西部风景的地域特点,尤其是其广袤、原始和崇高的地形地

作者简介: 周宪,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文化研究、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貌, 因此迥异于西方风景画(比如法国画派或荷兰画派)。再比如, 自瓦萨里以来欧洲艺术史构成是传统的建筑、雕塑与绘画, 摄影是不会进入艺术史的。但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 由于20世纪初美国当代艺术与摄影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所以美国艺术史通常将摄影作为有别于欧洲艺术史的一个特点而被强调出来。凡此种说明, 文化的在地性必然会寻求其本位性话语的表达, 中国当代学术亦复如此。

随着风水流转, 如今中国已稳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 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获得迅猛发展, 拥有或扩大文化上的领导权就成为一种自觉的取向。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 “汉学主义”成为学界的一个热议话题。不仅如此,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 随着20世纪下半叶民权运动的兴起, 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后殖民批判, 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反思, 为汉学主义批判提供了合适的思想土壤。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东方主义批判, 汉学主义批判难成气候。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汉学主义的批判在很多方面又超越了东方主义。

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 汉学主义论争兴起与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文化自觉有密切关系, 它反映出有关中国的学术知识生产与交流层面上中国与西方新的博弈关系, 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再平衡这一关系的鲜明指向。它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提升过程中文化影响力提升的迫切要求, 同时也是一种对西方汉学研究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和偏见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毫无疑问, 汉学主义问题的提出具有恰逢其时的重要性, 是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和本位性的主动重构。

二、汉学主义论争的焦点何在?

何谓“汉学主义”? 从这个概念一被提出, 就一直争议不断, 充斥着各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界说。这种莫衷一是的境况恰好说明汉学主义的讨论是一个具有生长性的知识空间, 它包含了太多的文化政治问题和历史复杂性。根据美国学者顾明栋的看法, “汉学主义”在中外学界至少有八个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根据我们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察和归纳, 这一概念大致涉及八个方面: (1) 一个从外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进行探索的知识系统; (2) 一个由对待中国的意识形态所操控的知识处理系统; (3) 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性总体; (4) 对汉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批判的理论; (5) 一种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智性产品; (6) 中西研究中被异化的知识和学术; (7) 中西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化为知性意识形态的产物; (8) 一种自觉反思、提倡尽可能客观公正地生产中国知识的批评论^[2]。

这八个对汉学主义的界说,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不同视角和理解差异。在进入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如何界定汉学主义的方法论做一些必要的清理。

首先, 对汉学主义概念的界定就存在着描述性和规范性方法的不同, 而不同的方法乃是不同的立场的表现。描述性方法强调汉学主义是什么, 意在汉学主义为何物的事实陈述; 而规范性方法则完全不同, 它是对这一概念的某种价值评判, 意在彰显汉学主义如何并为何如此。两种不同的方法彰显出理解汉学主义的根本差异, 亦反映出研究者与汉学研究复杂的文化政治关系。描述性的方法旨在从经验研究角度去说明汉学主义为何物, 并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场域; 而规范性的方法则从一开始就认定汉学主义乃是某种文化政治的产物, 它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全客观的知识系统。

其次, 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规范性立场上, 根据这些界定的不同质性, 可进一步将这些不同的界说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将汉学主义当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即强调汉学主义是对中国文化带有偏见甚至敌意的意识形态, 是一种误释中国问题的知识形态或研究策略, 比如第2、6、7项界说; 第二类相反, 把汉学主义看作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 即把它当作一种反思批判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知识生产或研究策略, 比如第4、8项界定; 第三类是中性的描述, 比如第1、3、5项界定, 比较倾向于描述性的方法。这三类不同的界说实际上揭示了汉学主义甚至汉学研究中的三种不同立场: 否定的、肯定的和

中立的,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观察汉学主义论争可清晰看到的现象。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界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有关汉学主义的论争,便不难发现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汉学主义的不同理解,而是汉学主义究竟是否应等同于汉学研究。换言之,论争的各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家都承认在汉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种汉学主义倾向,这一倾向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问题带有偏见的误释。这种看法可用以下三种代表性的看法来佐证。

第一种说法来自周宁,他在其2004年发表的《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中,对汉学主义做了明确的界定:

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究竟是“真理”还是“神话”?究竟是一个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更像是一种“叙事”,一种能动主动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的现实,而是在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创造表现意义。

……汉学进入后汉学阶段,一方面是汉学学科本身反思性批判,一方面是更彻底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研究首先是冷战意识形态,然后参与“遏制中国”,构筑想象中的中国“威胁”神话。汉学的汉学主义性,贯穿始终^[3]。

如果说周宁分析的是西方汉学的问题所在的话,那么,温儒敏则指出了中国本土存在的“汉学心态”,他指出:

我这里提出要克服“汉学心态”,带有学术反思的含义,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4]。

依据这一分析,汉学主义不只是西方汉学界存在的问题,亦出现在中国本土知识界。“汉学心

态”与“汉学主义”虽名称不同,但都确指同一意识形态或策略,只不过呈现方式有所差异而已。这表明,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西方和中国同时存在。顾明栋则进一步指出了两者的复杂关系。他认为:

汉学主义主要是西方遭遇中国时所构想并采用的观念、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的隐蔽系统,它涉及到各种中国事物,并要搞清楚中华文明令人困惑的复杂性。由于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政治领域和知识领域,所以整个世界不得不透过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并运用知识。汉学主义又由于非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文明的体认、观念和评价而变得复杂多样。因为某种常在我们自觉意识之外起作用的内在逻辑,它制约着观察中国和生产有关中国的学术知识的方式,所以汉学主义基本上是中国—西方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5]。

顾明栋敏锐地发现,这种“文化无意识”是通过某种内外合力的张力结构运作的。一方面是西方汉学隐蔽的“他者殖民”,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汉学心态作祟的“自我殖民”,两者相互作用并内外呼应,构成了汉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大行其道的局面。所以,他认为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学者已形成某种依据西方认知、观念、评价来审视中国的习性,形成了以西方价值及好恶来确定和臧否自己文化的价值与成就。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透过西方观念、认知和评价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全球性趋向^[6]。

我注意到,在汉学主义论争中,对这样的汉学主义界说虽不是全体一致的同意,但普遍认可在汉学研究中明显存在着这样的汉学主义倾向。因此,汉学主义论争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汉学主义是什么,而是这样的汉学主义在汉学研究中到底占据何种位置,是支配性的还是非支配性的,它与汉学研究中的其他倾向(是否存在)关系如何,等等。更进一步,汉学主义论争的是汉学研究能否等同于汉学主义。围绕着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一种激进派,认定西方汉学就是汉学主义的,另一派则是对温派,主张汉学研究不能等同于汉学主义,其中包含了复杂的不同理论和观念。这一争执

涉及诸多知识生产中的文化政治问题,还关涉到跨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回到汉学主义概念上来,我以为这个论争也就是关涉到汉学主义概念的性质,汉学主义究竟是一个总体性(global)概念,还是一个地方性(local)概念?如果是前者,那么汉学主义就等同于汉学研究,即是说,汉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汉学主义倾向;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说汉学研究与汉学主义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亦即汉学研究中存在汉学主义倾向,但只是汉学研究中的局部性现象,而非总体性现象。

在我看来,有三点必须引起注意。第一,汉学主义的确是汉学研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知识生产取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批判。第二,汉学主义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汉学研究,因为汉学研究是一个包蕴了诸多复杂现象的场域,无论从汉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看,还是从汉学研究的不同观念、方法和问题来说,汉学主义都不能视作汉学研究中无处无时不在的普遍倾向。第三,如果采用这样的反思性立场,那么,就需要对汉学主义的汉学研究和非汉学主义的汉学研究加以区分和比较,进而揭示汉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及其潜在危险,以及如何防止堕入汉学主义窠臼的策略。

三、作为误释型知识的汉学主义

如前所述,在西方汉学研究中,的确存有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误释、甚至是敌意,它们的曲解或误释源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因此也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但汉学主义讨论尚未进入其内在结构之中,并对其复杂性和差异性加以辨识。用一个标签贴在各式各样的汉学主义进而装入一个篮子,这很容易忽略了汉学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我们不妨把汉学主义视为一个结构性的知识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汉学主义倾向。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将这个结构看作是由一系列两极关系所组成的结构,就像黑白灰结构一样,一极为黑,另一极为白,中间是广大的灰色过渡地带。

如果说汉学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对中华文化的某

种误释或偏见的話,那么,在这个维度上存在着有意误释和无意误释的两极。有意误释是指汉学研究中那些有意歪曲事实,或对某些事实有意作出先入为主的负面判断,或是将历史文化的史实生硬地置于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加以解释,或是按照某种意识形态预设来阐释特定问题,最终得出某个西方意识形态预先所规定的结论。这里不妨举个例子,美国学者维斯曼(Mary Bittner Wiseman)在分析中国当代波普艺术家王广义《大批判》系列时,强调了她从这一作品中所读到的意义:

其中之一是《大批判:可口可乐》(1993),这幅画将三个一字排开的工人形象,与可口可乐软饮料的商标标识组合。画面上只能看到工人的头和第二、三个工人伸出的左臂。最前面的工人手捧红宝书,三个人都紧握一个巨大的钢笔,笔尖正对着白色的Coca-Cola中的第二个C字,长长的笔杆成为红旗的旗杆。假如第一个C字是共产主义的话,那么第二个笔尖直逼的C就是“资本主义”。……《大批判:可口可乐》不过是过去的和消费者的物质主义的一个例证而已,在这种物质主义中一切都是物质^[7]。

其实,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可口可乐中的两个C字绝无该学者所解析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意。一望而知,这一分析是典型的西方学者的西方意识形态预设的产物,所以其结论显然是作者希望在王广义作品中所见到的东西^[8]。

相比之下,无意误释则或是由于掌握文献不足,或是对事实的误解,或是材料的误用等,由此导致了某种不合适或不恰当的结论。由于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难度较大,或因为材料不充分而导致研究出现某些缺憾是在所难免的,诸如此类的误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这两种不同的误释,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前者恰恰是在实施福柯所说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话语功能,将中国材料削足适履地纳入西方式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预设框架中,主观任意地裁剪与解析,最终服务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导权。正像霍尔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总结时所指出的那样:

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 亦即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 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 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 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 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 什么是合适的, 什么是不合适的; 它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 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会具体体现出其特征^[9]。

有意误释中最为极端的是一种敌意型解释, 这类解释充满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 而且刻意将中国问题解释成趋向于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结论, 借以达到贬低和否定中华文明的目标, 进而直接服务于西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晚近关于汉学主义的讨论, 多集中于故意误释型的汉学研究, 而几乎没有涉及无意误释类的汉学研究, 虽然它们都属于汉学主义的阵营。当然, 在无意误释与有意误释之间, 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 情况更为复杂, 需要我们仔细甄别和分析。

由以上无意与有意误释的维度出发, 进一步引申出探究两个相关问题。

第一, 西方汉学家的对华立场问题。大致说来, 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立场, 即友华立场、中立立场和仇华立场。汉学研究属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 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迥然异趣, 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立场。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是从其预设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出发来考察诸多中国问题的。因此, 不同的立场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汉学研究的指向性。正像贡布里希在说明艺术家对绘画题材的高度选择性时所指出的那样: “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 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10]这个原理在汉学研究中也是普遍有效的, 有什么样的对华立场和情感, 就有什么样的汉学研究。因为这些事先存在的政治立场就像是贡布里希所说的“图式”(schemata)一样制约着汉学家想看什么和能看到什么。贡布里希在比较一位英国无名氏画家和英籍华人画家蒋彝面对德温特湖却画出全然不同的风景时, 特别指出了图式的心

理学机制与功能。他写道:

这是一幅德文特湖的风景画。这里我们已经超越了实录跟艺术的分界。蒋彝先生当然乐于使用中国惯用手法适应新的要求: 他要我们这次“按照中国人的眼光”来观看英国景色。也恰恰是由于这个缘故, 把他的风景画跟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典型的“如画的”描绘做比较大裨益。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固定的中国传统语汇是怎样像筛子一样只允许已有图式的那些特征进入画面。艺术家会被可以用他的惯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 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业已掌握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就会跃然而出, 成为注意的中心^[11]。

其实, 特定的立场决定了看什么和怎么看, 就那些对中国带有偏见的汉学研究者来说, 其研究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由此来看, 西方汉学研究中的确有一些仇华的汉学家, 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对华态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受限于其政治立场, 因而得出一些西方中心论或西方文化优越性的结论是必然的。尤其是一些受制于西方国家对华战略要求的专题性或智库型研究, 更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 这类汉学研究与其说是汉学的政治化, 不如说是政治的汉学化。与此相反, 友华派学者则可以从了解中华文明的友好立场出发, 进入中国问题, 得出一些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结论。当然,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大量的并无明确先在立场的汉学家,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研究深入, 以及进入中国文化的亲身经历, 逐渐形成自己的对华立场。如果把汉学主义视为一个地方性的概念, 我认为就应该特指那些仇华派学者所做的汉学研究, 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误释和西方主导意识形态。

第二个问题是本位文明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差异。跨文化研究指出了—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就是任何研究者总是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来考察他者文化的。所以, 就像汉语中的俚语所言: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就是说, 跨文化研究中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时, 难免会有某种本位文明或文化的优越论倾向。虽说这种倾向难以避免,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程度差异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两个不同程度的文化优越论, 一种可以称之为“弱

自我文化优越论”，另一种则是“强自我文化优越论”，它们构成了本土学者看待域外文明或文化的两极。前者的特征是自我的优越性处在某种适度状态，并未阻碍学者去发现并肯定他者文化的特色和优良，因此，在汉学研究领域，弱自我文化优越论是有存在合理性的。与之不同的是另一极的“强自我文化优越论”。这是一种膨胀的、夸大的和偏狭的优越论，它遮蔽了研究者应有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观察，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者文化的倾向。强自我文化优越论往往是研究还没开始，结论就已经预设好了。实际的研究不过是预设结论的某种佐证而已。就像文学批评家伦曲奇亚对那些先入为主的文学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我相信，现在所说的文学批评的不过是某种复印机形式而已。告诉我你的理论是什么，我就会提前告诉你，你对任何文学作品会发表什么见解，尤其是那些你还没有读过的作品。”^[12]前面所讨论的仇华派汉学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论，虽然这样的学者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

如果我们采用区分性和地方性的汉学主义概念，就应该把它用来特指这种“强自我文化优越论”倾向，这类研究突出的特点是将自己预先的结论强加给研究素材，肢解或歪曲事实，最终得出他者文明或文化是劣等的结论。当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合为一体时，则表现出更加危险的倾向，因为他者文化低劣的结论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与掠夺提供了某种合法化的证明。

四、跨文化研究：理解他者如何可能？

由此便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跨文化研究中从自我的视角审视他者文明或文化，如何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尽力做到客观公正呢？这也是汉学主义论争中最棘手也最难解的问题。周宁和顾明栋在对汉学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都提出了如何客观公正研究中华文明的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对此表示怀疑。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资源，帮助我们进一步搞清汉学研究的这一难题。我注意到，在晚近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

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和观念。比如有学者指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有四条基本原则：

- 1.人们是从自己文化的视角来看其他文化的；
- 2.心理学原理有些是普遍的，有些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
- 3.一些核心文化层面有助于我们对跨文化现象的理解和研究；
- 4.尽管跨文化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文化差异，但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13]。

这四个原则的内容和关系颇为有趣，关乎我们此处所说的跨文化研究难题。首先，这四条原则涉及跨文化理解和解释四个方面。其一是跨文化研究的焦点在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其二，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其三，对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研究可以从文化的核心层面入手；其四，任何人总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其他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原则的前后排序。首要原则就是从自我视角看他者文化无法避免，但如何从自我文化来看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自我文化的共同性呢？换一种问法，从自我的视角出发有无遮蔽性和盲区呢？这就关系到客观公正研究他者文化有无可能。

在我看来，从自我的视角看他者文化难免会有先入之见甚至偏见，所以这就需要通过一些调整的策略和方法来加以克服。一般来说，寻求共同性是进入对话和交往以致达成共识的有效路径。但是从自我视角来观察往往看到的是差异性，但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从差异中发现共同性就是一种正确理解和解释他者文化的逻辑。退一步来说，即使是差异性，也不必妨碍不同文化间的人们的理解和认同。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差异性，而是如何看待差异性，这就需要引入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解决。

首先，我们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所以可能的交互主体性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可能，一个重要的前提乃是交流双方角色平等的可转换性，正是这种角色转换构成了所谓“交互主体性”的基础。他写道：

纯粹的交互主体性是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的操演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交互主体性才得以存在^[14]。

我认为，在跨文化研究的阐释和理解中，这种交互主体性是极为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但体现为交往的理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中“政治正确”的要求。只有在平等的对话过程中，人们才能转换角色进而进入他者文化，深入公正地体认他者文化的特点和性质，避免先入之见的误导和偏狭的阐释。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囿于自我视角的局限性，加达默尔的阐释学提供了一种颇有启发的思路。在解决阐释者当下与古代文本之间的历史距离问题时，加达默尔提出了一个“视域融合”思路。就是将阐释者自己的当下期待视域，与历史文本出现时的过去的期待视域结合起来。由于任一视域都带有某种局限性，所以两种视域的融合就会构成一个更大的、更优越的视角。加达默尔认为，视域的融合：

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个概念本身就标识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15]。

就跨文化研究来说，这个视域融合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视域融合。尽管任何人都是从自我的视角来审视他者的，但是在跨文化研究中，实现这一视域融合是可能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地转换自己的观察角度，进入他者文化之中，设身处地观

察和体验他者文化，进而将自我与他者两种视域融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既保持自我视角来理解他者文化，又有可能融入他者文化的视角来修正自我视角的某些局限性和遮蔽性，最终走向客观公正地理解和阐释他者文化。

回到本文的主旨上来，对汉学主义作为一个地方性概念的反思，需要我们从方法论上考量跨文化研究的特性，在指出汉学主义问题的同时又指出避免汉学主义的策略。如果能够以哈贝马斯所规定的交互主体性来进入他者文化，进而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汉学主义的地方性视野，进入一个更大的观察他者文化的总体性视域。因此，在汉学研究中，应该大力提倡方法论的反思，遏制服务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汉学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汉学研究的“范式革命”。

五、结语

以上我们区分了汉学主义与汉学研究，又辨析了误释型汉学研究的不同情况，最后引入哲学和心理学的一些资源，意在说明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跨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知识领域，它不同于本位文化研究的单一性，涉及不同文化间的诸多因素的张力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学术和文化交往存在着西方霸权的不平等境况下，跨文化研究如何抵御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委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理想的科学性知识和现实的文化政治取向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尤其是人文知识的学术场域，并没有完全自律和自由的价值中立，在中国崛起的当下，这种知识生产的文化政治会变得更加显著。其二，尽管存在着知识生产中的文化政治博弈，但是，追求客观公正地阐释本位或他者文化的目标，仍然是一个人文学者必须恪守的愿景。学术无法逃脱政治的干系，但并不是一股脑把学术做出政治。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由此来看，较之于其他领域，跨文化研究需要更多的人文智慧和伦理宽容。

参考文献

- [1] S Buettner. American Art Theory, 1945—1970[M].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1: 15-36.
- [2] 顾明栋, 周宪. 汉学主义论争集萃[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 [3] 周宁. 汉学或“汉学主义”[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5-13.
- [4] 温儒敏.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 文艺争鸣, 2007(7): 51-55.
- [5][6] M D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11(S1): 770-774.
- [7] M B Wiseman.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hinese Avant-Garde Art[J].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07(1): 109-119.
- [8] 周宪. 论王广义的中国波普艺术图像学——以《大批判: 可口可乐》系列为分析对象[J]. 学术月刊, 2018(1): 140-150.
- [9] S Hall, J Evans, S Nixo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London: Sage, 1997: 6.
- [10][11]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87: 101.
- [12] F Lentricchia.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 A Theorist Rejects His Calling[J]. Lingua Franca, 1996(6): 59-67.
- [13] K D Keith.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Themes and Perspectives[M]. Oxford: Blackwell, 2010: 12.
- [14] J Habermas. Social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C]//C Lemert. Social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93: 416.
- [15] 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392.

Cross-Cultural Studies and “Sinologism”

Zhou Xi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nologism" issue that has been controversial from 1840 to 1949. The author advocates the behavior to avoid labeling only, but to enter the insides of sinology, and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sinology specifically.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inologism and sinology study and different sinologism by a Discriminant methodology. Therefore we can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cussion of sinologism i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mor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useful resources are drawn from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trategies that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inologism.

Key words: Sinologism; Misinterpreted Knowledg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elf-Other Relationship; China's Rise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困难及其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李鸿阶

摘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愿望,开启了国际合作新模式,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应全面分析、冷静思考和客观评价“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做到注重长远、把好节奏,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加强风险预警评估,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更好地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

关键词: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成效;面临问题;拓展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53-0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愿望,而且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走过五年时间,必须全面分析、冷静和客观评价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明晰合作路径,提升发展动能,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更好地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

一、“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承载着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发展经济、促进交流合作、互学互鉴的愿望,坚持合作共赢,紧紧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下简称“五通”),坚持差异发展、对接发展和包容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赏,取得了较好阶段性成果。

(一) 政策沟通持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共识更加广泛

“一带一路”建设有很强的实践性、系统性

和创新性,需要强化政策沟通。当前,中国已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蒙古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英国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波兰的“琥珀之路”等规划实现了对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协议得到了有效落实。2017年,中国与新西兰、黎巴嫩和巴拿马分别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泰国、老挝和沙特阿拉伯等7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协议》,致力于共建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理解、信任和支持^①,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世界发展、值得期待。迄今,中国与80多个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签署了100多份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政策沟通和机制化产能合作显著增强。据香港证券交易所等机构调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内地的上市公司中,有65%公司拟在三年内增加“一带一路”的有关业务^②,另据国际金融论坛和英国《中央银行》杂志调查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6家受访中央银行中,超过半

数的受访者态度积极，九成以上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将助力本国经济增长；六成以上受访者表示将“积极支持”或“支持”使用储备货币，愿意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增资^③。可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增加，利益契合点增多，将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二）设施联通日益完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显著提升

随着经济走廊、国际大通道相继打通，将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奠定基础。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看，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境内段已通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境内路段加快建设，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持续拓展，连云港—霍尔果斯陆海联运通道、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深入推进。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看，中泰铁路已开工建设，中越北仑河公路二桥提前建成，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工程整治加速进行。从中蒙俄经济走廊看，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试验段（二期工程）已相继动工，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实现投产，中俄共建的俄罗斯北极航道、“冰上丝绸之路”全面推进。从中巴经济走廊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与附属公路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看，中吉乌国际道路已建成通车，德黑兰—伊斯法罕高铁项目进展顺利。目前，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已与斯里兰卡港务局签署汉班托塔港运营协议，科伦坡港口城填海造地工程加快推进，马来西亚皇京港等海上支点港口建设进展顺利^④。此外，中欧班列数量和运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国际运输协调机制日趋完善。

（三）贸易畅通成效显著，“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持续拓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成效显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据统计，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了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设立的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费达到22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21万个^⑤。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9535.9亿美

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额比重的25.7%^[1]；2017年增至1440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6.2%；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达144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855.2亿美元，同比增长12.6%^⑥。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进口额增加较大，对俄罗斯、蒙古进口额有所提升，对西亚、中东地区贸易额比重下降，对南亚及中东欧地区出口额比重大幅增加。从投资布局看，东南亚国家仍是中国的投资重点。以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产业园为例，截至2017年8月，中马钦州产业园开工建设项目近100项，投资总额约500亿元人民币，入园投资超过280亿元人民币；马中关丹产业园已入驻7个中国优势产能项目（综合性钢铁厂、大型轮胎生产基地、铝型材加工、炼油催化剂等），累计投资额超过180亿元人民币^⑦。

（四）资金融通规模扩大，“一带一路”建设支撑明显增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为适应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增加投融资额度，研发新的金融产品。其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提供38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银行四次发行“一带一路”债券，融资规模超过100亿美元；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规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一些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管理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出了景顺“一带一路”零售基金。与此同时，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中国人民银行稳步推进与IMF合作，先后设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拟在五年内提供总额20亿等值欧元的融资贷款。据统计，截至2018年3月末，中国累计已承诺的“一带一路”专项贷款达1624亿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投向柬埔寨暹粒机场、印尼金光集团纸业收购浆厂、阿曼财政部综合授信等重点项目^⑧。2018年5月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批准2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至82个；丝路基金签约18个项目，协议投资额72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⑨。

（五）民心相通互信增加，“一带一路”架起友谊合作桥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隔阂，以“五通”架起合作桥梁，赢得了沿线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民意基础不断夯实。据国家旅游局统计：“十三五”期间，随着客源互送、线路共建持续推进，中国吸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客有8500万人次，将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31.72万名留学生在华935所高校就读^⑧，中国政府每年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为沿线国家培养大量的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通过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政党智库、社会组织和民生交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特色优势，有助于增进了解、互惠双赢，拉近了心灵距离，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

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涵盖面广、涉及领域多，不仅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不同，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不一，尤其是受到大国政治博弈、利益分配和认知理念等因素的交替影响^⑨，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部分国家的忧虑和质疑有所上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日益明显，西方国家认为动了他们的“奶酪”，有些沿线国家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审慎观望^[2]。受“信任赤字”、担心竞争和误读误判等因素影响，他们既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增加本国就业，推进经济增长；又担心中国强化地缘实力，便采取拖延迂回方式，降低“一带一路”建设影响。近年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抛出“印太战略”替代方案，日本和印度联手推出“亚非增长走廊”，印度挑起了洞朗对峙，无端指责中国是“债权帝国主义”^⑩，欧美国家忧虑和质疑声不断，甚至出现了欧洲将联合抵制“一带一路”

的说法^⑪。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新丝绸之路不应该成为一条“新的霸权之路，让沿线国家成为附庸”；法国总理菲利普声称，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来制定。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中国不应将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与政治诉求挂钩；德国外长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投资来宣扬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⑫，就是上述现象反映。

（二）对外风险防控问题日渐突出

“一带一路”建设横贯东西、连接欧亚大陆，穿越世界热点地区，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容易受地缘政治、宗教势力等因素影响。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国际争端与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如果缺少安全稳定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风险，预警机制需要强化。如，有的国家政局不稳、行政效率低、法制制度不健全、政策透明度不高、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容易产生法律纠纷、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有较大的政治风险；有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不发达，资源整合能力低，融资渠道不畅，对外资企业存在歧视现象，有较大的安全风险；有的国家资本短缺、信用状况差、债务违约多、融资成本高，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脆弱，缺乏签署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抵御风险能力低，营商环境不稳定，有较大的经济风险。

（三）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

据《“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7年在“一带一路”沿线46个样本国家中，“优先层级”（9个）、“推进层级”（12个）、“安全层级”（13个）的国家有新加坡、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34个；“谨慎层级”（10个）、“关注层级”（2个）的国家有巴林、越南、马其顿等12个，投资安全系数有待提高^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沿线国家的复杂环境缺乏足够认识，加之法律意识淡薄、投资经验缺乏、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统筹协调能力不强，存在对海外利益保护不力、产业定位不清晰、企业组织不合理和资源碎片化等问题，难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体系，导致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恶性竞争和浪费资

源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一些国家政治力量的边界不清，难于为对接“一带一路”作出妥善安排，将制约协同效应的发挥^⑥。

（四）顶层设计亟待衔接落地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共建“一带一路”的三个基本原则，确立新疆、福建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将加快构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广西和云南四大门户，有序推进沿线通道、经济走廊、八大高地（西安、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和15个港口城市建设（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在实现“五通”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有待细化，政策措施急需落地，尤其是解决争端机制尚未建立，政策衔接和项目合作就无法展开，难以及时有效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考验。

（五）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尤其是经济体系脆弱不稳定^[3]，衔接互动亟待提升。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看，主要是陆港通道滞后，客货运过于集中在满洲里、阿拉山口、二连浩特和绥芬河等4个铁路口岸，陆港枢纽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口岸公路等级较差，路网布局不合理，通道联结不畅，难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要；国际物流枢纽体系不完善，沿线国家装备标准化不高、技术标准差异大，已严重影响货物运输的发展；陆港建设牵涉部门多，政策协调难度大，导致项目融资和建设困难，制约了陆港国际化。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看，海上运输通道、港口设施配套不完善，重点港口、支点城市和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强化，海上互联互通、海洋经济合作和共同开发有待提升。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已影响经济走廊、国际大通道建设，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沿线国家融合发展。

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⑦。“一带一路”建设属于全新事物，要打造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协同发展机制，必须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系。

（一）注重长远发展和把握建设节奏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4]，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必须坚守定力，既顾及眼前利益，又注重长远目标^[5]，促进政策对接，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把握好建设节奏，做到久久为功、精耕细作，求一事而不求一时。要立足优势，做到统筹兼顾、合力推进，避免出现“欲速则不达”。要强化顶层设计，做到明确靶向、精准发力，科学布局核心区域、重点国家、战略支点、优先领域和重大项目，不断夯实合作基础，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要坚持差异发展，做到重点突出、分层推进，将合作重心转向对我友好、政局稳定、经济潜力大、基础设施需求旺盛的沿线国家，把合作重点放在周边地区、资源型、通道型国家和战略支点城市，加快打通陆海通道和空中、信息通道，提升互通互联枢纽功能，不断拓展“一带一路”发展空间。

（二）坚持差异发展和提升合作潜力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大，既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6]。由于国情不同，加上领土争端，区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要主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基础设施、民生需求和技术标准，建立健全市场合作机制，提升当地人民的参与意愿和获得感。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位特征和风险指数，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对接国际先进规则，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形成更加广泛的合作共识。要合作共赢，以增进产业互补为核心，积极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平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要政策沟通,推进睦邻友好关系,创新融资发展平台,完善管理机制,减少同质化竞争,促进沿线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7]。要互惠互利,统筹协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对外合作资源,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与现有的产业基础,以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能源矿产、海洋产业和旅游业为主线,让沿线国家尽快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

(三) 推动对接发展和构建载体平台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构建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以对接发展增进合作共识。目前,沿线国家、企业界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建设兴趣日益浓厚,如联合国设立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美国企业界与美国驻华使馆联合成立“一带一路”小组,韩国提出新北方经济政策,中日两国拟设立“一带一路”官民协议会,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联合设立“一带一路”专网,马来西亚华人公会设立“一带一路”中心,上海市进出口商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贸促会、土耳其—中国工商业协会和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联合共同设立“一带一路”贸易商联盟等。可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沿线国家首脑定期会商机制,通过部长会议和机制化论坛,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可探索构建常态化沟通机制,依托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可借鉴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机制,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强化双边多边合作,加快对接技术标准,统筹协调发展。

(四) 实现包容发展和增进发展动能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基础不一、利益诉求多元,要寻找合作最佳利益结合点,以战略型、资源型和技术型投资为主^[8],通过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9],构建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新模式,满足沿线国家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美好愿望。要立足国情、兼容并蓄,不搞封闭排他性,承认多元文化价值,善于与各种宗教打交道,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真正使“一带一路”成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和共享发展的平台^[10],不断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动能;要按照市场差异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广泛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和相关

国际机构参与合作开发,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打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11];要根据发展基础和承受能力,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与发展关切,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创新项目合作方式,争取在沿线国家打造若干个“战略支点”,积极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体现崛起大国的形象和责任担当。

(五) 增进开放合作和拓宽发展空间的关系

针对沿线国家的忧虑和质疑声音上升、民众认知度不够高等问题,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继续深化开放合作,讲究宣传策略,重视处理区域大国关系,深入浅出地阐释、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强化政策沟通,按照共商共建共赢原则,通过释疑解惑提升合作效果,努力创造“顺势而为”环境,有效化解“一带一路”建设阻力;要深入了解沿线国家发展计划,密切关注各国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愿望,选择差异化合作模式^[12],照顾到参与国家的舒适度,提升“一带一路”建设针对性。要以互信为基础,增强透明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疑虑和对地缘政治变迁的担心,使沿线国家由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让“一带一路”建设在合作共赢中壮大成长;要了解沿线国家的目标市场和潜在需求,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主动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充分利用国际投资风险的法律安排,有效化解贸易投资争端,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履约率和投资成功率,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在持续发展中增加获得感。

(六) 充分发挥优势和利用侨力资源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众多、侨力资源异常丰富,具有语言和文化等优势,不仅了解住在国的情况,对祖籍地的感情深厚,而且希望与祖籍国建立关系,加强经贸合作,以获得较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的重要依托^[13],要充分发挥侨力资源优势,鼓励海外华侨华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释疑解惑、穿针引线,消除文化隔阂,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进一步增进合作感情。要鼓励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纽带,促进

合作共赢,实现内外需协调发展,“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发展,进一步夯实合作基础,把“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区域治理合作的样本。要借助海外华侨华人渠道,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活动,充分运用和融合沿线国家的要素资源,更加精准地对标发展所需、民心所向,积极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可持续发展。

(七) 推进风险评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环境有不确定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面临的问题突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对外投资强国,随着对外关系发展,海外利益保护已提上重要议程。必须做好动态跟踪,加强相关利益合作者研究,全面开展沿线局势风险预警评估,避免盲目乐观、操之过急和一哄而上,有效规避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14]。“一带一路”建设将扩大人民币境外资金规模,有利于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可依托基础设施、大宗商品计价结算及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途径,创造更多的投融资载体,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环境。据估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规模将超过6万亿美元。另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到2030年,亚洲基建投资需求高达26万亿美元^⑧。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通过政府援助、直接投资、商业贷款、政策性贷款和发行基础设施债券等方式,尽快破解沿线各国建设的资金瓶颈,增加人民币供给比重,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更好地推进世界经济发展。

注释

- ①王毅:访欧达成三项重要共识,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外交部网站,2018-05-21.
- ②全球金融巨头“一带一路”觅商机,日本经济新闻,2018-05-16.
- ③“一带一路”倡议5周年,近30家央行发现了哪些机遇? 2018-04-28.
- ④多国驻华使节盼参与南向通道建设 深化“一带一路”合

作,中国新闻网,2018-05-01.

- 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年货物贸易额超五万亿美元,国资委网站,2018-04-16.
- ⑥商务部: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17.8%,商务部,2018-01-25.
- ⑦“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发展态势:多模式建设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成效显著,全球工信,2018-04-12.
- ⑧中国开行:力争年内完成2500亿“一带一路”专项贷款授信,中新社,2018-05-10.
- ⑨习近平铺展“一带一路”通途,央视网,2018-05-14.
- ⑩习近平铺展“一带一路”通途,央视网,2018-05-14.
- ⑪程国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创新与体系构建,中国经济新闻网,2017-11-20.
- ⑫王文:为抹黑“一带一路”,印度学者造出“债权帝国主义”一词,一带一路百人论坛,2018-03-01.
- ⑬智库报告:欧洲联合抵制中国一带一路,法意读书,2018-05-17.该报告由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联合撰写,2018年2月完成,给出的欧洲应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对策建议包括:利用欧洲成员国集团力量,在欧洲建立高水平、独立的中国专门知识,为中国在欧洲国家的投资提供替代方案,加强投资筛选工具,加强国家和欧洲安全机制,引入透明要求,建立公民社会参与者和广大公众的认识,为欧洲华人社区提供支持.
- ⑭扬之:“谁动了我的奶酪”——浅析欧美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观察者网,2018-03-31.
- 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指数普遍上升,枣庄市税务局,2018-05-15.
- ⑯周方治:“一带一路”落地东南亚面临的三大挑战,《东南亚研究》,2017-09-10.
- ⑰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04-10.
- ⑱连平:“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空间,中国证券报,2017-05-13.

参考文献

- [1]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简版)[R].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

- [2]贾益民. 海丝蓝皮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
- [3]陈东晓，叶玉. 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J]. 国际问题研究，2017(1)：11-12.
- [4]竺彩华. 世界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一带一路”建设[J]. 太平洋学报，2017(5)：55-67.
- [5]倪沙，王永兴，景维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引力分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5）：3-14.
- [6]韩民春，江聪聪.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2)：84-91.
- [7]孟祺. 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构建[J]. 财经科学，2016（2）：72-81.
- [8]张述存. “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J]. 管理世界，2017(4)：1-9.
- [9]张理娟，张晓青，姜涵，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6（6）：82-92.
- [10]陈文玲.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全球化伟大进程[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4)：12.
- [11]丁志帆，孙根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重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4-61.
- [12]宋勇超.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研究——基于多元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J]. 软科学，2017(5)：66-69.
- [13]申现杰，肖金成.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 宏观经济研究，2015(11)：30-38.
- [14]王卫星. 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9)：18-23.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struction and Several Issues to be Emphasized

Li Hongjie

Abstract: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responded to the general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 with the urgent desir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opening up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under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we should calmly analyze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the long-term and sound spee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risk early warning assessment, adhering to discrepancy of regions and joint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better benefit the countries and people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regions.

Key words: Co-construc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ain Results; Facing Problems; Development Space

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新思潮

尹晓煌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新思潮, 解读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各种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 如“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及“软实力”等; 通过对这些理念的产生及其影响之分析, 加强了解西方当前学术研究的背景、现状和趋势, 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跨文化研究; 全球化; 新左派; 软实力;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C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60-11

一、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 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 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对话和融通。跨文化交流, 就学术而言, 注重于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对中国而论, 则意味着探讨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将中华文化介绍到海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即为例证。而欲与他者对话, 势必需要了解对方, 尤其是熟悉西方学术界当前的研究重点和主要思潮, 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唯如此, 方可讲好中国故事。

众所周知, 当代人文学科诞生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之中, 其学术思潮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叙述与本土思想文化运动,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紧密的互动。本文以美国本土文化和思想体系之起源和左翼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欧美“东方主义”(Orientalism)学术体系之批判两大背景为切入点^①, 介绍当今西方, 尤其是美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 如“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

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及“软实力”等伴随着全球化进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探讨当下中国学者应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全球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新思潮, 以期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体系, 加强跨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二、从美国本土文化运动与对“东方主义”之批判谈起

以美国为例。当代美国文化、艺术乃至人文学科的本土思潮和流派是在美国独立之后, 逐步脱离欧洲传统、开始探索美国知识体系相对于欧洲的独立性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具体甚至可追溯至美国哲学家拉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于1837年8月31日在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典礼所作的题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这一著名讲演。

爱默生在演说中挑战了当时在美国知识、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其主要论点为, 哈佛大学已建校200周年, 美国也已独立60年, 但美国学术与文化界似乎仍在追随欧洲的传统, 这一

作者简介: 尹晓煌, 男, 江苏扬州人, 哈佛大学博士,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美国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校长顾问和终身教授。从事跨文化交流、美国华人、中美关系等领域之研究。

思维方式应予改变，美国需探索并走出自己的道路。正如爱默生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倾听那些欧洲宫廷文学艺术女神宣教的时间已太久了。”^②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常被称之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America's Intellectu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它宣告了美国依附于欧洲文艺与思想界的现象行将就此结束。在随后的年代里，美国文学艺术领域逐渐产生出两个大相径庭的主要流派：“红皮肤”（Redskins）与“白面孔”（Palefaces）^③。前者以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之肤色为象征，注重美国本土、尤其是大众文化风格，代表人物有马克·吐温（Mark Twain/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8—1961）等；后者则崇尚欧洲文艺界的高雅与细腻，其中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哥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 1874—1946）等作家^④。美国学者以“红皮肤”和“白面孔”作为两大重要流派之简称，本身就显示出赞许美国本土文化风格的倾向性。英文“pale”一词本意为“苍白”乃至“病态”，暗喻美国人文和文艺领域之前途，唯有依靠美国本土学者的努力。一味追随欧洲，难有“健康”出路。

爱默生的演说极大地拓展了美国本土风格的人文学术研究，激励了美国本土文学之兴起，其论点对当今中国也有两个层面的借鉴意义。其一，对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体系颇具启迪。其二，讲好美国故事的尝试与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之努力有着相通之处。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笔者曾出席基辛格博士为欢迎习主席在西雅图举办的晚宴。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他曾阅读过惠特曼的诗歌和海明威的小说，并提及为了体会海明威的创作风格，他曾在访问古巴时，参观了海明威当年侨居古巴写作《老人与海》（Old Man and Sea, 1952）经常光顾的渔港，体验海明威创作《老人与海》时的心境。习主席说：“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⑤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主人翁历尽千辛万苦以达目标信念之精神，为美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刚强、毅力之象征。海明威的著名格言“人可以被击败，但不会被摧毁”，即为此意。值得一提的是，爱默生的论点不仅促进了美国学者争取本土艺术及人文学科独立于欧洲之探索，甚至也影响了当代学者对欧美中心论的质疑和挑战。在此领域，最具开拓性的学者之一当属萨义德及其经典之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

萨义德的身世极具跨文化象征意义。他出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家庭，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美军，后移民美国。萨义德本科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在爱默生当年发表《美国学者》演说之地哈佛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1978年出版了开拓性之名著《东方主义》。萨义德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对“东方”长期的贬斥、丑化及所谓的“浪漫”解读，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中东及亚洲的借口。

“东方”这一概念被扭曲成为西方的对立面，以衬托出“西方”之正确。欧美学者以西方代表进步、文明和人性，而东方则沦为非理性、野蛮及落后之象征。然而，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这一文艺与知识体系的“东方”，究其实质，只是西方学者为了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创建其学术话语权，而臆想出的对亚洲文化之二元思维的固化概念，并逐渐形成影响，指导着西方对东方的普遍认知，这一认知至今仍影响着西方学术界^⑥。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曾试图以中国为敌，将中国视为对立面。当时我曾问及哈佛大学的孔飞力（Philip Kuhon, 1933—2016）教授美国为何要如此丑化中国，他回答道：“美国需要敌人”

（America needs enemy）。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先地位，必须建树对立面，用敌人之“丑恶”显示美国自身之优越。这一概念与萨义德在文学批评中提及的“东方主义”相似。事实正相反，人类文明本是相同与平等的，正如晚清名臣陈宝琛（1848—1935）访问哈佛大学时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题写的对联所云：“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内，人为地划分所谓东方、西方，以及把东、西方视为两个敌对体的概

念，本身就是荒谬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影响极为深远，在于他澄清了西方对东方之解读源于政治偏见，具有帝国主义知识之特征。甚至那些对亚非文明抱有同情心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如赛珍珠（Pearls S. Buck, 1892—1973），在其作品中对中国文明之描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见^⑦。

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详尽论述和颠覆性的批判，奠定了当代西方诸多左派理论之根基，为当代西方知识体系提供了转型基础，由此而产生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一些新领域。“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y）即为其中一例。后殖民研究指出，殖民地国家的今天，可被视为西方殖民统治之结果。西方殖民帝国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影响并改变了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的思维、信仰、语言和文化传统。例如，我们传统称之为吕宋群岛的南海近邻，16世纪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被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以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 1527—1598）之名重新命名为菲律宾（The Philippines）。西班牙殖民者将天主教带到了菲律宾，改变了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西班牙语长期成为菲律宾国语。正如萨义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侵略，究其实质，为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武力征服，一方面用西方知识体系改变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价值和理念。

三、1990年代以来的主要论点及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巨变，极大地加快了全球化的进展。如果说近代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葡萄牙开始向西非扩张，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人文和社科领域呈现两大重要变化：首先，在市场经济下，意识形态不再垄断知识体系。其次，高科技的兴起，使得学术思想和文化可以跨越地域和民族国家之疆界，迅速方便地得以交流。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其中有“新保守主义”（其实质为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软实力”等^⑧。

谈到“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neocon），似有必要提及两部领潮一时的西方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⑨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⑩。亨廷顿生前为哈佛大学教授，为美国保守势力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文明冲突”理论之创始者。他认为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之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伊斯兰教和儒教文明威胁了以犹太—基督教为主体的欧美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代替了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他在去世前不久所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更加强了这一论点，声称美国今天的文化价值体系，尽管多元，核心依旧为英美新教主义价值观念，即所谓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⑪。亨廷顿的这一观念，部分是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崇拜上帝的单一神教，与儒教文明之包容性截然不同，有极强的排它性。亨廷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了当今世界何以产生各种暴力冲突，其观点影响了大批美国和西方学者，为新保守主义学派奠定了理论根基。

福山受教于哈佛大学，为亨廷顿的弟子，继承了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维。他创建的概念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影响更为广泛。福山认为，冷战之终结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之终结，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的终结。人类文明之发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完结，西方社会主导的自由民主体系已经战胜了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阶段。福山视西方为冷战和意识形态之赢家而宣告历史终结，这一论断甫经发表，风行一时，成为新保守主义之学术基础。福山的历史终结之说当然过于绝对乃至荒谬。就本质而言，其历史终结论所阐述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是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代表着一种回归宗教信仰，注重传统社会的家庭、婚姻理念及国家观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族裔身份政治等自由主义思潮之反动和对抗。

当代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中，与上述观点相抗衡的学术理念，以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左派”(New Left)为最。新左派与传统左派之区别在于，传统左派更重视工会和经典的产业工人运动以及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斗争。而新左派则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仅关注传统的产业工人已远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进步，应该支持和帮助更多服务行业和零售业员工等不为传统左派重视的非经典劳工阶层，保护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支持女权运动，捍卫移民权利，提倡多元文化和尊重非白人少数族裔。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当代学者、“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权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即为其代表人物之一。

哈维认为，高科技的突飞猛进虽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社会和经济面貌，但全球化价值实现过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消费者和金融、商业资本之间的斗争已成当今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因科技进步而在生产阶段取得高工资、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会发现，在全球化的今天，商业、货币和食利资本层层盘剥了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成果，被资本的其他部分在消费过程中巧取豪夺。因而与过去相同，工人阶级仍被资本奴役。哈维的这一论断加深了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也必须因此而改变。作为新左派的代言人，哈维指出：“不幸的是，传统左派对组织快餐业的员工并不热心。”因为这些非产业工人的价值生产，与传统左派关于经典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然而，哈维强调，在全球化的进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并未消失，而是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与传统左派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产业工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就此而论，麦当劳员工可被视之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②。

此外，哈维对全球化视野下真理的普世价值与地方性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普世性的道德判断若无地方根基，便有可能沦为空洞与虚假。”^③这一颇具创见之论断，令人忆及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人权也许具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文化中，可以由不同体制来体现。”(Human rights may

be a universal aspiration, but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may be institutionalized in different forms.)^④换言之，倘若普世价值并无地方根基，未与民族与本土文化挂钩，则会流失于空洞和虚伪。因为普世价值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方式。也许西方更强调“爱幼”，但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论，“尊老”难道不也是人权的体现吗？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精辟的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并未过时，反而更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为全球政治与社会改革指明方向。例如，在当今社会焦点的女权问题上，马克思早就前瞻性地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⑤就此角度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影响之深度解读。

与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另一新思潮为“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它是全球化时代对传统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国际化理论的挑战与发展。如果说“国际主义”注重于国家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偏重各国政府及官方组织和人士之间的交往。作为国际主义的对立体，跨国民族主义则强调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人员的跨国行为，探讨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和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逐渐为全球化所替代，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资本和各类民间团体与普通民众，日益活跃于学术、文化、商业、金融、移民、慈善等范围内的跨国交往，及其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此类交往中，国家与政府已变得“无关紧要”，不再担负关键甚至任何重要作用。虽然跨国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范畴内的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及交往模式早已存在，但正是在世界进入后冷战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这一观念及其相关行为才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得以迅猛进展^⑥。出生于荷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卡娅·萨珊(Saskia Sassen)将此现象称之为另一形式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即有别于“领土疆界”(第一)和“政府权威”(第二)、随全球文化与经济一体化而兴起的“跨国民

间交往权力和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跨越疆土、超越国家体系的新型民族主义情结^①。这是一种由各类跨国民间力量及资本推动的“平面/环路模式”全球化，而非由政府、官方国际组织掌控、自上而下的“垂直/纵向体系”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形成持续的巨大影响，并为全球化研究奠定了新课题，同时也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左翼学者所提倡的“从基层着手”（from the bottom up）之科研方向相对应^②。两者均着眼于为学术界精英主义（elitism）研究所忽略，但却对社会动态有着举足轻重影响之凡人与常事，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方向。

全球化进展中，民间出现的交往模式与新型流动，也可被称为“灵活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这一学术概念的理论构建，是由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美国华人学者王爱华（Aihwa Ong）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公民身份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之后，创见性地提出。王爱华首先将“灵活公民身份”界定为各种跨国民族文化要素之核心，起源于主体（个人）因“跨国资本的积累、流通和移位，对于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条件做出灵活反应和适时变化之文化逻辑”^③。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各阶层移民家庭以及跨国政治和泛宗教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王爱华构建了跨越疆界和民族国家的文化逻辑形成之背景，并由此解读了“跨国民族性”“分级主权”等全球化理论范畴内的话语概念，提出个人、国家和地域权力争斗与隶属关系中的文化逻辑。

尤为重要的是，王爱华细致考察了文化如何参与晚期（当今）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时代的主体行动和意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等要素又是怎样改造和重塑文化自身，由此令人信服地将人类文化实践和逻辑与跨国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同置于全球化研究的主流核心之中。她认为，受后冷战时代全球一体化影响，晚期资本主义与此前不同，不再受思想意识形态束缚，投资目的更倾向于逐利而为，因而得以超越疆土、社会体系或政治阵营之间的界限。王爱华将此

称为“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视其为当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④。

世界进入后冷战与全球化以来，为塑造集体记忆，国家及民族另辟蹊径，日趋依据和运用“选择性记忆”这一特定文化模式，借助与本民族和国家相关的各类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而非仅凭意识形态和经济、法制管理体系来重塑文化和思想核心，超越各方歧见，团结人民、巩固社会，加强国家与民族之凝聚力。这一方式被命名为“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这一术语解释了政治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以及记忆如何与事件发生的客观事实可能有着显著的不同^⑤。

政治对记忆的影响，尤其是如何通过选择性记忆增强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常见于文艺创作与历史写作和传承方式。就美国而言，以“9/11”为题材之大量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媒体舆论等，均或明或隐地宣扬乃至强化人民大众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ism）这一代表美国独特文化传统之“集体记忆”。世界其他国家与此相关的具体个案与事例，也比比皆是。

在我国，如何凝聚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蓝图，加深中华民族传承历史的记忆，也是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而记忆与语言又休戚相关，盖因语言是文化与记忆最重要的媒介。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与记忆的基本手段。他强调：“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⑥著名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就曾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男人》（China Man）中回忆道，中文媒体如何成为维系她的祖籍广东、侨居美国40余年的父亲与故国之纽带：“每天，唯有阅读中文报纸这件事才能让父亲离开他的安乐椅。他总是急切地盼望着报纸的到来。每次都

提前几小时打开家门, 等候邮差……。《金山时报》是装在封套中从旧金山寄来的, 上面端正地印着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他戴上金丝眼镜, 往烟斗里装上烟丝……拉开了他每天长达数小时的看报时光。”^②

与上述学术思潮相比, “亚洲价值”(Asian Values)为亚洲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产物。这一概念始创并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有其特定缘由。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亚洲价值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是它将儒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糅合为一体, 从而有助于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创建一种共同价值观, 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日本得以流行, 因为它不仅挑战了西方, 同时也为日本重建其在亚洲的地位提供了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唯一在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增长的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一种介于西方自由民主体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独特的“第三道路”(Third Way)^③。

就内涵而言, “亚洲价值”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 注重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忠诚, 主张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放弃个人自由, 追求教育和科技的卓越, 赞誉勤勉的职业道德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 这一理念强调了国家主权、自决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高于普世价值, 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更适合于亚洲地区。

“亚洲价值”也许有其不足之处, 但应当承认, 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 西方标准并非唯一的发展模式。究其实质, 亚洲价值主要是力求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加以控制, 以达社会稳定,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创造财富, 再用财富改善社会,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而非单纯推行西方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政治民主”^④。就此而论, “亚洲价值”的包容性要高于西方价值, 且不乏成功的实证。例如,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50年, 将“亚洲价值”引为治国方针。其治下的新加坡,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由“哲君”治理,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既未沿袭西方道路, 也没

有实行苏联解体后的“休克”模式, 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径, 从而挑战了西方模式。西方学者曾质疑,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否确能另辟蹊径? 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转型是否确有“中国道路”? 进言之, 中国能否避开曾阻碍若干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中等收入陷阱”, 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一方面, “中国道路”确有争议。因其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廉价劳力和能耗之增长方式, 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 中国似在重复那些全球新兴经济实体曾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有其难以否认的独特性。在全球范围内, 没有任何可供中国直接借鉴之经验。由于人口众多, 始于20世纪50年代、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及沿海富裕地区和贫困内陆间的巨大差异, 其经济转型必须源于“中国制造”。这无论是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还是转型为以生活富裕和良性生态为主体之可持续性增长, 抑或于更进一步融入当今日趋复杂的全球一体化经济, 均为如此。中国的经济转型既非效仿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 也有别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 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中, 不断地磨合前进。

就此而论, 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兴起于全球市场及其令人惊叹之卓越成就, 的确是另辟蹊径, 代表了一条鲜明独特、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别样的增长方式。换言之, 始于40年前的中国经济转型, 不仅涵盖他国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其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国有型社会主义, 也非经典资本主义, 具备了中国特色, 立基于中国国情。这一模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可行性, 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 确实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选择及超越国家和市场二元对立型的增长模式。这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任何发展都必须致力于中国发展、中国制造。无论是转型, 或者是生态经济、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都必须摸索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也适用于文化、艺术及人文与社科知识体系之建设^⑤。

四、全球化语境中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为约瑟夫·奈（Joseph Nye, 1937—）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已倍受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奈曾任美国卡特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及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并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根据自己长期在美国政界任职及学术研究之经历，尤其是美国越南战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之经验教训，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硬”与“软”两种实力。硬实力指国家的军事、经济等实力，而软实力则为文化影响和精神凝聚力。具体而言，对内，软实力体现在对国内社会的导向力、民心认同与亲和力；对外，则表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和号召感。软实力之构成，分几个不同层次：其核心为价值体系，如意识形态、辨别判断力、宗教信仰；中层为维护核心价值之管理、法制观念；表面则为传播核心价值影响之通俗文化、流行艺术、生活习俗等^⑦。

近年来，奈在论证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他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仅具有“软”和“硬”两种实力尚不足以取胜，唯有将这两种实力巧妙地加以综合运用，才能事半功倍，得以出奇制胜。他将这一综合运用称之为“巧实力”，即：当硬就硬，该软即软；既能运用文化传播影响力取胜，也能依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强打硬拼克敌^⑧。

奈并非软实力首创者，此前就已有学者提出类似概念。笔者在哈佛大学就读时的导师之一、著名日裔学者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 1934—），就曾在其名著《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 1941—45, 1981）一书中，通过剖析二战时期日美关系，提出“文化力量”这一概念。他指出，日本二战期间败于美国，并非完全由于经济与军事实力不足，更是缺乏与美国抗衡的文化影响力。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唯一于西方之外的世界强国，终因无相应的文化力量为后盾，最终负于美国^⑨。简言之，硬实力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则是文化影响、精神感染力，为硬实力的无形

延伸。若无文化软实力为手段与载体，经济与军事硬实力就无法持续发展。更有美国学者声称，前苏联并非毁于美国的传统硬实力（导弹武器和经济封锁），而是被以好莱坞、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软实力——价值体系、文化影响力所打垮。

由于软实力能通过文化影响而非武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妙用，因而与硬实力并驾齐驱，成为西方世界16世纪以来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传教士运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教育影响，就是典型的西方软实力对外渗透和扩张，加速和巩固了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在当前全球化大潮下，经济一体化、高科技信息革命与互联网之形成，使得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更具超强的渗透力与扩张性。卫星电视、手机、电脑视频的普及，导致音乐、电影、文学、艺术等文化软实力之要素，瞬息间跨越国界与时空，遍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幼，对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形成铺天盖地的影响。就中国而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尤其是通俗文化，如餐饮等，得到飞快提升。据美国《时代》周刊统计，中国食品在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意大利之外的最为流行之食品。

然而，中国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实力。中国当今已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第二大国。然其国际文化产业不但无法与美国相比，甚至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邻国。中国的少林、太极等传统武术尽管历史悠久，但在西方社会中最有影响及流行的东方武术，仍为日本柔道与韩国跆拳道。更有甚者，美国民众对中国电影几乎无人知晓。笔者曾在任教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一个班级里询问，有谁看过中国电影，全班25位学生竟无一人举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笔者的白人秘书说她看过的唯一中国电影，是好莱坞出品的《功夫熊猫》。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与其经济实力大不相符。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之43%，欧盟占34%，而中国仅占3%。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为183亿美元，而中国为3.78亿美元，仅为美国零头^⑩。文学方面，甚至笔者熟悉的一些文学领域的美国教授中，也鲜有人阅读过当代中国文

学作品。中国新闻媒体与出版领域也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已接近美国，步入“第一世界”；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仍处“第三世界”水平。由于软实力既有文化产业之商品和资源功能，更属意识形态和学术及思想体系范畴。因而事关民族兴亡，社会安危。中国如欲和平崛起，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加速发展软实力，加强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

笔者最后将梳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帝国”概念及其相关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美国杜克大学哈特教授（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著名左派律师、前《红色旅》法律代表纳格里（Antonio Negri）在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一书中，把以全球化为核心、历史上独特的全球统治形式理论化并加以解读。此书出版后，引起西方学术界极大反响，被誉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the 21st century）。哈特和纳格里指出，美国实质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但它与传统的殖民帝国不同：“‘帝国’，我们理解为与‘帝国主义’彻底不同。帝国主义确实是欧洲民族国家超越其边界的主权扩张。……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不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国界和保障。它是一种去中心和去领土化的原则性体系，这一体系不断把整个世界包含在自己开放的、延展的疆界之内。”^③

哈特和纳格里认为，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处于帝国构建的中心。这个进程是持续不断，而非不确定的。然而，这些进程同样导致了抵抗的产生。这种抵抗为相对于帝国整体逻辑的不同全球化之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通向帝国之路及其全球化过程为产生新的自由力量提供了可能。当然，全球化不是单一的事物，我们认之为全球化的多种进程也不是统一和单义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目标，不是简单地抵抗这些进程，而是承认它们并重新把它们引向新的目标。维持帝国的多种创造力也能够自动构建一个反帝国，以及建造另一个全球流通和交锋的政治体系。企图质疑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一如那些企图重建一个帝国的斗争，将会在帝国的土地上发生。这些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④换言之，

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将促进“帝国”的灭亡。这正如马克思当年预言，机器和工厂的出现，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哈特在其近作《全球化思维中的“共有资源”》中，进一步将全球资源界定为既包括土地、矿藏、淡水和空气等有形物质资产，也涵盖语言、知识、观念、习俗情感等人类特有之“文化无形资源”。他指出，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文化遗产在跨国资本的运作下，经由各类文化节日、“申遗”等活动，转而从人类无形共有资源“升级”为资本或某些群体掌控下的有形财富。其结果是，这些人类原来的无形共有资源，虽能在短暂或特定时期内身价倍增，衍生利润；但长远而言，如同资本早期对矿藏和土地等有形自然资源掠夺一样，难以从原本人类自然共享状态下得到滋润与再生，从而导致损毁^⑤。

换言之，跨国资本对无形共有资源的掌控，类似于版权将人的精神思维变为法律保护下的私有产权，在营利之时限制了人类知识的更新与传播，从而阻碍了文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就此而论，跨国资本及其全球化代言者对人类无形文化共有资源之规范，实质是借法律保护为幌，行强取豪夺之实，远恶劣于个人偷盗行为。因而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在于怎样才能使人类免费同享文化共有资源。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哈特断言，跨国资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垄断剧增之时，即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升温加热之际。这一对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瞻望，令人忆及《共产党宣言》之结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⑥

五、结论

全球化的进程和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文与社科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跨语言、疆界、文化的研究因此而获得新的空间。数码技术颠覆性的进步推动学术研究步入新一轮的空间革命。英国全球化文化研究著名学者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全球化确实已成制造和传播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而非像某些传统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化解了文化认同

感。他并由此讥讽了那种悲天悯人式的文化怀旧之情。例如，在以奥瞿（M. Auge）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学者眼中，“节奏缓慢的法国外省小城镇”是有着足够的、相互作用的场所之典型：“那些地方在教堂的台阶上、市政厅前、咖啡馆柜台、甚至在面包店的走廊里随意的几句交谈，马上可以令人遗忘孤独。”^⑤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这样的文化场景所剩无几，因而令人伤感。

与奥瞿等欧洲传统学者的结论相反，汤姆林森指出，全球化变革之本质其实更加微妙，“超市、购物中心、机场、加油站、影城、银行大厅等这些安装了自动取款机的‘无特定性地点’”，乍看之下显示着一种“抽象、无人情味甚至异化，但这些地点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或者屈服于自身文化的相互作用。超市收款台不仅是交易地点，而且也是闲聊、幽默、观察、玩笑和争论的场所。如果旅行路线相交叉，熟人们也会约定在候机厅共度难捱的等待时光”^⑥。简言之，全球化就其实质与进程而言，是一件远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加复杂且不断进步之事。因此，全球化文化研究不应低估民族和本土文化蕴含的自适性和抵抗性资源。鉴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和艺术作为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理应责无旁贷地对当代全球化进程做出反应。身处全球化进展前列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中国学者，更应在习近平主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伟大号召鼓舞下，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 ①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美国著名左派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其主要著述有《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
- ②引自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美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方杰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35页。
- ③“Paleface”也可译为带贬意之“白种人”。
- ④J. A. Cuddon,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 2013.

- ⑤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西雅图，2015年9月22日），新华网，2015年9月23日。
- ⑥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 ⑦笔者无意在此褒贬赛珍珠在其作品中对中国和华人形象的描述。她曾创作了几十部关于中国和华人的著作，曾在1935年获普立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之重塑做出了贡献。许多美国人认为她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连同1937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是促使他们改变对华人看法的最积极、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来讲，赛珍珠创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创造’了许多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贫民窟中的人物一样。”引自艾萨克（Harold R. Isaacs），《我们心中的划痕》（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n China and India, 1950），155页。
- ⑧西方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近年来涌现的其它若干重要流派，如：新自由主义、解构主义、属性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因本文篇幅有限，不做赘叙，有兴趣者可参见尹晓煌和何成洲主编，《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其它相关著作。
- 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曾谈及，《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之再创》一书题目为编辑所定，他并非完全赞同。参见J. S. R.，“Samuel Huntington: Prophet,” Harvard Magazine（January-February），2018年，20页。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为人随和、诚恳。笔者就读于哈佛时，曾多次求教于亨廷顿，对其学者气度和大家风范，留下深刻印象。
- 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美国日裔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博士，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1992）、《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2011）、《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等。应当指出，福山近年来修正了他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远未获胜，历史更未终结。见其近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 ⑪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 ⑫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价值实现危机与日常生活政治学”, 专题演讲, 南京大学, 2016年6月7日。本段文字引自《澎湃新闻》对哈维演讲的报道, 2016年6月8日。笔者根据与哈维之访谈记录作了些许校订。同时可参见周宪、何成洲、尹晓煌, “与哈维的访谈: 空间转向、空间修复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学术研究》, 2016年8月; 杨婷, 吴楠, “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对话国际知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8月4日。
- ⑬David Harvey,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in 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6—201页。
- ⑭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美国学术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泰斗,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此文引自John S. Rosenberg, “Peering into the Future,” *Harvard Magazine*, 114:1 (Sept.-Oct.), 2013年, 25页。
- ⑮《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书信》第四卷, 1995年, 586页。
- ⑯尹晓煌和何成洲主编, 《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⑰Saskia Sassen, “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the Global,”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Approach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Polity Press, 2000: 79—105页。
- ⑱孔秉德和尹晓煌主编, 《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1—3页。
- ⑲Aihwa Ong (王爱华),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6页。
- ⑳同上。
- ㉑A.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㉒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吴叟人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年, 125页, 43页。
- ㉓Maxine Hong Kingston (汤亭亭), *China Me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251页。
- ㉔W. De Barry,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㉕Tu Weiming (杜维明), ed., *The Learn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4页。
- ㉖Hong Yinxing (洪银兴著), *The China Path to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Xiaohuang Yin (尹晓煌译), Berlin/New York/Singapore: Springer, 2016.
- ㉗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㉘Joseph Nye, “Smart Power,” Lecture, Occidental College, Los Angeles, March 17, 2016.
- ㉙Akira Iriye (入江昭),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 1941—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㉚张梅, “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会议论文, “2018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国际学术会议, 北京: 2018年6月9日。
- ㉛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引文出自此书中文译本《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㉜同上。
- ㉝Michael Hardt, “The Common in Communism”, in *Rethinking Marxism*, 22:3 (2010), 346—56页。
- ㉞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394—435页。
- ㉟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Analysis”,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7年, 146—168页。
- ㊱同上。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Yin Xiao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It analyzes various major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at have made an impact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hip, especiall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including “neoconservatism (neocon),” the “New Left,” “transnationalism,” “flexible capitalism,” “flexible citizenship,” “politics of memory,” “Asian Valu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ft power.” By analyzing the sources and influences of these popular ideas and important thought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in Western academia, thus more successfully promoting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discourse about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nscultur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New Left; Soft Power; China Path

情感史与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

金 雯

摘 要: 本文从小说形式与情感模式之间的关系入手,寻找探讨世界小说史的新路径,以小说史进入情感史,以情感史反观小说史。首先梳理情感文化史研究的几条主要脉络,并说明18世纪小说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地位。随后逐一探讨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小说”的不同形态,以及它们所暗示的不同情感结构。比较文学不仅跨越语言与文学传统的界限,也同样含有打破文化与文学边界的意思,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同时入手,对18世纪欧洲小说和情感史提出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 情感研究; 18世纪; 欧洲小说; 《克拉丽莎》; 《新爱洛伊丝》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71-10

法国理论家朗西埃著有名篇《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包法利夫人》,分析了主人公的死亡所揭示的意义。包法利夫人的问题在于把小说中的缠绵情意和贵族家庭中目睹的奢华精致误认为生活的目标,不满足自己作为乡村医生夫人的平庸境遇,为了虚荣骄纵的生活负债累累,最终无助而亡。包法利夫人把想象当真的能力无疑是死亡的根源,自尽是对她的惩罚,对中产阶级女性的警戒。问题是小说为什么要杀死把想象当真的人?朗西埃的答案是福楼拜杀死包法利夫人,表明她将想象和生活融为一体的行为只是对贵族审美趣味的拙劣的模仿对粗劣模仿的一种抵御,只是将一个阶层的旨趣奉为圭臬,产生这也是自己原生欲望幻觉,并对之加以粗暴的复制,这种模仿远非欲望的民主。朗西埃认为,《包法利夫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实主义,用和主人公不一样的方式实现文字与现实的融合。福楼拜的写实不是粗劣的模仿,而是将此间的所有自然扰动和感官体验悉数呈现,将瞬息万变的感官体验和情绪悉数传递给读者,打破“可感知物的等级式分布”,让他们在阅读中培育一种不加辨别的感受模式,这才是真正的欲望的民主,情感的民主^①。这个评论告诉我们的是:小说形式的变迁往往是对某

种情感模式的反抗,而新的叙事风格和新型情感模式总是互相包含、相互依赖的。小说史与情感史不可分离。

对于世界小说史的研究,本文想从小说形式与情感模式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小说史进入情感史,以情感史反观小说史。下面首先梳理情感文化史研究,说明18世纪小说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地位。随后逐一探讨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小说”的不同形态,以及它们暗示的不同情感模式。比较文学不仅跨越语言与文学传统的界限,也同样含有打破文化与文学边界的意思,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同时入手,对18世纪欧洲小说和情感史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情感研究(emotion studies)的众多理论渊薮

在心理学之外,情感研究发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早在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和卡萝尔·斯特恩斯夫妇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中提出“情感学”(emotionology)研究的必要性^[1]。2010年,伦敦大学的伊恩·普兰普尔在《历史与理论》期刊

作者简介: 金雯,女,上海人,青年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美国文学,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文学与情感史、阅读史的互动关系研究。

上提出“情感转折”这个观点^[2]。而《美国历史评论》又于2012年举行了一次名为“情感历史研究”专题讨论,邀请六位人类学学者和历史学者一起与编辑探讨他们进入该领域的不同路径以及在研究中采用的不同方法。专家都指出“语言转向”的不足之处,但同时又以语言建构的思路来考察情感,提出情感借助概念才能形成,并遵循成文的社会情感规范。这种理解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情感的理解非常一致,文学学者蕾·特拉达曾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专著《情感与理论》,探讨情感在后结构主体观中间的地位。她从德里达开始梳理,认为他改写了胡塞尔和卢梭对于“自发情感”(auto-affection)的认识,将情感理解为对于内心世界的阐释,其基础也是“自我的分裂”(self-deference)以及“自我对自我的再现”(self-representation),并非自我感受本身^[3]。这个观点其实从笛卡尔时期就开始萌芽,笛卡尔在《灵魂的激情》(1649)中就认为激情是理性的一部分,和理性一样,情感是可以被自我认知的,只要它足够清晰,自我与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激情之间存在沟壑,但是可以被弥合。而后解构主义者认为理性思考与激情都不能克服主体内部的裂痕,所谓直觉可感受的内心情绪,离不开使之得以成形的概念,而概念也不像康德所论内在于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外在语言强行加诸个人的。

除了解构主义理论,情感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内还有很多其它理论依据和源头。首先是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的兴起。伯明翰学派创始人、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先驱理查德·霍佳特在《读写能力的功用》中采取了动之以情的写作模式,对阶级不公后果的感性叙述为文化研究开拓了在社会学描述之外体察所观察对象所面临的“不同情感压力”的学术脉络^[4],其研究思路在霍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安德鲁·罗斯等学者这里有所延续,虽似乎式微,但并未全然泯灭。更重要的是另一位雷蒙·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理论,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与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不同,“情感结构”关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流行文化所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且是尚未沉淀为意识形态

的“形成中”(emergent)的情感特征,就像溶液中飘浮的微尘,有隐性的结构,但还没有显而易见的形状^[5]。沿用此概念的学者多强调变动中的文化和经验,指向的是还没有定型或者不能僵化为“结构”的流动的经验^[6]。不一定要在当代文化中寻找,过去时代中的不明显情感结构也是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提炼的。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与胡塞尔和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不一样,不是指作为个体意识背景和框架的既定文化世界,而恰恰是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感线索,激烈、真切,捉摸不透。

与早期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一样,女性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也培育了一个对于情感问题十分关注与友好的批评氛围。对于“感伤小说”或“情感小说”的批评也大有助益。从简·汤普森1985年的专著《耸动的布局》(Sensational Designs, 探讨1790—1860年间的美国通俗小说)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小说的研究,为研究文学传播及其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与思路。

其次要追溯至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中对于主体建构的拷问。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延续、发扬了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主体理论,对资本主义所需要和构建的主体进行了细致分析。詹明信也承继了关注主体建构的左翼批评传统,后现代情感的学者都难免要遭遇他关于后现代文化中“情感的萎缩”(waning of affect)的论点。詹明信借用列奥塔《力比多经济》中反宏大教条的思路与语汇,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情感已经脱离了固定的主体,并把这种与主体无关的情绪称为“强度”(intensities),指出它具有“自由扩散、非个人化的特征,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狂喜”^[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当代情感理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当代学者对弗洛伊德的“忧郁”“重复冲动”“创伤”和“集体心理”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阐释,要么把弗洛伊德变成后现代理论的对立面,要么变成后现代理论的先兆。

主体建构理论在德勒兹这里达到了高峰,他开始致力于发现主体“产生”的机制,而不再满足于康德对于主体存在的超验前提的解释。借用尼

采、伯格森和斯宾诺莎的语汇(谱系、多元性、一元性)来想象一个不断产生,不断变化的现实和主体。无独有偶,福柯也用自己的《性史》开启了研究情感谱系的方法,和德勒兹一样强调欲望和“感受”欲望的主体所产生的过程。这两位精神息息相通的理论家对情感和主体的形成进行了重新阐释,从根本上将两者都解释为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德勒兹也是更为理想主义的一个,认为存在的形式即无意识的生理能量和对外界产生影响的能力,即“强度”,正是这尚未进入语言和概念的“强度”在不断变幻中塑造着时刻变换的主体^②。德勒兹和福柯两位理论家对于情感(包括通过语言中介的欲望,也包括无意识的“强度”)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崛起至关重要,也使研究者得以跳出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窠臼。在福柯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以格林布拉特和凯瑟琳·加勒格等人为代表,在对早期现代和现代文化的研究中关注情感模式的变迁,模糊次要和经典文化作品的区别,寻找被社会规则所限定但又包含变化潜能的文化现象。格林布拉特对于“自我观念”形成的历史和加勒格关于19世纪“身体经济”的研究等都凸显这个特点^③。而同时,德勒兹的译介直接促成了狭义情感研究,或称之为“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的崛起,以帕特丽夏·克劳为代表的学者用“强度”的概念来提议各种打破社会对身体进行控制的手段^④。

最后,情感研究在当代文化理论之外,也可以在“传统”理论中发现一些先兆。《论崇高》以来的审美理论大多与情感有关,也从情感史研究的角度得到了新的阐释^⑤。韦伯以降的文化社会学也对社会变迁的情感因素与制度支撑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德国诺贝尔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H.O.赫施曼的《激情与兴趣》等书籍都是文化史研究的前驱,也可以在与当代理论的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另外还有一个传统也进入了情感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那就是心理学、解剖学,以及脑科学关于意识形成和结构的话语。这些科学话语对现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介入

很深,当代文学研究也已经开始深入关注科学对于文学文化发展的影响^⑥。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情感研究中,必须厘清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是主体、意识与身体之间的复杂关联。“主体”强调社会关系,“意识”与“身体”侧重心理和生理过程,对前者的理解比较依赖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后两者比较依赖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和生理学,但这三个概念在情感研究中都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另一种关系指的是日常生活与再现的关联,文本和社会规范、礼仪风俗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都包含错综复杂的情感结构。研究者必须兼顾经验与文本,勾勒情感结构形成的过程,又避免机械地将情感结构削减为韦伯所说的“理想型”。

18世纪在情感研究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这是被弗莱(Frye)称为“感性年代”(Age of Sensibility)的世纪,是“私人领域”形成的时期,也是情感在哲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话语中突然崛起的世纪,是同情、慈善、博爱等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关键元素逐渐显露的时期。这同样是现代英语小说兴起的年代,图书市场的完善也使得阅读越来越多地成为情感塑造的场域。小说甫一诞生,就以强大的娱乐和移情作用著称,形成了最早的媒体文化,小说表现情感模式的重要变化,能引发幻觉,锻造思维,早期小说作者和批评家们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充满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这个时期有许多以情感探索为中心的著名小说,最为畅销、影响最广的莫过于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新爱洛伊丝》。卢梭明显借鉴了理查逊的作品,而理查逊也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互相勾连紧密,但他们对于情感与小说关系的理解又有很多区别。资产阶级“情感结构”在以这两部作品为代表的小说中找到土壤,但却始终没有沉淀为静止的世界观。谈小说与情感结构的关系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深入分析文本如何再现复杂的情感结构,第二是探讨小说如何在阅读中产生移情和塑造情感的过程,进而推动情感结构的变化和生成。本文聚焦于第一点,第二点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笔者在其它场合有所涉及^⑦。

二、《克拉丽莎》的复调写作

《克拉丽莎》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篇幅最长的英语小说，也同时是写男女感情冲突最出色的小说。爱情与婚姻是小说诞生之初就专注探讨的主题，一般将现代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以来的散文或诗体罗曼司，那么与情爱——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更是无法脱离。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都在18世纪发生了重要改变，贵族和士绅阶级的状况记载尤其完整，注重个体权益的资产阶级伦理观的兴起，隐私与婚姻自主观形成，单身女性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种种变化又与叙事形式的革新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研究情感结构变迁的肥沃土壤。

英国书信体小说可以追溯至历史学家詹姆斯·豪威尔（James Howell）在1645—1650间整理出版的《家常信札》，出版时是以真实书信为名义，不过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合集中有些信件属于虚构，实际上可以看成英语中书信体小说的源头。一般认为，法国书信体小说对理查逊的影响也比较大，1669年出版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有巨大影响，开启了17、18世纪以直接记叙、表达情感为叙事形式的书信体小说的脉络，随后，马里沃（Marivaux）的《玛丽安的生活》也对理查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理查逊并不只是承继了前人精髓，他对书信体小说这个体裁做出了两个重要创新，一个是在书信体小说中充分运用书信写作所特有的自省写作模式——正如克拉丽莎所说的“写下每一时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未来有用的所思所为”（135封信）。同时，理查逊也通过重写“男女之战”这个文学母题开创了让人物在书信中互相品读的传统。克拉丽莎和追求者勒夫拉斯不仅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叙述往往体现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同时又彼此互相试探观察，这在书信体小说中开创了一种特殊的复调式写作。把男女情爱比作战争始自奥维德的《爱》与《爱经》，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也经常有把俘获女士的芳心或者把自己的心灵被爱情俘获比作狩猎。可是，在《克拉丽莎》里，男女求爱的过程不再只是激情消泯了理智之后的攻城略地，而是

理智和判断力的一种较量，这种判断力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他人内心的解读。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创新，理查逊之前从来没有作家在描写求爱过程中如此细腻地展示男女双方互相揣测的环节。

《克拉丽莎》中两位主人公之间矛盾的根本缘由并非外界干扰（与《汤姆·琼斯》不一样），而是两人意念上的差距，也是互相之间的误读所致。误读在早期现代戏剧和早期小说中也时常有所发生，但一般都与化装、易装、或故意的误导有关（参见莎士比亚喜剧、海伍德的《范特米娜》，以及菲尔丁的各部小说）。理查逊的第一部小说《帕梅拉》中，男主人公因为一个巧合有幸读到女主人公的手迹，因此得以窥见她的内心。在《克拉丽莎》中，这个作者干预手段被抽离，两个主人公只能依靠揣测琢磨对方内心。小说的悲剧走向不仅是对历史话语中男女地位差异的反映，也源于理查逊对男女情感互动中巨大错位的认识。

男女冲突的内心化不仅开了书信体小说的先河，在英国叙事文学中是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可以说是理查逊最重要的首创。我们可以考察小说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段落，仔细看看克拉丽莎在离开家后是如何同意跟勒夫莱斯去罪恶之地伦敦的。克拉丽莎在给密友安娜小姐的信中说，勒夫莱斯听到了她家里人要强行带她回去的消息，就提议他们去温莎（116封信）^⑦，后来又表示温莎人多而杂，或许不妙，又提出伦敦。此时克拉丽莎为了判断他是否早有带她去伦敦的预谋，“不断盯着勒夫莱斯的眼睛，考察他内心的诚实程度”（125封信），她最终判断勒夫莱斯其实并无意伦敦，并没有设计陷害的意思，便同意前往，正如她自己所说，“假如他对伦敦早就深谋远虑，那么她就不考虑了”（125封信）。但勒夫莱斯早已读出克拉丽莎的疑虑，所以其实是有意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为了让克拉丽莎选择伦敦，故意先提议温莎，更有甚者，他将自己的算计归咎于女性的心机：“是她们让人不得不狡诈以对，等受了骗，又反过来控诉一个借用其人之道的男人。（127封信）”这段心理冲突异常纠结，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的例证。克拉丽莎不断用直接的方法来对他进行观察揣测，而勒夫莱斯做的许多事情都基于对克拉丽莎可能做出反

应的预测。在小说中还出现了克拉丽莎不断揣测他人心思的段落,因为勒夫莱斯长辈贝蒂夫人给她写的信(实为勒夫莱斯假造)没有明确邀请她前去拜访,便拒绝前往暂住,揣测说“夫人心知对错的界限,既然是为了担心我不接受才不给我邀请,那么假如我真的接受了邀请,一定觉得我很无礼”(123封信)。克拉丽莎自始至终的性格特点就是“delicacy”(敏感),这个词在小说出现得非常频繁,其意义就是对举止得当和谦卑辞让等礼数感知敏锐,而遵循礼数又要求她对同阶层人士的习惯心理体悟准确。同时,勒夫莱斯也显示了很强的判断力,在很多场合都正确估计了克拉丽莎的反应,比如他第三次求婚,克拉丽莎没有拒绝,只是表示不能太快,勒夫莱斯在信中就揣度她的内心:她不同意快速结婚是因为她“至死恐怕也不会放弃的‘敏感’不会允许她逾越礼法”(152封信)。

两人的互相揣测有切中要害地方,但误读的阴影挥之不去。克拉丽莎很早发出了勒夫莱斯“没有心”的慨叹,对他总体的认识——过于骄傲又过于谄媚,不尊重女性意志——比较接近他自己信中流露出的性格特征,但她毕竟失算了,完全低估了他为了征服自己而可能采取的手段。而勒夫莱斯就更为失败,他在整个小说中都充满了对克拉丽莎的操控欲望,想要提前揣测她的心理,诱导她走向他所决定的方向。但他也和克拉丽莎一样失败了,他施加强暴行为正是对自己的心理控制能力失去信心的体现,对克拉丽莎的暴力是二人判断力共同失败的表征。如果说克拉丽莎的失败源于缺乏对险恶社会的见识,那么勒夫莱斯的问题在于世俗偏见的流毒。他在强暴克拉丽莎后对贝尔福德坦言说希望他最终能被原谅,但又希望“在类似情况下我是她唯一能够原谅的人”(259封信),态度十分矛盾。究其根源,是因为勒夫莱斯一直坚信绝大多数女性在遭受强暴后就会屈服,所以虽然因为无法说动克拉丽莎而对她施以强暴,但同时也担忧她会印证女性无法逃脱的软弱。勒夫莱斯对女性软弱的担忧一方面出自他自己对女性始乱终弃的经历,一方面也受文化思维定式的影响。他将女性不能坚守忠贞的念头强加于克拉丽莎,又希望她能推翻这个期望,这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表明,男性对女性期

望的内在矛盾被转嫁到女性身上,使她们不堪重负,克拉丽莎的死正是这种重负的代价。而勒夫莱斯也是一名牺牲者,他最后向克拉丽莎表兄莫登发出挑衅,致使后者提出决斗,勒夫莱斯这里的行为无疑是拿生命赌博,是他彻底失去对克拉丽莎的操控后绝望心情的体现。可见,这部小说的悲剧走向印刻着社会与个人认知中不可纾解的矛盾,书信体小说的“复调”转向为一种新型情感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理查逊所开创的多重视角叠加的叙事手法意义深远。视角的掌握是从奥斯丁到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一直最为重视的叙事元素,读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判断各叙事片段出自哪个视角,不同视角间或叠加或折射,互相遮蔽修正,而理查逊用书信体首先进行了一番史无前例的探索。理查逊的天才就在于将笔下人物阅读他人的能力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多视角叙事中融入了彼此互读的艰难过程,将“男女大战”母题的悲剧阐释至极致,为之后的英语小说树立了一个无法规避的标尺。他也给读者的认知和解读制造了美妙的障碍。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往往能发现“内心”的复杂与不可知性,这当然不至于会阻止他们阐释内心,但会让他们对每一种阐释都保持对其对立面的警觉,思考小说中其他人物以及目力所及处其他读者的相异阐释。

勒夫莱斯与克拉丽莎之间的心理大战也提醒我们,不仅要把小说中单个人物的心理放在不同视角的交叉互动中来理解,也要将理查逊的小说放置于它所回应和关照的语境中来解读。因此,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男女就婚姻和情爱问题进行交锋的历史就格外重要。在这个世纪里,女性提出了自己对于婚姻的强烈诉求,而男性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弹,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出拉锯的态势。首先,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期间,适龄男性减少,未婚女性向议会请愿要求男性尽早结婚,最早的一篇请愿文出现于1642年,标题叫做《失去心上人的处女之怨》(The Virgin's Complaint, 1642)^[9]。复辟时期,由于浪荡子文化的崛起等因素,又大量出现了指责男士行为不端,或拖延不婚,使得女性无法正常成婚的文字,会出现在有“悲叹”“怨词”字样的标题下,或者虚构的女子议会的章程和决议,

借此抨击男性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态度。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宪政的确立,女性的政治权益意识增强,对于男性的不满也上升到直接表达的地步。

而男性对这种情况的变化也做出了可以想见的反应。一方面是书写劝导手册,为恨嫁女士提供策略和方法,一方面针锋相对书写婚姻生活的困扰和对男性的拖累。这种拉锯不久也促成单身生活理念的兴起。而单身女性经济地位上升也为自主选择单身女性的几率增大提供了条件。

18世纪早期,以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为代表的女作家开始把单身作为一种比不幸婚姻要更可取的选择,并探讨社会如何为单身女性准备空间。由于修道院在17世纪的英国大规模解散,单身女性缺乏其它欧洲国家所能提供的容身之处,如济贫院(alms-houses),女修道院(beguinages),和妓女收容所(Magdalen house)等场所。阿斯特尔便倡导女性学院,设想使女性在不受男性干涉的情况下,与其他女性一起接受现代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和群体。虽然设想没有实现,但也毕竟在思想上超越了笛福等男性文化人士建议通过女子学院,让女性接受教育,从而为婚姻做好准备的思想^⑧。反过来说,单身女性概念的兴起又引发了对这个群体的尖刻嘲讽,“女光棍”(spinster)一词的意味在18世纪有所丑化,和新出现的“老小姐”(old maid)一样成为攻击女性的利器。当时的文化名流斯蒂尔、笛福、艾迪生等人都在杂志中发表过嘲讽“老小姐”的文章。

理查逊在小说中重写“男女大战”的主题无疑是在回应和重写这段复杂的历史。他通过对勒夫莱斯的心理刻画暗示男性对女性主体意识增强的抵触和无奈,及其引起的女性污名化现象。理查逊的小说经常被诟病为“小气”“逼仄”,实际上却能在主要人物寄寓变化中的情感机制,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和深入。

理查逊对男女双方在互动中体现的心理机制的考察往往不被人欣赏,后世的批评家经常做出一边倒的批评。在阅读《克拉丽莎》的历史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曾经掀起了一场小高潮,围绕克拉丽莎被强暴到底是谁的错意见纷纭。威廉·沃纳1979年的著作《阅读克拉丽莎》(Reading

Clarissa)使用解构主义理论,通过精致的细读论证克拉丽莎对事件的进程也是有所掌控的,并非全然的受害者。随后,特里·卡瑟尔和伊格尔顿分别出版了一本专著,反驳沃纳著作中架空历史的论证。他们同样强调小说中复杂的权力与话语斗争,但认为还是应该突出克拉丽莎作为一个女性在小说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卡瑟尔认为克拉丽莎是被控制、被随意解读的,虽然她自己也有“阅读病症”,经常做出误判^[10],伊格尔顿抓住强奸被快速掠过的事实,指出这也正是小说中很多人物和许多批评家同样无法正视的男女权力的不均,导致他们在质询克拉丽莎在此事件中责任的时候忽略了女性的总体社会地位。批评家的不同结论体现对18世纪性别关系史和婚姻、情感史的不同认识,取决于对权力分布状况,及其对个体命运影响的不同观点。情感建构是主体建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面少不了权力关系的影响,而权力之网到底有没有空隙,多少空隙,永远是文学争辩的关键,也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答案。这场关于克拉丽莎的争辩重复了理查逊和他的读者之间对于小说中两位人物的争论^⑨,也恐怕是一场只要有人读《克拉丽莎》就会不断被重复的争论。文学人物应该如何行动和感受,应该如何展现历史的重压与主体的应对策略,是文学研究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克拉丽莎》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践。

三、《新爱洛伊丝》的异托邦

卢梭和理查逊有着很鲜明的共同点,两者都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探讨现实爱情的可能,而并非可能或理想的爱情,并且手法细腻,比英语、法语传统中的前辈贝恩、马里沃等人的勾勒要丰厚细腻得多,并以此来引发读者认同。《克拉丽莎》和《新爱洛伊丝》都有明显的说教意味和企图,理查逊劝诫女性谨慎,卢梭则想要勾勒“没有罪恶的爱情”(第五卷12封信)^⑩,但两人最终都并不强加教条,虽然提出伦理命题,但最终都显示了命题在现实中承受的诸多阻碍,以不可逆转的悲剧收场。卢梭的小说也是在理查逊的《克拉丽莎》的启发下写就的。如果说理查逊小说的悲剧在于男主人公在情

感和女性地位的观念上无法企及女主人公的理想境界,二者无法调和共存,那么卢梭《新爱洛伊丝》的矛盾在于两主人公理想中的爱情在现实中难免露出或自私或妥协的面貌,难免走向衰败,只能让于丽在风华正茂时突然死亡,让故事定格于情感纯净之极的顶点。卢梭小说受理查逊启发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拓展了理查逊的情感研究工程,展现情感困境的另一侧面,探讨真诚无私的情感如果形成,能否在现实中长存的问题。

世俗的浪荡子之爱在英国小说和戏剧中的传统都十分旺盛,拉克洛的《危险关系》众所周知,其实之前就有克雷比永的《心灵与头脑的流浪》(1736),最早也可以追溯至西阿诺与索雷尔、帕斯卡尔这些人对于宗教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抵制、反讽。可与英国托马斯·奥特威戏剧的《孤儿》(“The Orphan” 1680)和尼古拉斯·罗尔的戏剧《美丽的忏悔者》(“The Fair Penitent” 1703),以及曼利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 1709)和克利兰德的小说《芬妮·希尔》类比。卢梭想要写的小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与《克拉丽莎》一样,《新爱洛伊丝》也是对浪荡子文学发起的抵制。正如于丽在小说中所说:“用教学来玷污女士的心灵是所有引诱手段中最为卑劣的;而如果用小说来打动心上人那么就太没有手段了。”(第一卷第8封信)在这句话里,卢梭否定了之前的小说传统,说明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圣普乐所应该做的就是摒弃以知识和言辞进行引诱的惯常套路。与《克拉丽莎》不一样,在卢梭设定的情节里,女主人公占据主导地位,她称呼圣普乐为自己的“学生”,并在死前深刻影响了男主人公的情感走势,在与沃尔玛成婚之后,也将原来炽烈的爱情转换为“崇高的友谊”(sublime friendship)。女性视角的胜利很为罕见,而且这还不是对世俗有抗拒能力的“知性”女主人公,而是类似克拉丽莎圣洁女性的形象。

这种规训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于丽对于圣普乐的影响体现出来的,这里的男女主人公没有情感不对称的问题,两人都对对方有很深的爱恋,但是于丽一开始就指出了一点:

我的愿望是你能够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依靠我来关照我们两人共同的未来。难道你怀疑你对我就像我自己一样亲近,你认为我感受到的任何喜悦会对你有所保留吗?不,我的朋友,我和你志趣一致,但理性略多,更懂得驾驭。我承认比你年幼,但你是否注意到,虽然女性的理性通常弱些,更容易凋零,但形成也更早,就像柔弱的葵花比橡树萌芽早,生长也更快。我们从幼年起就被委以危险重任,为保存理性很快就唤醒判断力,而要洞察事情发展的结局,必须深刻感知其签字风险。就此事而言,我越是思索,越是发现我的爱与你理智对你有着同样的要求。所以请你聆听她甜蜜的声音吧,接受另一个盲人的指引吧,那个盲人至少还有一些依傍。(第一卷第11封信)

这段话里有不少当代读者无法接受的陈旧话语,尤其是女性与理性的关系。这与后来于丽奉父命成婚,并认同宣扬婚姻中男女应有分属领域,做同样的事可能抵触频发的观念一脉相通。卢梭对爱情中的美德极端强调,却也和理查逊一样,接受了18世纪对于女性能力的贬抑以及对她们行为领域的束缚。同样,他也和理查逊一样,将女性美德与超越身体需要与情感的纯洁联系在一起,这个美德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性,对身体的忽视,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无私地将对方置于自己之上,卢梭对爱情的阐释也是极其理想化的,根基在于美德:“美丽的于丽,你的魅力闪耀我的双眼,但如果没有那个更强大魅力的激活,它们绝不会让我的心灵迷失。打动我的是你鲜活的敏感,不变的温柔,对他人苦难轻柔的同情,是你的良好的判断和高尚的品味,它们的纯洁正是你纯洁灵魂的延伸。”(第一卷第1封信)卢梭也借鉴了理查逊小说中对于“纯洁”友谊的歌颂。在小说第一卷中,我们就看到克莱尔给于丽写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几乎是从摇篮里就开始结下温暖柔和的友谊,从不曾分离,可以说,正是这友谊点亮了我们心中所有其它的激情。”(第一卷第7封信)卢梭与理查逊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纯洁情感的歌颂与之前《爱弥儿》《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早有显现。《新爱洛伊丝》中圣普乐又提出了“理智造就了人,情感为他指

路”的见解,与休谟《人性论》中对于情感的道德作用的表达颇为相似(第三卷第7封信)。

于丽命令圣普乐离家之后,他在欧洲各地游历,并继续与她通信,其间对法国上层社会的情感方式发出颇为严厉的斥责。他说法国名流无一不喜欢谈论情感,辞藻华丽,却没有一丝真情:“哦,于丽,我们心灵简单,从不知道这些美丽的格言,不过我担心,对这些所谓经历老道的人来说,情感就像身处学究包围的荷马,他们制造了一千句美丽的辞藻,却没能发现荷马真正的美”(第三卷第17封信)。圣普乐对虚假法国人的看法让人想到史达尔夫人在《德国》(1813)一书中对于法国社会普遍逢场作戏的轻蔑之词。

卢梭对于真实情感的赞颂对法国大革命的情感观念影响深远,至少从埃德蒙·伯克开始,卢梭就被看作法国革命的主要精神鼻祖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威廉·莱迪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基于对自然情感的推崇,而这种推崇的精神源泉就是卢梭^[1]。但卢梭也很清楚地知道纯真的情感得来不易,这种领悟不仅来自他自己的个人情史,也来自他对历史的见解。在小说中,于丽的突然死亡也给卢梭的理想主义蒙上一层尘土,连他也不知道这样无私的情感能否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保持,即使是想象也难以延续,这与克拉丽莎最后精力交瘁而亡具有同样的悲剧力量,也同样展现了萌动的情感结构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巨大张力。

理查逊和卢梭的小说都被认为是欧洲“情感小说”的重要源头,本文不拘泥于文学形式的演变史,将体裁发展的历程与情感结构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18世纪欧洲对于婚姻与爱情的认识普遍有所变化,女性地位也发生了重要而矛盾的变化,一方面是圣洁的美德化身,人类精神的引导者,一方面因为追求情感自主成为被丑化的对象。

四、结语

法国与英国文学交流非常广泛,都在18世纪中期发展起以情感探索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情感表现的方法上很不一致。这方面研究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情感研究与文学与文化的交叉是非常

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热点,它使我们得以回到文学自18世纪以来就致力探索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精神分析,和福柯开创文化史研究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在文学和其它文化形式中发现“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无法囊括的精神史线索和云团。用情感史的视角,批评者可以将文学形式以及性别、阶级等社会范畴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对于崛起中的“意识”结构的考察,全面打开我们的批评维度。

情感文化史的研究不局限于小说,但以此入手也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正如威廉斯所说:“语义形象”(semantic figures)中飘浮着不曾定型,却因此更为鲜活的情感结构^①。18世纪欧洲小说更是这项研究不容质疑的重镇。现代小说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极其具有穿透力的早期媒体文化,这个发展与18世纪“情感文化”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为我们研究情感的隐秘历史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场域,一个合适的入口。理查逊和卢梭对“情感小说”的期待远不止我们常说的感怀涕零,而是希望能激发向善的情感,拿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的话来讲:“小说恐怕是人心溃烂后唯一迸发教诲作用的终极手段了;我希望只有诚实理智的人们才被允许创作小说,用作品书写心性,只有具有人类缺点的作家才不会把美德描写为人类不可企及的天堂盛景,而会让人觉得美德不是那么严肃,继而逐步从罪恶的怀抱中挣脱,慢慢走向美德。(第二卷第2封信)”这段话是对小说诞生之初作为娱乐和教化双重作用的最佳描述。当我们理解了18世纪小说的精妙之后,便可以由此进发至18世纪小说阅读史来考察小说的实际情感效应,然后转移到其它时间段,或进入与欧洲以外的文化进行比较的路径,前景不可限量。

注释

① Jacques Rancière, "Why Emma Bovary Had to Be Killed," *Critical Inquiry* 34, no. 2 (Winter 2008): 237. 此处的翻译是作者的,原文是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② 关于“强度”的解释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Brian Masumi,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1. 两位作者延续了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将“欲望”重新阐释为“情动”(affect)的做法。

③参见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Catherine Gallagher, *The Body Economic: Life, Death, and Sens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Patricia Clough,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将美学与情感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参见Sianne Ngai的*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⑥参见Eric Kandel,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Deidre Lynch, *Loving Literature: A Cultural Hist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等著作。

⑦Samuel Richardson,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edited by Angus Ross, London, NY: Penguin Books, 1985. 出自本书的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⑧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London", Printed by R. R. for Tho. Cockerill, 1697. 笛福在这个小册子里提出了建立女性学院的建议, 目的是为她们踏入婚姻做准备。

⑨理查逊在出版前后与许多女性朋友通信, 求取她们对这本小说的意见, 他不断对女性对男性惊人的原谅能力震惊, 以致于他在第三和第四版的后记中专门为自己不安排完满结局做出辩护。相反的, 他不断向反方向修改自己的小说, 突出勒夫莱斯的不可救药。在第三版里把在第一版中删除的细节加了回去, 比如Isle of Wight阴谋, 还增加了其它令人匪夷所思的坏事。

⑩卢梭, 《新爱洛伊丝》, 伊信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出自这本书的引文是笔者在译文基础上修改过的版本。

⑪参见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34页。

参考文献

- [1] P N Sterns, C Z Ste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5(4): 813-836.
- [2] J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J]. *History and Theory*, 2010(2): 237-265.
- [3] R Terada. *Feeling in Theory: Emo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 [4] R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0 (reprinted from 1957): 6.
- [5] R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2.
- [6] M Huehls. *Structures of Feeling: Or, How to Do Things (or Not) with Books*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0(2): 419-428.
- [7]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Modernity*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 [8] 金雯. 十八世纪阅读理论与当代认知叙事学[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4): 155-163.
- [9] A Froide. *Never Married: Single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1.
- [10] T Castle. *Clarissa's Ciphers: Meaning and Disruption in Richardson's Clarissa*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57.
- [11] W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5.

The History of Emotion and the Unbinding of Literary Studies In a Multinational Context

Jin Wen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emerging discipline of emotion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novels. It first limes out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source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 and the crucial ways in which European novels figure in this project. It then moves to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Richardson's *Clarissa* (1847—48) and Rousseau's *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1761) to illustrate how the European novel intervened in the precipitation of modern structures of the feeling from its very incipience and was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emergence of new modes of feeling. The essay aims to show that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emotion allows to practice a simultaneous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ward studying world fiction.

Key words: studies of emotion; 18th century; European novels; *Clarissa*; *Julie*; *the New Heloise*

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策略研究

李向阳

摘 要: 在分析新时代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态势基础上,探讨了航天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必要性,以及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合我国国情和军情,从军队双方视角,剖析了解决制约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难点和具体措施。最后,提出了推动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与建议,为破解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的问题,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军民融合; 军民两用技术; 技术双向转化

中图分类号: F0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81-07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太空领域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太空日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战略重心,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军事作战对航天的需求急剧增加,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军费开支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采取军民融合的发展策略,利用国家的整体资源构建强大的国家空间能力,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发展^[1]。为此,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态势,吸取国外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结合我国国情军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态势

军民融合,从广义上讲,就是发挥国防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整体优势,实现军事、经济和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2]。具体而言,就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通过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

设需求,促进技术和资源在军民之间双向转移,实现民用技术发展使军事领域受益、军事技术突破带动经济起飞,提高包括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内的国家整体建设效益。

(一) 航天军民融合是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的必然要求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交叉融合程度越来越深、渗透兼容越来越强,以航天、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先进信息与大数据、先进动力、功能材料和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已成为提振国民经济发展、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引擎,军民融合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航天领域,需要发挥太空领域科技牵引、行业辐射作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引领高新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就技术而言,军用太空系统与民商用太空系统并无本质区别。就应用而言,通过军民融合发展,可增进国家空间安全和航天产业化发展的平衡,实现太空信息系统应用的最优配置及利益最大化。在航天领域开展军民融合既能满足装备的更新换代,促进太空前沿技术的探索,确保技术领先的地位,又可推进国防工业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为民用、商用卫星提供发射、测控

作者简介: 李向阳,男,陕西富平人,大校,研究员,国防大学硕士生导师,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从事军事航天战略,国防科技管理研究。

和运行维护等支援保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天基导航定位、时空基准、通信服务和环境信息,带动经济市场的繁荣。

随着航天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强,民用与商用空间能力得到快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由军方与政府拥有的空间能力,现已成为“商品”由国家、商业公司或个人通过市场获得,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军用、民用与商用能力迅速增强,从精确制导武器到出租车都在获取其空间能力。目前,除通信、遥感、气象等空间系统在民用与商用领域快速发展外,空间系统在轨重构、补给与服务等探索项目在民用领域也得到军事强国的高度重视。航天技术的军民两用性以及航天系统具有的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和高风险特性,使得航天系统军民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

(二) 航天技术军民两用性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航天技术作为战略性高技术,不仅应用于军事领域,在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应用于众多民用部门和商业领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很强的军民两用性。

世界主要国家都将发展航天技术、提升空间能力看作是加强国防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航天领域也成为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据专家估计,美、英、法、德、日等国发展军事航天系统所需的高新技术,80%—90%来自民间企业,仅10%—20%来自军方的科研院所^[3]。许多民用航天技术只需很少的经费投入就能达到军事航天系统80%的性能要求。鉴于民用和军用航天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航天技术中95%左右属于军民两用技术,主要国家民用航天部门的投资近年来不断增加。当前大多数国家的民用卫星,如通信卫星、气象卫星以及其他环境监测卫星等,也兼作军用,用于满足军事任务需求。

(三) 航天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航天活动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随着航天系统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面对国家安全对航天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资源短缺的压力日益明显。美国是拥有

空间资产最多的国家,目前在轨运行的卫星中有半数属于美国,作为航天领域投入最多的国家,近年来其年度军事航天预算都超过200亿美元。但是,美国国防部在通信、成像等方面都依赖于大量购买商业卫星服务,以解决军事卫星通信领域存在的严重带宽不足,以及军用航天系统对地观测能力有限等问题。在技术发展上,美国通过“军民结合”“以民掩军”的方式,推进天基“软杀伤”、可控杀伤反卫星技术研制和试验。在能力应用上,美国通过采购民用遥感卫星数据,租用民用通信卫星转发器,发展军民共用卫星,民星搭载军用载荷等多种灵活的“民为军用”“军民融合”模式,补充完善了军用卫星资源,满足了其军兵种在长期信息获取、日常作战训练、战时应急调用等多方面的需求,充分挖掘出了卫星作为“力量倍增器”的潜力。其他国家也通过利用民用航天系统或购买商业服务来满足军事需求,减少采购昂贵的专用系统,以降低成本。

二、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促进了军队信息化建设,带动了国家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军民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产业发展不足、资源共享程度偏低等问题,导致军民融合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 组织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航天系统形成多头管理、分散使用的格局,军用和民用航天系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获得的信息也主要提供本部门使用,军地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造成军地条块分割现象。军方负责管理的侦察、测绘、气象、通信等军事航天系统获得的信息,很少向民用部门提供服务;而民用测绘、气象、遥感、通信等卫星系统,也很少被用于满足军事需求。

我国航天发展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机构目前尚不

健全,没有专门机构负责从国家层面对军民航天发展活动进行统筹谋划,管理协调军用和民用航天系统建设,导致军用航天和民用航天各自根据主体需求进行建设、管理、使用,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军民共享,但目前尚未建立统一、正规、顺畅的航天资源统筹协调机制和正常共享渠道,应用效益没有实现最大化。特别是一些国家重大专项工程,如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军民相互之间缺乏沟通,技术和资源很难实现共享。有些项目虽然建立了军、地多部门协调机制,但尚停留在“一事一议”的较低层次和水平。

(二) 政策法规保障尚不完善

航天领域军民融合事关国家和军队的大局,涉及面广,程序复杂,必须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政策与法规制度,对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机构设置、职责划分、范围、内容、方法、经费保障以及平战转换机制、工作制度等进行规范。

目前我国航天领域有多个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但缺乏综合性的政策法规对不同部门的航天活动进行顶层宏观指导,更缺乏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具体条款和措施,急待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军地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并对合同管理、基础设施和设备保障、经费保障、以及开展军民融合的程序、内容和方法等,进行统一规范^[4]。

(三) 航天工业军民融合机制尚未形成

我国的航天科研与生产体系,由于历史原因被分为军品和民品两部分,形成军民分离的现状。军民航天科技计划、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自成体系、缺乏协调,军民协调机制不够顺畅,统筹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制度约束力不足。近年来,随着认识和实践的逐步深入,国内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军民分割、自成体系、封闭运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未达到根本扭转。在大多数企业,甚至在军品、民品生产过程相似的企业,军品的设计、生产和供应都由独立的分部或工厂进行,即使在同一企业内,军民两部分的科技人员也很少交流^[5]。这种分离现象,在科研单位同样存在,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同样欠缺,不愿意共享设计、技术和策略,担心专有的信息资料会泄露

给竞争对手。这种分离的结果,使设施、人才和技术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四) 航天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还不充分

与其他产业相比,航天领域无论是航天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品牌信誉、专业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近年来虽然在导航、气象、对地观测等领域应用系统初步建立了军民融合机制,但因与市场和资本结合度不高,整个航天产业体系的内在价值尚未完全发挥,军工经济与国民经济相互促进的局面还有待挖潜,要形成我国航天领域“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的良性发展格局,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五) 军民技术标准不衔接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武器装备对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要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一套军民有别的标准和规范。随着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融合度越来越高,军用标准已渐渐成为技术融合的障碍。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民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平已经超过军用领域,但是由于军用标准发展模式相对封闭,缺少与民用标准的有效沟通协调机制,往往难以及时体现和应用最新技术发展成果。

三、国外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经验

尽管世界各国航天军民融合发展阶段和模式不一致,但航天大国在航天军民融合发展上都聚焦创新引领,注重开放合作,重视军民商用技术,大力发展商业航天,提升国家太空能力。

(一) 各国都在大力推动航天领域的军民融合

美国已形成了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军民商融合发展且互为补充的航天工业体系,以及开放化、社会化、创新引领的航天产业链。欧盟也大力支持中小航天企业,跨国整合航天军民资源,商业航天已成为欧盟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美欧等在着力探索太空新边疆的同时,都致力于打造较为完整的太空经济产业链,推动形成太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休斯顿已成为重要的航天城,西雅图也培育了

众多的私有太空技术公司,被称为新太空之都。法国的图卢兹集中了800余家航空航天企业,英国以太空中心、欧洲卫星应用和电信中心为技术研发主体,汇聚了众多航天中小企业参与的太空街区。俄罗斯“太空旅游”公司获得“太空旅行可重复使用系统”项目的研发许可,开启了俄罗斯私营企业获准开展亚轨道载人飞行业务的航天商用新模式。发展太空经济,平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外商业用户需求,战时通过征用(租用)等方式满足军事需求,已成为各国发展航天事业的普遍做法和共识。

(二) 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是航天军民融合的基础

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普遍制定系统完备的政策法律体系,明确军民管理分工和职责,规范航天产业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就颁布了《国家航空航天法》,确定了“将具有军用价值或军事意义的新研发成果优先用于国防相关部门,并由这些部门研究确定向民用机构开放专利许可,以寻求和鼓励航天的最大商业利益”。以2010年《美国法典》增设“国家商业航天项目”专编为标志,成熟的航天法律体系有效保障了美国航天活动的有序开展。美国历届总统都会颁布修订的《国家航天政策》,明确军民商航天新的发展方向,减少重复建设,相互促进发展。俄罗斯在1993年颁布实施了《俄罗斯联邦航天活动法》,规定负责国防事务的联邦权力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权征用航天设施设备,同时也有权将暂时不用的航天基础设施用于实施科学和经济用途。日本在1969年也颁布了《国家宇宙开发事业团法》,2002年颁布了《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由2008年颁布的《宇宙基本法》确定了专门法律规范航天产业发展。中国也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航天领域的法律法规,比如《国防法》《政府采购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民用航天项目发射许可证管理办法》等,共同构成了指导我国航天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法规框架基础。然而尚未有一部专门的“中国航天法”,从法律层面对航天军民融合发展作出权威的规定,促进航天军民融合的有效实施^[6]。

(三) 发展航天军民商用技术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有效做法

美国政府设立“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术转移”等一系列激励扶持计划,吸引商业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参与军用技术研发活动。一方面,政府与民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军用专项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军方向社会开放一些军用专利技术,由企业或研究机构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自行完成技术的民用转化工作,培育出了诸如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等知名商业公司。NASA将低温火箭发动机等技术无偿转让给SpaceX公司,使“猎鹰—9”火箭有望成为国际主流火箭之一。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法案推动航天商业化,强调军队应最大限度利用商业航天能力与服务,放开商业高分辨率遥感卫星(0.25m)限制,培育出了轨道ATK公司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商业航天公司^[7]。俄罗斯将东方航天发射中心作为新的航天中心,积极开展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开拓国际商业合作市场。

(四) 航天军民融合组织模式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

美国一直通过一系列的试点项目探索军民融合的新路径。如通过开展“商业整合单元”项目,包括军用、民用、商用资产整合,目的是更好地改善商业运营环境和数据交换,以帮助美国获取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帮助美军应对电磁干扰,也方便了军事和商业用户之间更好的数据共享,随着“商业整合单元”项目日渐成熟,美军应对大多数太空中的突发事件(如卫星碰撞)的常规流程已经就位,美军处理卫星干扰事件以及确定其原因的能力大大增强,是美国空军与6家顶级商业运营商成功开展合作的一个典范。此外,DARPA正在积极推进“轨道瞭望”项目,利用来自军民商等不同传感器的多源数据监视快速变化的太空环境。该项目已完成对来自7个太空态势感知数据提供商的实时数据整合,这些实时数据来自部署在全球的超过100个传感器。随着传感器数量的不断增加,未来美军可能形成在任何时候对所有太空目标进行持续监视的能力^[8]。

总之,随着对太空威胁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自身对太空能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世界航天强国都把太空安全视为核心利益,构建新型的太空体系结构,

深入推进航天领域军民融合, 强调利用民用高科技公司推动航天技术发展, 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四、加强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建议

太空不仅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 而且具有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因此, 在太空领域实现军民融合是十分必要的, 符合太空的特点和规律, 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结合我国情军情, 就加强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建议。

(一) 顶层谋划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涉及合理配置和利用国家的资源, 涉及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的调整和一致行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统筹规划, 统一部署, 明确目标, 由政府和军队相关部门共同推动^[9]。

一是发布战略文件, 明确有关政策和指导原则。航天系统在军事和民用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要从国家整体战略需求出发, 对军民融合发展进行总体设计, 明确开展空间活动的指导原则, 按照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军民互补的要求, 建立健全军方主导、军民共用的太空系统融合建设机制、军地卫星数据共享机制及民用卫星军事征用制度, 统合军地需求, 统一技术标准, 统筹优势资源, 推进军民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军民两用航天技术联合攻关、信息资源开发共享共用,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投入, 推进航天事业持续发展。二是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管理协调军用和民用航天系统建设。建议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指导下, 成立由军方和国家部委主管科技的部门共同组成的科技专项领导小组, 构建科技军民融合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军民科技战略规划、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问题等, 实现科技军民融合的统一领导、科技重大专项的统筹规划以及科技资源要素的统筹配置。在科技专项小组下按照科学技术领域下设航天科技军民融合办公室, 建议由军方牵头, 负责汇总军委机关各部门、各战区、各军兵种和国家相关部委的科技需求, 负责编制《军用航天技术推广清单》和《民

用航天高新技术公司及技术产品推荐清单》, 通过建立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需求联合发布平台进行需求发布, 联合开展航天科技军民融合相关规章制度拟制, 牵头开展航天领域科技军民融合项目的立项论证和申报等, 推动需求、资源等信息的交互共享和统筹。三是制定专项计划, 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和基础研究。发挥重大专项和高新工程的引领作用, 建设军民融合的航天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集中军民科技资源加大航天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力度。首先, 统筹军用和民用航天发展需要, 制定“两用技术发展计划”, 加强对具有军民两用前景的关键技术研究的支持。重视发展军民两用航天系统, 即在论证军事航天系统发展时, 要考虑其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考虑民用航天系统发展时, 能兼顾国防发展需要的就必须增加军事功能设计, 使之既能服务军事又能服务民用。其次, 以国家空间安全和重大科学目标为牵引, 针对可能改变未来作战样式的前沿性、革命性技术, 面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民营企业, 系统部署航天领域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和创新型航天技术攻关, 夯实航天科技创新发展基础, 完善航天科技创新力量体系, 实现航天技术发展自主可控和自主保障。四是开展航天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充分发挥航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航天学院和国家实验室以及专业战略咨询机构的优势, 建立由战略专家、技术专家、金融专家、产业专家、管理专家等组成的航天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咨询智库网络, 开展国家空间安全、航天军民融合技术发展、航天军民融合及产业发展、风险评估与市场分析等, 支撑航天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战略需求咨询研究。

(二) 建立军民融合的航天工业基础

航天工业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 政府在保持对航天工业扶持力度的同时, 深化航天工业内部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 鼓励私营资本参与商业航天开发,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支撑航天科技发展, 逐步建立军民融合的航天工业基础。

一是继续深化航天工业改革。首先, 改变军品和民品活动分离的状态。扩大两用项目的研究开发, 鼓励军用、民用产品尽可能采用共同的技术、工艺、人员和设施, 改变军品“一个产品一个工

厂”“一个行业一个配套体系”的过细分割和各自封闭的做法,推进专业化协作和生产,满足国防和民用两种需要,实现科研生产上的军民融合。其次,加强市场竞争,降低成本。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看,无论是引入民用企业、科研机构 and 高校参与军品科研生产,还是吸引地方人员参与军队社会化保障,都是按照市场机制,尊重市场规律来实现的。因此,要打破现有国有航天工业技术与产品垄断的局面,除核心关键能力外,其他技术产品均可通过市场招标、承包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 and 高校积极参与,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目的^[10]。二是加快航天产业化发展,开展商业采购服务。以国家重大工程、重大科技专项任务和重大产业化项目为牵引,打造航天产业军民融合技术孵化平台和产业发展与创新平台,补充出台支持非公企业“参军”的政策法规特别是税收扶持政策。吸引民营企业进入航天领域,重点发展通信、遥感等商业卫星及其地面运营服务、信息服务等,通过航天产业化发展,提高航天工业自身的基础能力、技术实力 and 经济实力,以提供更多的航天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军方的需求;鼓励开展商业采购服务。借鉴美国的经验,逐步放宽航天商业采购服务的范围。为充分利用商业资源满足军事能力需求,美国军方采取了直接补贴私营公司、出资建系统、租赁带宽、采购商业服务等经济手段。探索军队支持下的商业化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安全与产业化发展的最佳平衡。三是促进技术和资源在军民之间双向转移。大力推进军地资源开放共享,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和信息交流渠道,形成人员、资本、技术的双向流动(互动)局面,为技术成果转化搭建桥梁。首先,完善军用技术解密等相关制度,促进航天成果及时、快速实现市场转化。其次,建立航天技术、技术人才及法律法规信息数据库,通过信息发布交流平台,使得军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畅通、便利,理顺和拓宽军方与民用部门的合作渠道。最后,建立准入标准规范,确保民营企业能够符合军事发展需求。例如,推行资格审查和企业分级制度,通过资格审查使一批优秀的地方企业进入国防科技与装备发展领域,另外,推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等标准的军地通用化,减

少地方企业准入的障碍。四是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政府间协议或私营部门开展航天国际合作,采取合作研制、合资经营、转包生产、合作生产和零部件供应等形式,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和资本,提升航天工业能力。

(三) 完善保障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法规制度

推动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对军民融合发展的范围、内容、方法等进行规范。由于航天技术和产品具有很强的军民两用性,在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时,既要保证技术、产品和服务创造经济及社会效益,更要确保国家安全。

一是制定军民重大设施共享管理办法。在重大设施建设方面,应尽快研究制定军民重大设施共享管理办法。推动已建设备设施的军民共享,实现新建设施的军建民用、民建军用、共建共用。二是制定政策法规控制空间敏感信息使用。随着民用航天系统的发展,在强化军民合作的同时,采取颁发许可证制度、设置控制性条款等方式,加强对关键项目、关键数据的控制,如民用遥感卫星图像分发、导航信息的发布等;民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应采取国家支持和监管下的商业化运行方式。三是规定军方采购民用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具体原则和管理程序。随着民用技术、产品与服务在军事航天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有必要制定采购民用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具体原则和管理程序,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军方要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商业产品为作战人员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四是探索建立成果转化收益合理分享机制。加强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与知识产权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健全以知识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防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激励机制,运用知识产权手段进行权益合理分配,向知识产权持有单位和个人释放军民融合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红利,依法保障成果持有单位和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引导民用领域知识产权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运用,鼓励国防知识产权向民用领域转化。

(四) 构建军民融合的航天人才培养体系

航天高技术的特性,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专业人

才从事航天力量建设, 政府部门与工业界和学术界应采取有力措施, 培养、维持和保留技术熟练的航天专业人才, 同时构建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是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培养军事航天人才。针对军事航天领域人才短缺的问题, 紧紧依托国民教育系统, 利用现有的“4+1”或“2+2”军地高校联合培养渠道, 加强军地联合办学力度, 注重航天专业能力培养, 为军队输送品学兼优的航天人才。二是直接招募地方航天人才。对于军事航天领域那些急需的技术攻关人才, 应采取特招、特聘或智力引进, 不拘一格为我所用。在直接引进特需人才时, 应遵循市场规律, 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做好引进工作。三是参加地方科研合作。选派军队航天优秀人才参与地方科研合作, 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培养军队人才, 增强军队人才对航天技术发展前沿的熟悉程度, 提高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军地科研合作机制, 鼓励科研人员双向交流, 联合攻关, 共享科研成果。四是利用国外专业机构培训航天人才。选派航天人才到专业机构培训是美俄等国的普遍做法。我军军事航天人才培养, 也应该具有全球化视野, 让人才走出国门, 派往世界顶尖的专业机构接受培训。

参考文献

- [1] 谢平, 李成方. 对航天军民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航天, 2017 (3): 10-15.
- [2] 张纪海, 乔静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111-116.
- [3] 董景龙. 国外航天军民融合发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航天, 2017 (8): 28-31.
- [4] 谷英喜. 中国航天制度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 [5] 刘尔琦. 关于航天企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思考[J]. 航天工业管理, 2011 (3): 4-8.
- [6] 董珍祥. 关于中国航天法定位与路径研究[J]. 科学决策, 2017 (8): 51-68.
- [7] 侯勤. 美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新态势[N]. 中国航空报, 2017-11-21 (8).
- [8] 黄志澄. 美国航天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J]. 卫星应用, 2015 (11): 30-34.
- [9] 张涛, 李亚萍. 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家主导作用[J]. 中国军事科学, 2016 (5): 75-79.
- [10] 刘则福. 浅谈航天军工企业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途径[J]. 航天工业管理, 2017 (10): 4-7.

Research on the Deep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ilitary and Civil Integration in China's Aerospace Field

Li Xiangya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velopment in the aerospace field in the new era, the necessity of deep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aerospace field an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the aerospace field in China are prob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that restraint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aerospace field in terms of China's national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military and the outsid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which promotes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China's aerospace field,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 China's aerospace field and exploring the road of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 the aerospace fiel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Dual-use Technology; Two-way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y

我国军工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及分类改革

严剑峰 唐波

摘要: 军工集团集中了我国主要的国防研发资源、能力,这可能会导致军队的技术预见与技术管理能力不足、军工科研院所研发活动的短期化、军工集团对军工技术的垄断、不利于知识的溢出与共享等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军工科研院所国防科技创新链条上的位置和功能、国防科技研发活动的性质及其与生产联系的紧密性特征,对我国现有的军工科研院所进行分类改革。

关键词: 军工科研院所;创新链;研发活动特征;分类改革

中图分类号: G32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2-0087-08

国防科技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第一要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国防科技的创新和运用步伐,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而作为国防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军工科研院所,承担着从尖端技术研发到武器装备开发、再到技术支持、技术服务、技术转化、设施设备共享等多种职能,是一个国家“创新的种子”“人才的摇篮”“科学实验的平台”“尖端武器装备的孵化器”“高科技企业的诞生地”……,在整个国家科技创新系统、尤其是国防科技创新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但由于现有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工科研院所国防科技创新、乃至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中作用的发挥。那么,到底该如何进行国有军工科研院所的改革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并给予科学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合,从而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品化、产业化;二便于企业进行内部资源的调配。几乎把某一武器装备研制系统的所有研发机构和生产单位都放在一个军工集团内部,便于军工集团进行内部资源的调配,且指令性计划运行,有利于集团内部“集中力量办大事”,开展大规模武器装备的研发集成。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如下一些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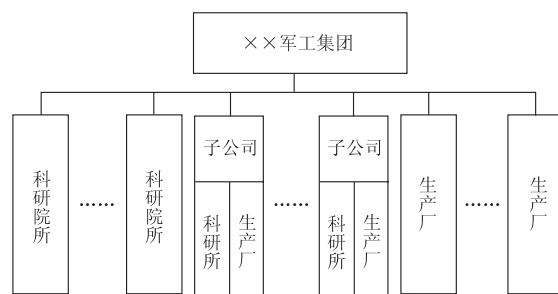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军工科研院所的现有体制

一、我国军工科研院所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我国军工科研院所的体制基本上可以用图1来表示:

这种体制的最大好处是:一可以做到产研结

(一)可能导致军方的技术预见和技术管理能力薄弱

我国军工科研院所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照前苏联军工科研生产体制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在

作者简介: 严剑峰,男,河南信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唐波,男,陕西澄城人,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副院长,东莞市三航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院长,工大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级经济师,广东省发改委军民融合领域外聘专家。从事军民融合研究。

建国之初,人才、资金、技术严重不足,国家只能把几乎所有的人才、设施、设备都放在军工系统内部且统一调度指挥才能保证完成重要武器装备的研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和军工企业其实是高度一体的,二者的目标和利益也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利益冲突;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军工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军队和军工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军工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作为军工集团一个部门或组成单位的军工科研院所也是以军工集团的利益为导向的,这就很难保证军工科研院所及军工集团依然会按照军方的意图和要求行事,而要对军工集团及其科研院所(即现在的军工承包商)进行有效管理,军方则必须具备相应的采办和管理复杂高科技武器装备系统的技术能力。而目前我国主要的国防科研机构也都还在军工集团内部,军方的技术力量相对薄弱,这就制约了军方的技术引领、预见、论证、谈判、管理能力,很难发挥军方在技术采办与技术开发中的主导作用,难以扮演好“精明的采办人”角色。

(二) 容易导致军工科研院所研发行为的短期化

企业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而一款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往往需要很多年;如果考虑到从概念提出到先期技术探索,这一周期可能会更长,并且在前期阶段还伴随着很高的失败风险。把这些与武器装备研发有关的科研院所都放在企业内部,很容易导致科研行为的短期化;过分强调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也容易导致对颠覆性创新的忽视;而且,把大部分军工科研院所都放在企业内部,也使得这些军工科研院所很难对军方的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很难保证这些军工科研院所的技术开发规划能够与军方未来长期建设的技术需求相衔接,难以获得军方长期持续的预算与资金支持,技术开发只能跟着型号走,从而导致科研任务缺乏可持续性和连续性。

(三) 容易形成军工集团的技术垄断

我国现有军工集团在军品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形成,不仅与其高度一体化的封闭体制有关,而且也与我国多年来对军工集团在技术装备和研发活动上的投资有关。多年来,我国在国防研发方面的巨额投资所形成的科研设施设备、科研能力及科研成

果,基本上都成了国有军工集团的“自家财产”,很难为民口企业所共享,这就帮助国有军工集团形成了相对于民营企业在技术装备、技术能力及技术成果上的优势地位,从而形成技术垄断,这无形中提高了民参军的技术门槛,也是民营企业很难与国有军工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①。把大部分与武器装备研发有关的、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的研究机构都在军工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并阻碍其他研发机构的进入和竞争,这也削弱了其创新能力。因此,通过改革国有军工科研院所,将有利于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机会,提升其技术能力,打破国有军工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增进国防研发领域的竞争,这将有利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进程。

(四) 不利于协同创新与知识的共享和溢出

由于国家投资的科研设备、形成的科研能力与科技成果都成了国有军工科研院所或集团的“自家财产”,为了保持自己在军品市场上的技术垄断地位,这些国有军工企业一般是不会愿意把自己的设施、设备、人员及成果与外人分享的,他们会以国家秘密、技术秘密、维护设施设备安全等理由和方式把这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其结果就是很难发挥这些设施、设备、人才及成果的共享利用,不利于知识的溢出与扩散。此外,我国大部分的军工科研院所分属于不同的军工集团,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也不利于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二、国防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与作用

(一) 武器装备研发的创新过程及各研发机构的职责

从武器装备的研发过程来看,这是一个长长的链条,经历了作战概念提出与技术机会确认、装备需求提出与论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先导技术开发、关键零部件开发、工程样机开发、生产工艺开发与产品制造、产品升级换代等。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科研生产机构参与其间,各司其职而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武器装备的研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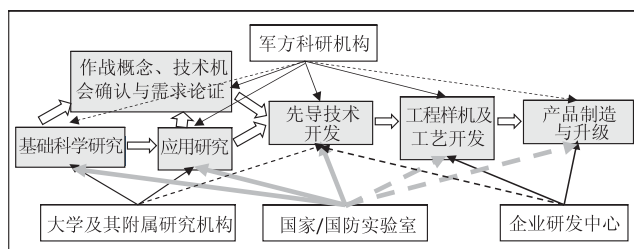


图2 武器装备研发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

图2的实线箭头表示研发机构的主要职责和业务，虚线箭头表示该研发主体也会介入这类研发业务。可见，参与国防研发的主体主要有：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军方实验室、国家/国防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这几类主体的作用分别如下：

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的主要作用在于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偶尔也会从事一些先导技术开发。其研究的问题多是回答“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多是“为了知识而研究”，而很少考虑这些知识“用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些知识就蕴含着某种运用于国防和武器装备开发的可能性，特别是军方资助的一些大学科研机构或科研项目，其本身就是为了潜在或未来的军用目的而存在，因此需要军方对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保持密切的关注和一定支持，从中形成新的作战概念、把握新的技术机会。当然，随着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功能的拓展，也有一些大学研究机构会偏离“主业”，从事一些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工作。

军方科研机构在武器装备研发中承担的职能包括：作战概念提出与技术机会把握、武器装备需求论证，从事一些保密度极高的先导技术开发以及一些暂时还看不出有民用价值的纯军用技术开发、新概念武器工程样机的研制，参与对承包商的技术谈判和技术管理，参与国防科技研发政策的制定，为军方的决策和武器装备采办提供支持以保证军方成为“精明的采办人”。因此，军方研发机构一般扮演作战概念与机密而尖端技术开发者、军方科研规划计划的制定者、军方科研项目管理者与大规模武器装备项目开发的技术集成者、军方与产业界的桥

梁等多重角色^[1]。

国家/国防实验室主要是指由政府机构所有并资助的、由非军方机构运营管理的研发机构^②。国家/国防实验室的基本职能定位就是国家使命与目标，目的在于解决国家安全及发展所急需的、相对比较明确具体的应用技术与产品开发问题，以弥补市场失灵、支持其所属政府部门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如能源开发、网络安全、空天探索、气象研究、医疗卫生、防灾减灾、标准与计量、农业科技开发、新兴产业引领与开发等等。国家/国防实验室主要从事与国家安全与发展有关的前沿基础研究、竞争前战略高技术开发和重要公益性技术开发等，主要聚焦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民营企业无力或不愿承担的、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项目，并参与制定或实施所属政府部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因此，国家/国防实验室的科研活动具有应用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公益性、自主性等特征。一般说来，这些实验室更多地倾向于研究5—10年内可以解决的重大技术应用问题。国家实验室一般不得与企业实验室开展竞争性的研发业务^[2]，只有企业不愿或没有能力从事、或者是市场上没有有效需求而又事关国家利益的研发任务，才应该由国家实验室承担^[3]。

国防工业企业及其研发中心则主要承担武器装备的型号研制与集成、制造工艺开发与流程改造、产品升级换代等工作。在武器装备的型号研制与集成过程中，遇到的一般问题会由企业自己内部的研发中心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企业才会寻求外部研发机构来帮助解决，因此企业既是技术的开发者，也是技术的需求者。当然，为了维持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这些企业自己也会从事一些除产品开发之外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并积极竞标参与军方的各种研发项目，以便与军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增强自身承接军方研发机构技术转移的能力。

由上可见，不同的研发主体在武器装备研发过程中承担的职能和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主要扮演了整个国家科学研究基石的角色；而军方科研机构则扮演了作战概念提出及先进且机密技术的探索者、军方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

者等角色;而国家/国防实验室则扮演了公益性应用研究和先导技术开发者的角色,是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之间的桥梁;国防工业企业及其研发中心则主要是武器装备型号的开发者和相关技术集成者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完成从基础研究到武器装备开发的全流程、开放式创新过程。虽然,各种国防研发机构的职能分工有一定的分野,但是由于科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各研发机构不断开拓新业务,从而也出现一些职能交叉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在武器装备开发的前端,公共研发机构(包括大学及其附属研发机构、军方研发机构、国家/国防实验室)扮演最重要角色,而在武器装备开发的后端,企业及其研发中心则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我国,尤其在传统的武器装备开发领域,从基础科研研究直至产品开发的几乎所有研发机构都放在军工集团内部,肯定会影响这些研发机构功能的发挥。

(二) 公共国防研发机构科技创新的知识转移与共享

从上面“创新链”和“知识流”的过程来看,国防科技创新与武器装备研发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先导技术、公共核心技术、甚至原型机(或核心机)的开发均带有公共品的色彩,应该由政府或军方有关部门给予资助、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企业或个人所共享,企业只是在这些由公共研发机构开发或政府/军方资助开发的技术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产品开发与技术集成,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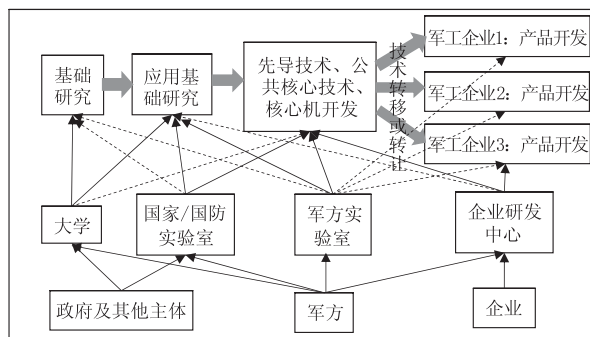


图3 公共国防研发机构在一定范围内向军工企业转移转让技术

由图3可见,国家/国防实验室及军方实验室向产业界(企业)转移转让军品研制技术是保持军工

企业武器装备研发集成能力和保持军工行业竞争性的重要基础^③,当然这也是军方控制军工企业或军工集团的一种重要手段^[4]。

从上面我们对国防科研体系的介绍也可以看出,国防研发机构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包括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军方实验室、国家/国防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企业研发中心为企业所有,为企业服务,其研究成果为企业所垄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公共的研发机构,使用的资金与设备投入来自于国家或社会公众,理当为所有企业服务,以促进整个国家的国防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此外,由于国防研发具有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且市场唯一等特征,一般来说企业不会愿意自己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前沿探索,这就只能由公共的国防科研院所来承担,一旦某种技术成熟、可以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制时,这种技术就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转移给企业,由企业进行最后阶段的武器装备研发。因此,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当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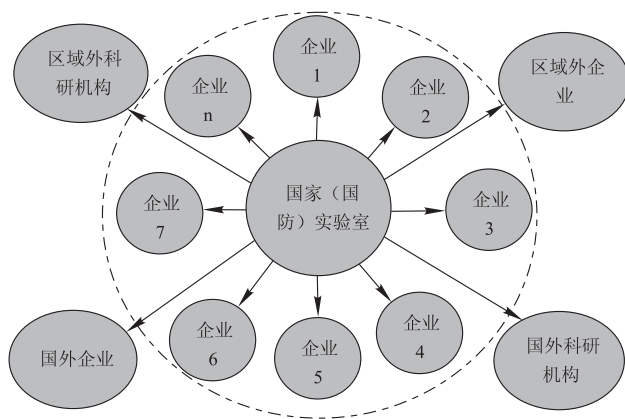


图4 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与军工企业、军工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

由图4可见,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应该为多家军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或技术转移,以促进军工产业的发展和竞争,这样也可以避免国家投资兴建的公共国防研发机构仅为一家军工企业服务、从而导致国防科研设施设备与技术成果被一家企业所垄断的局面。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作用如果发挥得好,

就会在它的周边形成一个一定规模的军工产业集聚区,并与区域外的国防科研机构和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不断为区域内的军工产业集群注入新的技术和创新活力,并在区域国防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中扮演“发展之锚”的作用,吸引并留住大批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这些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也会从区域产业发展中汲取资源、发展壮大,形成良性循环。当然,要发挥这些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对区域社会经济带动效应,就必须建立一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服务机制,以调动公共的国防研发机构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积极性的积极性。

三、军工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模式

从上面我们对国防科研机构职能的介绍可以看到,不同的科研机构应该承担不同的职能,或者反过来说,不同的职能应当由不同的科研机构来承担,这样可能才可以充分发挥不同科研机构的“比较优势”,并开展协同创新。所以对于军工科研院所的改革,我们当根据其从事的科研活动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国防科技创新“链条”中的位置,进行分类改革。

(一) 军工科研院所改革的基本依据

具体而言,军工科研院所改革的基本依据包括:

第一,从事的具体任务和研究的性质。如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产品开发?是公益性的,还是可盈利的?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一般说来,对于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改制为大学附属研究机构,而从事商业前端技术(或称先导技术)开发的军工科研院所则可以改制为国家或军方实验室,而从事一般技术研发、技术集成和产品开发的机构则可以企业化。

第二,科研活动的机密性高低以及科研能力或成果的军民通用性程度。对于从事机密程度很高、军民通用性较低的技术研发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改为军方实验室或国防实验室;而从事保密程度低、军民通用性强的技术研发的军工科研院所则可以企业化。

第三,科研与生产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对于

那些从事终端武器装备型号研制集成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交给企业,而从事距离生产活动较远的前段研发活动的军工科研院所则可以转化为大学附属研究机构、军方或政府研发机构。

第四,研制的武器装备的性质。研制的武器装备是小批量生产的、还是大批量的?是总体系统、还是分系统、零部件的研发?小批量的、总体或关键分系统开发可以放在军方实验室或其他公共实验室完成^④;而对于大批量的、一般分系统和零部件开发可由企业完成。

第五,民间研发力量和市场功能发挥作用的大小。如果某一领域市场空间巨大,则民间资本进入就多,来自民事部门的科研力量就会较强,国家就无需介入;相反,如果不能由市场提供,则应该由军方承担;或由军方资助、市场化供给的方式提供。如果一项技术由市场提供会形成垄断,则应该由军方自己研发或由军方资助研发,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共享。

(二) 军工科研院所的改革模式

根据上面的原则和依据,军工科研院所的具体改革模式可以有如下几种^⑤。

第一,企业化模式

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对于那些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的军工科研院所,或者是主要研发一般通用技术的研究所,可以通过私有化、民营化改革直接转变为高科技企业,便于其开发有广阔市场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发挥其服务市场需求和地方经济的功能。

还有一种就是,对那些与技术集成和型号开发密切关联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直接放在企业内部,成为军工企业的研发中心,以便于型号研发与生产制造的结合,降低研制过程中的管理和交易成本。

由于一般企业无法左右或很难预测军方的需求,因此企业一般不会主动投资进行国防科技研发,这就需要军方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国防研发活动,或通过补贴的方式激励企业从事一些有军民两用价值的科技研发,最终的科研成果或者归军方(即出资方)所有、或者归企业所有(但必须接受军方一定的限制)。

但这里一定要注意,如果某个军工院所掌握的

技术是核心军工技术、或研发资产是垄断性资产，那么把这种科研院所企业化的结果就可能造成市场垄断。对于这种情况，要么把这些核心资产、技术和知识产权划归军方，要么把这些科研院所按照下面介绍的模式改革为公共研发机构。

第二，划归高校

如果只是从事一般性的、保密程度不高的基础科学研究，这样的科研院所则可以划归高校，成为高校的科研院所，这些划归高校的科研院所依然可以参与军方科研项目的招投标，而且还可以在参与军方研发项目的过程中为军方及军工行业培养所需的科技人才，同时也利于通过培养的人才实现技术的扩散与转移。

第三，委托给大学、科研机构或企业管理的国防实验室模式

对于那些从事长期、复杂、艰巨研发任务的实验室，由于这些任务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保密性等要求，由企业、高校或军方研发机构都难以承担或有效完成，因此应当交由与军方有着长期合作关系但又相对独立的研发机构完成较好。

这里就是借鉴美国的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FFRDCs）模式及大学附属研究机构（UARCs）模式，把某些军工科研院所委托给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代管，作为其一个可识别的独立单元与母体单位适度分离。如由美国国防部所属、归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的林肯实验室、卡内基·梅隆大学下面的软件工程研究所、宇航公司（Aerospace Corporation）下属的研究宇航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内部几个研究中心等。

此时，托管机构负责制定这些科研院所的目标、使命等，军方以科研项目形式资助部分研究与开发经费。

第四，转变为由国家部委（包括国防科工局）直接管理的国家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一般属于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从事政府部门为完成其职能之所需的科技研发任务、或者从事那些高风险、同时又有着潜在高回报、但是企业一般不愿从事的研究任务，其职责是承担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前沿研究，是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组建的，同时关注技术的商业

应用与转化。

对于那些主要开发军民两用、民用优先技术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交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能源局等，由这些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这样既可以增强国家部委的技术预见、技术管理、产业培育与开发能力，又可以使这些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更接近于实践和产业发展的要求，避免走向纯理论研究。这些政府部门可以根据本部门所辖业务及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给这些国家实验室下达科研计划与任务，提高这些国家实验室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主战场的能力。而对这些国家实验室的考核，主要看其知识创造与技术开发专利等，而不是看其利润额，从而可以保证这些研发机构更好地专注于科技创新。

由国家部委来管理这些国家实验室，其好处有三：一是可以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完成其使命任务，充当懂技术的精明的管理者；二是可以获得稳定的政府支持；三是便于根据政府部门的职能需要形成国家实验室在某一特定领域的长期的技术积累。而目前我国的很多国家实验室要么在军工集团内部，要么在中科院系统，导致这些实验室与政府使命任务的脱节，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任务来源，不利于技术积累。

第五，改为军方实验室形式

把那些与武器装备需求论证、前期概念探索、或从事探索性、机密性武器研发任务、甚至原型机开发的单位放在军队内部，成为军方内部的实验室，直接为军方的需求服务，从而提升军方的技术机会把握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目前，我军内部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实验室，能力也很强，但总体规模不大，主要还是依赖于军工集团的研发力量来实现从概念提出到先导技术开发、再到武器装备的研发，军方的主动性没能很好地发挥，这可能也是我军的一个短板。通过把一些军工科研院所划归军方，既可以充分发挥这些科研院所的作用，又可以补齐军方的这一短板。这类实验室相当于由军方所有、并且由军方直接管理运行的特殊的国家实验室。可以根据各类科研机构的业务范围分别划归海、陆、空等部队，或直接交由中央军委科技委管理。其主要雇员和管理者均享受军人待遇，其他人

员则可按合同制员工对待。

现在,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层出不穷,如果军方不能很好地把握科技发展的态势,就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把控、引领、规划未来战争的形态和战场的态势,也不可能很好地引导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扩充、增强军方的科研能力和技术预测与把控能力,才可以在未来引领战略、引领武器装备发展、在武器装备论证及采办中处于主动地位。

第六,组建联合研发中心

为了发挥科研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作用,对于那些从事具有多种潜在应用前景科技研发活动(如新能源、新材料、芯片研发等)的军工科研院所,可以转化为军方与地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高校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或企业联盟等合资的研究机构,这样可以使研发中心的研发计划照顾到多个主体的需求,开发有多种应用领域的技术,也便于这些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同时可以借此加强军地或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使研发机构同时面向军地或国家与地方的需求开展研发活动,从而增强研发机构研发活动与成果对军地、或国家与地方的支撑作用。

以美国的西玛科技实验室(SEMATECH)为例,该实验室就是由美国半导体企业联盟创立的科技实验室,其经费和科研立项都来自于半导体协会,其成果为成员企业所共享,也承接美国国防部的科研项目。在美国,这种由不同经济成分共同组成的“混血儿”有很多,它们的所有制结构及其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因此,可以效仿国外做法,成立由不同所有制主体联合组建的“实验室”^[5]。

第七,非盈利性法人研究机构

对于那些从事一般的科技研发与服务的单位,可以按照非盈利性研发机构模式进行改革。这类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自己不生产产品,可能是以盈利为目标,也可能不是以盈利为目标。政府可以控股、参股,也可以不参股。

四、结语

通过上述改革,把核心军工科研院所改革为

公共研发机构,这将有利于打破国有军工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实现知识的共享和溢出,也有利于增强军方的技术预研和技术管理能力,提升各个军工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还原军工科研院所的本来面目。为获得这些好处,我们还必须做好配套改革措施,如必须限制这些国有科研院所的业务范围(如不得与产业界竞争有关业务),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并给予他们稳定的人员与项目支持,建立健全国有科研院所向军品研制及生产单位或产业界进行技术转移的制度,等等。

为了把这些研究机构整合起来,完成大型的国防研发任务,军方还必须具备技术整合和技术管理能力,当然,军方也可以利用或委托一些大型科研机构或企业作为项目集成管理单位,但此时军方也必须通晓相关技术与流程。

此外,这种改革会打破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这也可能会对我国的武器装备研发产生不利影响和风险,我们绝不可因为改革损害或动摇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研发能力和基础。因此,为了降低这些不利影响、控制风险,我们必须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展开。

注释

①同样,现在国家把很多科研投资(及由此形成的设施、设备、成果等)放在民营企业内,也一样会形成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垄断。这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技术扩散。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科研设施、设备、及技术成果应该具有公共品特性,应通过建设公共研发机构、形成公共知识产权的方式确保国家科研投资形成的设施、设备、技术和成果的公共性,以便为所有的企业提供平等的技术获取机会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②此处的“国防实验室”是指从事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研发任务、但又不归军方所有的国家实验室,如美国能源部下面的核能开发实验室、美国航空航天局下属的空间实验室等。由于这些实验室主要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如果把这些实验室也放在军队内部由军方进行管理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军方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使用这些实验室。

③由于军用科技的特殊性,这种转移肯定是有条件的、有范围内的、并且要接受有关方面审查和监督的,如必须与军

方签署保密协议、使用协议、出口转让协议等等。

④由于生产批量较小,企业一般难以从中获得合理回报,因此企业一般不愿提供;当然,对于此类武器装备的研制,军方也可以通过提高采办价格的方式吸引企业参与。

⑤本人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是否也可以按照这里的模式进行分类改革?因为目前体制下,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与国家各部委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其科研活动很难与各部委负责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即国家之需求)相对接。

参考文献

[1]Research Offic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Required

in-house Capabilities for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search, Development, Test and Evaluation. [DB/OL]. (1980-10-01) [2018-01-06]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ao94024.pdf>.

[2]Michael Crow, Barry Bozeman.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设计带来的局限[M]. 高云鹏,译.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

[3]周岱, 刘红玉, 叶彩凤, 等.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剖析[J]. 科研管理, 2007 (6): 108-114.

[4]严剑峰. 政府(或军方)控制民营军工巨头的政策手段和制度设计[J]. 军民融合, 2016 (6): 36-42.

[5]严剑峰, FFRDCS. 美国军方的编外研究机构[J]. 军事经济研究, 2014 (4): 71-75.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Reform Models of Defense Industry S&R Institutions in China

Yan Jianfeng Tang Bo

Abstract: Our country's main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and abilities concentrate on the military industry groups, which may lead to such problems as inadequate capabilities of army force in technology predic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hort-ter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monopolizing technology in military industry groups, putting spinning-off and sharing of knowledge at a distinct disadvantage.etc. So we should implement classified reformation to our country's military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it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the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ins, its nature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ts closeness to production, and other characters.

Key words: Military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Chain; Character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Classified Reformation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正式学报类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楼A座12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其他约定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超星域出版平台”等数据库,并授权网络合作方使用本刊稿件。不愿通过网络媒体发布者,请在来稿中注明。